

570

俄國農民與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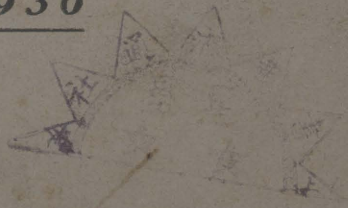
李偉森編

親愛的讀者
請保持清潔

讀者如欲
可以提本
讀書指導部
啟事
上請同題時
代為解答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0



俄國農民與革命

李偉森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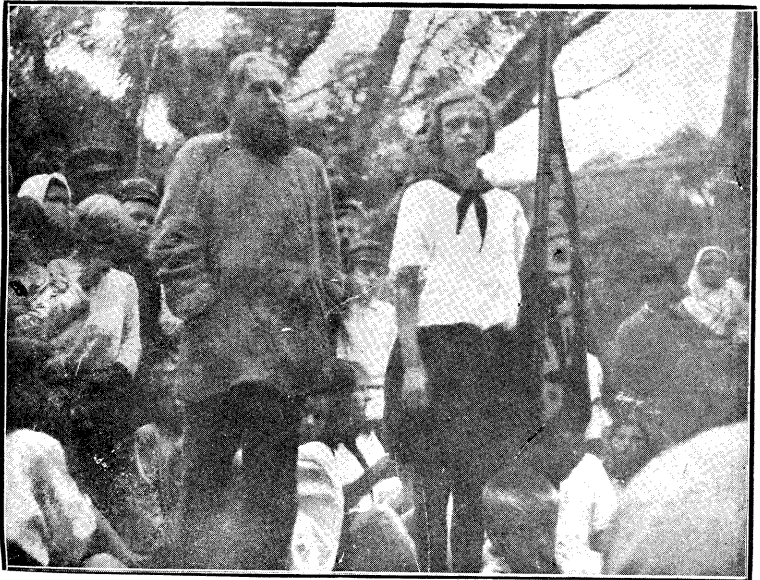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4888

紀念沉摯而勇毅的亡友劉敦！

中 會 村 在



蘇維埃村會中，一個工人向一羣孩子宣講共產主義 右方執旗正立者
即『皮柯涅爾』(童子軍)

俄國農民與革命

俄國農民與革命目次

序

- 第一章 俄國農奴生活一瞥
- 第二章 農奴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 第三章 兩百年中之農民大暴動
- 第四章 農奴解放之經過
- 第五章 解放後之農民生活
- 第六章 農民之思想
- 第七章 十九世紀之革命思潮與農民運動
- 第八章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後
- 第九章 三月革命後之農民問題
- 第十章 農民問題之解決——多數黨與農民
- 第十一章 蘇聯農業之現狀
- 第十二章 蘇維埃農村生活
- 第十三章 農民之自白

附錄 大事記

序

俄國的農民是一個不易索解的謎。

他通常被稱爲『愚昧的人民』(Dark people)，他實在也少知書識字；可是他確比誰都聰明，他能夠很自信地斷言『土地應屬於耕作者。』他佔了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四到九十，是絕對的大多數，因此應該是最強有力的一個階級；可是幾乎近千年來，他永遠是在壓迫奴屬之下討生活，永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爲自己找得一條生路。這樣說來，似乎他是沒有能耐的了，是的，他確是作了一切霸者的神壇上的祭羊；然而，作怪呢，誰不順從他的意志，誰便會滅亡，至少是在極恐慌的狀態當中過可憐的日子。

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裏面也並沒有什麼神祕。我們只要略略懂得他的生活的各方面，只要稍進一步探索一下他的內心深處的寶藏；同時，我們只要翻翻俄皇政府近幾百年的興亡史，我們只要研討一下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何以不

能把住那已經到了手的政權，我們只要細究一下當初並沒有得到多數人擁護的多數黨，何以一旦取得了政權以後竟能支持了十多年，而且不只是支持，實在還在生長，雖然遭受了各方面致命的打擊，雖然確實是有幾分在那兒苦捱——我們只要對於這些事實有了切實的觀察與了解，則對於這『俄羅斯之謎』至少可以索解一半。

像嚼酸棗似的，這一問題探索起來實在有些趣味——便是靠了這『趣味』，作者才開始注意這個問題。這本小冊子不過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千百分之一的說明而已。俄國的農民問題真是一個無盡寶藏，像她那廣袤數千里的偉大的森林一樣的遼闊深遠。貢獻更詳盡的說明是作者自己認定的責任，只是那只能俟諸異日。

也並沒有什麼野心要讀者拿來當作一個了不得的政治經濟大問題來研究——雖然我們也有這樣一個『謎』正排在面前——否，沒有這樣想，只是希望讀者用一種好奇的心思拿來當作一個有『趣味』的，耐思索的問題來看，就覺得很滿足了。

本書的材料大部份是取材於下面的三本書：Maurice Hindus's Russian Peasant and Revolution, Bernard Pares' A History of Russia, 和 A. L. Strong's Peasant Life in Soviet Russia。此外還參攷了中英文書譜約十數種。深以不能俄文爲恨，因爲間接受材料是很難確說『信』字的。

偉 森 識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在滬郊

此页无页码

第一章

俄國農奴生活一瞥

地主之家：農奴所受的虐待

農村生活情形：住屋——衣服——飲食——交通

「女管事烏尼亞娜在通到父親房裏的走廊中躑躅着，不敢向前走，又不敢退轉去。最後，高聲唸了一篇禱告詞以後，她纔進了房間，用一種幾乎難於聽見的聲音報告着。她說家裏藏的茶已經完了，糖僅僅還有二十磅，別的食品也都告罄了。

「折白的，強盜偷去了！」我的父親吼着。「你是他們一夥的！」他的聲音像電轟一樣震激了全屋。我的繼母沒有插嘴，任烏尼亞娜去受氣，父親又道：「弗拉爾，請公主來！她在那裏呀？」當公主進去的時候，他又是一樣一頓斥責。（按貴族的女兒通稱為「公主」。）

「你也是同那些賤種一夥的：你庇護他們！」這樣的話吼了半點多鐘。

『於是他着手審查賬目。同時他又想到了乾草；弗拉爾奉命去稱量現存的乾草。繼母奉命去監督稱量，父親就去計算草欄中應存的數目。審查的結果，乾草着實用去了不少，而烏尼亞娜又報不出若干的用途來。父親的聲音變得更為嚴厲而可怕了。烏尼亞娜顫慄不已，其實父親此時是在罵那剛進房來的馬夫。父親跳到他面前，痛擊他，可是他仍然反復地說着：「老爺必定算錯了。」』

『父親把賬目又從新一算，這次的結果，却是現在所存的比賬上應存的還多了。然而吼聲仍然繼續響着；他現在便罵馬夫每天沒有把馬料喂足。可是馬夫却發

誓證明他每天的馬料喂得很足，並且弗拉爾更求繼母證實馬夫的話。

『父親仍是怒氣填膺。他又喚馬加——馬加是奏鋼琴的，又是副管事。他來了以後，父親便歷數他現在一切的罪過。他前星期喝醉了酒，並且昨天也必然是醉了，因為他跌碎了半打盤子。實在，跌碎了盤子乃是這一陣風波的原因。我們的繼母早晨把這件事情報告了父親：烏尼亞娜今日被責之所以更嚴於平日，乾草的檢驗之所以毅然舉行，並且父親之所以不斷地吼着說馬加這賤種應受一切的責罰，都是由於這事而起的。』

『狂風急雨似的盛氣忽然平定了。父親到棹邊坐下寫了一張條子。『拿着這張條子把馬加帶到警局裏去，讓警局把他笞責一百。』』

『恐怖與絕對的沉默籠罩全屋了』。

『鐘敲四下，我們都下樓去吃飯；可是口味都極不佳，盤子裏的湯都沒有動。我們一道吃飯的有十個人，每人身後有一個侍殮的樂師站着，都捧着一只乾淨盤子，可是馬加並不在裏面。』

「『馬加在那裏呀?』繼母問着;『叫他進來。』

『馬加沒有進來。第二次叫了,他纔進來。他臉色灰白,勉強振作而又帶慚愧,眼光注在地面上。父親眼望着他的盤子。繼母看見我們沒有動湯,便想鼓勵我們喝牠。

「『你們沒有找着湯極好喝嗎,孩子們?』她說。眼淚叫我不能聲響了;飯一吃過我便立刻跑出去,在一條黑暗的走廊中捉住了馬加。我想吻他的手,他却推開了,似怨似向她說:『不要理我吧——你,你長大了的時候,你不會恰是這一樣嗎?』

「『不,不,決不!』

『然而我的父親還不算地主中最壞的;實在僕人們和農人們還以為他是最好的一個。我們在家裏所看見的那一些情形,各處都是一樣有着,且每常更兇狠些。笞責農奴是警局的一種循例的義務。』

上面這一般是從克魯泡特金著的革命家某傳中摘出的,是描寫在頒布解放令(一八六一年)的前數年,俄國農民在農奴制度之下的生活狀況。我們知道,因為所

謂文明的進步，在解放令頒布的前數年中，俄國地主對待農奴已經是改善了不少的。我們更從米斯奇的農民問題一書中找出了在此時以前地主所虐待農奴的一些實例。

『……有個地主吸取農奴之妻的乳飼養獵犬。有個地主強迫農奴吃毛髮，使其斃命。有由便所逃脫的農奴，被捕回之後，將其頭塞入便所以殺其身。有某農奴之女戀愛了農奴之子，致遭撲殺。客來的時候，使農奴的女兒作招待，這便是地主待客人的禮儀。有不堪苦痛而欲自殺的農奴，被發覺之後，縛以鐵鎖，繫在廚屋柱上五年，此農奴便因此斃命。住在都會的地主，每年巡遊領地一次，並藉以獵取農奴之子女供使用，這稱為「巡迴慰樂旅行」。更有購買農奴之子，令學技藝，成年之後，以高價賣給走江湖的藝手。……』

總之，暴虐殘酷，不顧人類的感覺性，不同情於人類的疾苦，這是農奴制度下一般地主對待農奴的常態。

再說到農村的生活情形，則「簡陋齷齪」四字，可以

概括盡了。

先說住屋。在俄國北部森林地帶，農民的住屋多為兩層的木屋，牲畜住樓下，人住在樓上；更簡陋的則為平屋，到了冬季，牛羊豬犬都和人雜處在不滿方丈的小屋中。南方的農村住屋多為泥合草築成的，較進步點的則牆壁都粉為白色。農村的住屋都是屋背向街的，當街並沒有門戶，前門反在後面；門前有一小天井，圍着的是草堆，糞窖等等，天井裏滿積着穢物，臭氣襲人，天雨時則幾乎變成了一方泥塘。屋裏通常分兩間，外間為起居工作殮宿的地方，裏間則為廚房；家俱很簡單，一棹兩櫈而外，便只有屋角供的聖像；屋內東西既是狼籍滿地，又都污穢如爛泥一般，床上更滿散着雞糞。夏天農忙的時候，婦人常將出世纔兩三個月的嬰兒丟在家裏，自己跑到很遠的田地裏去作工；嬰兒獨自在污穢的牀上亂爬，肚子餓時便咬那縛在手上或腳上的黑麪包或馬鈴薯——這種嬰兒約有三分之一都是過不了第一回生日便夭亡了的。冬天則滿屋醞着烟臭，終日閉着門戶，婦人們便蹲在屋角裏的星兒樣的神燈下作些生活。

說到穿的衣裳，除了隣近莫斯科紡績工業較發達的地方以外，大約以麻，大麻以及羊毛的手織品爲唯一的材料；不過幾乎都沒有替換的衣裳，至於襯衣是全然沒有的。一件衣裳破了，儘是補綴，等到後來，補上加補，竟完全變成了另樣的一件衣裳了。冬季寒冷，雖然有將毛作裏子的羊皮上衣，但是大多數的家庭中都祇有一件，所以只老年的人交互使用罷了。腳上穿靴的很少，偶然在節日穿一下，但也都是粗劣的牝牛皮的長統靴；平時穿的，係木的肌皮編成的。女子頭上都裹一方頭巾，少女們偶然得到了一方紅色頭巾，便要爭耀鄉里。女子自製襪穿，男子多用爛布裹足以代襪。

至若飲食，俄國的農民還都有麪包吃，若不是遇着飢荒的年代；却也祇有麪包吃而已，並且消費量也小得驚人！即以歐戰前五年間的平均數看來，每人每年麪包的消費量：美國人爲二千二百二十磅，俄國農民則僅七百六十磅。而且俄國農民所吃的只是燕麥或裸麥的黑麵包；小麥是全然賣去了，所以他們把白麵包簡直看作奢侈品。再如肉類，即供富裕的農民，除星期日

或節日外，也是從不沾唇的。

農村中的住屋佈置得非常凌亂，毫無秩序，若憑高一望，便只見許多茅草屋頂在幾條泥溝間亂拋着，所可引起人注意的便只有高聳在一切屋頂之上的教堂，金色耀目，在幾里外都可望見——這是上帝與俄皇存臨於各農村的標識，農民都自視若草木，甘心拜禱於這巍巍的金頂之下。

農村中與農村間的交通可以說是最『原始的』的了。一條一條很廣闊的土道，春秋二季便完全成了泥海，這一時間中鄉村間的交通完全斷絕，偶有幾座木橋，却也都腐朽傾塌或被水沖去了；並且道中遍處都是深坑，人或牛馬失足陷在裏面便會永遠埋葬在泥海中了。夏冬二季，土車在灰土中或深雪中留下的長轍便是鄉間唯一的陸路交通機關——有人說我們北京的街道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俄國農村的土道恰是如此情景，只是程度更甚罷了。據計算，俄國全地面每一百方啓羅米突，只有一啓羅米突的鐵路，半啓羅米突的平面馬路。

關於耕作方面的簡陋情形，我們將在後面詳細說到。

以上便是幾百年來，佔俄羅斯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生活的情形。

此页无页码

第 二 章

農奴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自由種族』時代的俄國農民

諾曼人之侵入——農奴最初的影子——奴隸數量之增加——
——當時社會的階級

蒙古人假手於諸侯的統治——Nomestya 之發生與發展——
——大地上的寺院——兩種的農民

農民自由離職之結果——『波里斯哥都魯夫』敕令——
——迫遷期之延長——農奴制度之完成：『烏羅善尼』新法典

農奴制度之發展——逃奴之加多——對於逃奴之處分——

農奴佔全人口一半以上(一六七八年)

在最初，俄國的農民本是歐洲最自由的種族。他們生活於他們的共產社會——『米爾』(Mir)——之中，握着為全體所共有的土地，彼此協力合作，並共同享有自己的出產。他們自己選出首長，處理着關於公共的事務，一切都實行自治。他們是一種自由的公民——當時還說不上有什麼集權的政治組織，他們因此也並沒有對外的何等政治上的權利與義務。

西歷八六二年諾曼人羅利克(Rurik)侵入以後，此自由的斯拉夫民族便開始為奴隸的命運所征服了。羅利克的侵入，在和平的俄羅斯地帶造出了不息的戰爭。戰爭中的俘虜都成了奴隸而作為商品販賣。後來，奴隸的成分更擴大了：和奴隸結婚的人，破產的人，無定期的僱傭人，却變成奴隸了。又因為農業的發達，奴隸已經不再作商品而都放到農業中去——這便是農奴最初的影子。

戰勝之餘，功臣所得到的賞賜便是土地和奴隸，廣有數千奴隸和牲畜的田莊因以成立。在此種情形之下，

許多自由的農民都感到了取得某種保護的必要。於是便投身給握有大田莊的諸侯或王公(大地主)的部下，爲他們傭工——田莊上便給予這班農民以若干土地與牲畜，出產則均分，有時農民且祇能得到四分之一。若是後來離去而不歸還原物，或是在契約未滿以前企圖逃脫，這種人被捕獲以後便成爲正式的奴隸，失去其一切自由。

同時，因爲農具與耕作法的簡陋，土地的過小，自由農民的破產極爲迅速。而最大的原因是戰爭的頻仍，把長期穩定的經濟基礎動搖了，一班自由的農民有時遂不得不求助於較富的隣居。舉凡種子牲畜，農具之類都常感缺乏，他們只得向富有的隣居借貸或購買，而以自己的勞力償其代價。有負債過重淪爲赤貧的，便自願爲富有的地主作有限期或終身的服役，這直是一種『志願』的奴隸了。

這一時期的發展(從九世紀中葉到十二世紀)，使得當時的社會形成了無數層的階級。最上層的是大地主，一切高等的官吏都是從這一階級中選拔出去的；他

們同時因為放債給商人，所以對於商業也有着最大的影響。其次是一種叫作Zhityi的地主，他們有着中等的資產，但是實際他們多半還是經商的；他們完全和大地主一鼻孔出氣。其次是叫作Zemtsy的鄉民，實際是城中的居民，不過有點小產業在鄉村裏；其次是商人；其次是技師和工人，他們也是有着出席 Veche（公民會議）的自由的；在鄉間，則有Smerdy（獨立的自耕農），其次是 Polovniki，這是一種佃農，他們所收穫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都是要交給地主的；而在社會的最下層便是那無數萬千的奴隸了。

自十三世紀蒙古人侵入以後的三百餘年中，因為蒙古人禁阻與西方及南方的交通，俄國農業的發達乃遠超過了商業的發達之上。可是農民的生活却更陷於不堪問的境地了。蒙古人統治俄羅斯，是假手於各當地的諸侯的。這些諸侯，爲了擴大自己的力量並企圖脫離蒙古人的羈絆，便極力擴張軍備。對於著有功勳的，都給以特殊的獎資；凡是男子到了十五歲，都須到政府登記入軍籍，政府即給與一種獎賞；女子到了十五歲，若是

嫁給一個可以充兵役的人，政府即資助她的嫁奩；在各地的駐軍，都給以相當的賞賜——這種種的獎賞並不是金錢勳章，而是土地。同時，因為軍費的浩繁，中央政府不能供給偌大的費用，所以一切駐軍的費用糧糈都須由各駐軍所握有的土地中去抽取供給。這樣便可以維持極大的軍備。所謂 Pomestya (地主) 便是在此一時期中(十五世紀)發生的。凡是從政府手中作為賞賜而得到土地的地主都叫作 Nomestya。最初還只限於軍人，後來政府的官吏職員也都能領取土地的賞賜，於是 Pomestya 便逐漸成為一極廣大的階級了。謹靠祖上遺傳的土地而成爲地主的叫作 Votchiny。這兩種地主在先還是並存着的，後來便是 Votchiny 也都被強迫而充軍役，兩者便不能再有差異了。我們可以說，在俄國，土地之獲得，唯一的代價或方法是去爲俄皇政府充奴僕；另一方面，俄皇政府的一切軍政費用都須取給於這些地主，這也是至明顯的事。

其次是寺院的僧侶，他們也佔有頗廣大的土地。最初，寺院之設立不過是由於一班諸候或王公的慷慨好

施而已，農民自建的寺院亦並不多。在諸侯並立的時期中，僅僅在每一小諸侯的國都之門建立寺院一所，可是時序漸進，僧侶加多，寺院乃紛紛建立，窮鄉僻壤都有着金色尖頂的塔影了。寺院之豪富至可驚人。我們從歷史上讀到，一個寺院的方丈所住的地方不過是一間小屋，而他的寺院所佔有的土地竟達左右各五英哩以外去了；另一寺院握有二十村的土地，各村中的統治權都在這一寺院手裏。至若有名的聖西里寺 (St. Cyril) 在一五八二年握有七萬英畝土地。Trinity 寺有僧侶七百人，而其每年收入，以現代的金融單位計算起來，竟達兩百萬美金之多。寺院的財產，多部分是靠了地主的佈施，因為地主們都以爲向神致禱詞必須在寺院裏方免褻瀆，而給與寺院的報酬便多半是土地。而寺院對於一般農民的剝削也不在少數。一個農人到寺院裏作一次禱告，寺院便要十盧布的酬金，還說這是至少的數目。許多瑣碎的事情，即如一個寡婦去詢問她的女兒應得的嫁奩的若干等等，只要是和寺院發生關係的事，便得受寺院的敲詐。——而這一切的剝削敲詐却都是在『使

你們的靈魂得安靜』的名義之下進行的。

在這樣的賞賜與剝削的情形之下，土地大部分都逐漸集中到寺院和功臣的大地主手中去了。據十六世紀中葉的調查，全俄國的肥沃土地有三分之二在諸侯，王室，功臣與寺院等大地主的掌握之中。

在另一方面，大部份的農民多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爲手無寸鐵的游民。這許多農民的唯一生存方法是向富有的隣居或大地主租地耕種，並且牲畜和種子也都不能不仰給於他們，在田莊上還得造屋居住（倘使他是從別處流落來的）——這一切都不能不向地主舉債，並且承認『非償還即不能離去』的約束。通常的規定是：若租地的農民已經完納了所應繳的租穀和債款等等，他便可於『聖佐治節』（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前後兩星期中離去舊主，另覓生路；此外任何時候是不許離去的。所應繳的租穀債款，若不能繳納時，須以勞力作代價。

此地，我們須得說明，這時期的農民可以概分爲兩種。一種是耕種王室所有地的農民，他們都是向王室

土地經管處註了冊的。他們組織在一種協力合作的『米爾』形式的村落之中，由全村的名義向國家負責繳納每年的租稅。這一種農民多半還不至十分艱難，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大家族制度之中，常可以把沒有註冊的子弟送到外面去傭工，增加家庭的收入。另一種是移民——游離的農民，他們多半是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大家族中過剩的子弟以及不堪壓迫而逃去的僱農佃農和奴隸。這時俄羅斯的疆域已經是向北方，東方和東南方擴展着，如潮水一般的移民都向這幾方面湧去。一部分被寺院吸收去作僱農。另外許多都被邊疆的大小地主僱去，因為這些地主正苦勞動力的缺乏，不能夠償出對國家應付的軍役賦稅。

最初，一般貧農雖然失去了土地，可是在地主處充佃農僱農的時候，還可以自由改換主人，他們也不顧什麼契約，只要覺到不安，便担起他們那種簡單的農具——木犁，懷着他們唯一的財產——勞動力，闊步天下，另尋噉飯之地。這樣自由離職的結果，便使勞動力大感缺乏，地主們彼此便爭以較優的條件誘致他方的傭工。

在十六世紀下半期，大地主誘致小地主的傭工更爲盛行，後來竟完全取一種拐騙的方法。據克留切夫斯基的計算，一五八〇年在特維爾 (Tver) 一省移民極多，在這一數目中，僅百分之十七是依正式手續離去的，百分之六十是被地主拐騙去的，百分之二十一非法棄家逃去的。這種情形使得政府與地主都感到極大的困難：第一，因爲大部份人民終年不斷的遷徙，收取租稅極感困難；第二，因爲勞動力不斷的流動，供給不均，致土地的生產力日益銳減，地主對於國家的擔負無從付出。於是禁止農民任意遷徙並且要求追還逃農的呼聲高起了。回應此種呼聲，政府遂於一五九七年頒佈了削減農民遷徙權的『波里斯哥都魯夫』 (Boris Godunov) 的敕令，這便是一班人所稱的農奴制度的起源。

『波里斯哥都魯夫』敕令規定：農民每年只能在『聖佐治節』遷移住處或更換工作處一次；若有在此日以外逃去的，地主在五年內可以有權用武力將脫逃者強拘回來；同時禁止從小地主的田莊上拐騙傭工。一六〇一到一六〇二年之間，政府又敕令：較小的田莊上的傭工

可以轉徙，但這不能應用於王室的，寺院的以及高級官吏的田莊上。一六〇七年，政府又敕令：將五年的追還期改爲十五年，並且對於藏匿脫逃者的地主科以十盧布之罰金（當時是很大的一個數目）。於是地方警察乃至地方的牧師，都十分積極活動着，察偵脫逃者的蹤跡。此一敕令實際並無何等效果。一六二一年以後，地主再四地向政府要求將五年的期限實行改爲十年。Tinity 寺是第一個獲到此種特權的大地主。其他的許多地主都各自與傭工訂約，規定若有企圖脫逃的便須受拘禁之處分，或是，在未離去之先，須找得代替人。一六三七年，烏克蘭地方的地主得到了十年追還權。一六四一年，莫斯科屬地的地主也都得到了此種特權。地主於是更進一步要求撤銷年限的限制，地主應有無限期的追還權，接着，一六四二年三月十九日敕令：十年追還權通用於一切地方。同年，十年延長爲十五年，到了一六四六年，時間的限制完全撤銷了。追還權有年限的限制，這是佃農僱農唯一的生路；現在因爲國家對於地主的負擔加大，不能不應地主的的要求，將農民的唯

一生路亦爲之斷絕，從此這班農民便永無正式脫離舊主的羈絆的機會了。自此以後，政府復規定：所有地主的佃農僱農都應向政府註冊，已經註冊的便須永遠爲此地主服役，並且他的子孫亦不能隨意逃去舊主，因爲他們的父祖在註冊簿上有名字的。到了一六四九年，青年的俄皇亞勒克西士(Alexis)因爲受了前一年莫斯科的農民暴動的影響，便發佈了『烏羅善尼』(Ulozhenie)新法典。這法典把以前各次的敕令都作成了法律，地主僱傭的農人因此都變成了『法定的農奴』，農奴制度至此便完全成立了。『烏羅善尼』法典又規定：地主可任意予農奴以笞刑，嚴禁農奴控告地主；對於脫逃的農奴及容收脫逃者的地主，都規定了極嚴厲的處分。自此以後，農奴與奴隸的分別完全泯滅了，農奴且已成了動產之一種。

農奴制度之採用，初不過爲便於征收租稅，並保證地主的出產，並沒有奴隸個人的意思，這是很顯然的。所以，所謂『農奴』只是一個終身僱傭的農人，舉凡僱傭人，應有的權利與安適，他都應保留享有。可是，時間過

久了，初意漸失。早在一六二五年的時候，法律便規定：任何人殺死了別人的僱傭農人，只須以自己最好的一個僱傭農人並其家族送給受害者，便可了結。這完全是前代對付奴隸的辦法，此時亦用來對付僱傭的農人——農奴了。地主完全佔據了如『米爾』中的首長的地位；他對政府負了完全的責任來處理自己的農奴，他對於所屬的農奴實際是有着絕對的權力的。一六二八年，法律會規定：地主所欠的債務得取償於他的奴隸及其僱傭的農人。一六七五年，法律認可出賣農奴；其後，農奴可以自由地作為贈品，交換品，或是作為債務的抵償品。後來，地主已經成了農奴的唯一統治者，國家一切的刑罰，除了死刑而外，地主均得任意施之於農奴。法律嚴禁農奴控告地主，嚴禁農奴任意離職從戎，違者均得由地主處以笞刑或終身刺配西伯利亞。

在地主的剝削壓迫之下生活着的農奴，從前靠了打漁，養蜂或植樹等副業的收入，得以維持相當的生活，後來臨頭的老是饑荒破產；但是法律上既然規定了不許離去舊主，私遁的事乃更加多。政府唯一補救的

方法是提高地主的權威，加重私遁者的懲罰，一六五八年，法律認定私遁者爲刑事犯，因爲他們直是劫奪了地主的財產。一六六一年規定，凡是地主容收了私遁的農奴者，卽由此地主交出自己的一農奴並其家庭，與私遁的農奴一併送還原主，作爲懲罰。一六六四年，政府下令舉行全國大檢舉，凡是容收私遁者的地主卽處罰『交出四個農奴並其家庭』。一六六七年，法律規定：凡是私遁的農奴到他處作了牧師或僧侶的，被發現後，卽遞去其現職，仍遣還原主。一六八一年，費多爾二世 (Fedor II) 把『交出四個農奴』的處罰改爲一個，但因爲無數地主的要求，次年仍恢復了四個的原案。後一年，容收逃奴的處罰改作罰金二十盧布或受笞刑。一六九四年，彼得大帝將此種處罰應用於一切容收逃奴不立刻申報政府的地主。

從上面寫的看來，農奴之公民的與政治的權利固已完全被法律剝削，便是人類應有的權利也都喪失盡淨了。農奴的身體固已屬於地主，便是他的全人格也都隸屬於地主了。這種已經是『非人了』的農奴，在十七世

紀後半期與十八世紀時代，數量增加的速率極大。俄國著名的歷史家柯華勒夫斯基說『俄皇時常把屬於『米爾』的土地（即王室的土地）賜與諸功臣，此「米爾」的自由農民便都被迫而爲此項土地之接受者的農奴了』。據計算，到了一六七八年，全人口的一半以上，都因此種賜賞，由自由的農民而變成了農奴。

此页无页码

第 三 章

兩百年中之農民大暴動

『多亂之秋』時代的暴動：僞王『德米特里』之政變——波羅

涅可夫大暴動——『都深之賊』

十七世紀初之重稅——嚴懲逃奴

十七世紀之大暴動：莫斯科暴動——梳耳費捷柯次克，烏次

格，魯弗戈諾特之暴動——卜斯戈甫大暴動——拉貞

長期大暴動

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之新政與重稅——彼得大帝與農民

——新人頭稅——兵役——脫逃——追緝——布拉文

之亂

加特林一世與伊里查伯之窮奢極欲

布卡捷夫長期大暴動

農奴制度長成之『頂點』：加特林二世與保羅之『功績』

十七世紀以來，壓迫與貧窮對於俄國的農民，如鐵鎖盤練一般，愈束愈緊，愈壓愈重。可是，『壓力大則反動力亦大』，這是物理學上的公例，在社會階級發展的進程中，也全部可以應用。我們將在本章中說出俄國農民在嚴重的壓迫之下是如何掙扎求生的。

俄國歷史上有一所謂『多亂之秋』的時代 (The time of Troubles)，那是指的自一五八四至一六一三年這一時期說的。這時期中因為俄皇宮廷構亂，中樞失主，以致全國鼎沸，『假皇帝』遍處皆是，爭以『皇室正統』相號召，我們可以記述的最初的幾次農民大暴動便發生在這一時期。

在十六世紀末，農奴制度正在開始形成之中，農村中已經陷入非常不安的狀態，一六〇一年到一六〇四年間，俄國各地又發生了大饑荒，許多大地主都無力

養活多數的扈從奴隸，於是這班被革除的農民奴隸都向南俄邊境『戈薩克』地帶逃去，和當地不滿意於政府的份子結合起來，嘯聚行劫，稱霸於四方，有的且侵及莫斯科附近一帶，如柯莎拿卜 (Hlopka Kosolap) 所領導的一股便是——他繫斃了莫斯科王波里斯的將軍一人，可是不久仍被官軍擊敗，本人被捕受了絞刑，從者被殺無數。而這時最厲害的却是僞王『德米特里』 (Dmitry) 所領導的大暴動。僞王『德米特里』的真名，據傳是阿特列卜也夫 (Yury Otrepjev)；他的父親曾充諾曼魯夫 貴族廊中扈從，他幼時在邸中的時候常公開地聲言將來他必有統治莫斯科的一日。這件事被波里斯的偵探知道了，他便改裝遊方僧逃去，易名為格列戈里，遍歷各地寺院，得任某教區教的書記；但不久又被人發覺，再逃去，過了立陶宛的邊境，在波蘭貴族維司留維奇家覓到了一個扈從的位置。一次，他病了，便粧作臨終的悔懺詞，說自己是伊凡四世的太子德米特里，雖被暗殺而實未死。旋病愈，波蘭貴族多以王者之禮相待；一六〇四年，波蘭王更暗地與以幫助，使反抗莫斯科

王波里斯，阿特列卜也夫這時便公開豎起『德米特里』的旗幟，痛詆波里斯謀殺之罪。這是無可質證的事，信否本可由人自擇的；可是因為波里斯是衆怨叢集的目標，於是『德米特里』便得到了極大的贊助，在波蘭，尤其是在莫斯科王國境內。一六〇四年十月，『德米特里』率衆向莫斯科進攻，迭克名城，軍事進行極利。不久『德米特里』部下已有四萬『戈薩克』，駐軍在蒲吉弗耳（Putivl）鎮和政府軍對峙；政府軍方面的軍力卻日形削弱，士氣不振，兵士都說，『和一個真正的皇帝打仗，這是太難了。』一六〇五年四月，波里斯驟死，五月，波里斯最親信的巴司曼魯夫將軍和其他重要王公數人都都宣言承認『德米特里』是真太子，『德米特里』遂入駐莫斯科，殺死波里斯之子費多爾，正式即王位。

『德米特里』頗具有勇氣和幹才。他知道自己之能取得王位，完全是因為民衆渴望他來解倒懸而與以贊助所致。因此，他即王位之後，第一道上諭便是減輕『奴屬制度』。所謂奴屬制度，便是不能還債的農民賣身於債主的制度。接着他又頒布命令，宣佈廢除處罰逃農的

苛例，允許逃農各就現所在地安居樂業。他這些法令當然能取得『戈薩克』和農民的同情。可是貴族地主却大大不滿意了！固然，『德米特里』並不是完全代表農民的，當他發難之初，有一部份小貴族不滿意於當時在朝的大貴族，因而也贊成他的；可是到了後來，『德米特里』的政策差不多完全和地主階級的利益相反，所以一六〇六年五月，貴族聯合一致，帶兵入克里林宮，將巴司愛曼魯夫和『德米特里』殺死，焚屍於紅場，並將兩人的骨燼投在砲孔裏向波蘭一方射去，因為他是從波蘭來的。

然而，農民的暴動並不曾因此而停止。當時騷動得最厲害的是西南部塞維爾斯克一帶地方，發難的羣衆仍舊是『戈薩克』及不滿意於政府的貧農。以伊凡·波羅涅可夫(Ivan Bolotnikov)爲領袖的第二次農民大暴動接着又起了。

波羅涅可夫是一個奴隸出身；他也是以擁護『德米特里』王爲名的，同時却豎起了極鮮明的階級戰爭的旗幟；他宣佈：奴隸應盡情殺戮自己的主人，把主人的妻

子兒女都可以擄去；農民可以把地主的財產全部收歸己有。當時還有許多在邊疆的小地主乃至如親王沙可夫斯基等也都與波羅涅可夫建立同盟，一致行動。可是這完全是一劇同床異夢的滑稽戲，因為小地主的目的是在於反抗貴族大地主，親王沙可夫斯基等則完全是想乘機取得王位；所以，當波羅涅可夫順應着民衆的殷望，領兵向莫斯科時候，那班同盟者已經發現了自己原來走的是絕路，便立刻倒戈，遵從政府的命令，出死力以禦波羅涅可夫的進攻。波羅涅可夫爲政府軍挫敗，只得退守都拉待援。這時，全俄羅斯東部，從拍爾姆與維亞特加沿瓦爾加河而下，直達亞斯特拉汗，無處不有暴動烽起，參加的都是農民，『戈薩克』和奴隸，聲勢浩大，震撼着全俄的統治。一六〇七年五月，莫斯科王瑞斯基不得已，乃親率十萬人向都拉圍攻，波羅涅可夫被困，士卒饑苦，而各地的暴動亦相繼被壓伏，外援絕望，最後，都拉被攻下了，波羅涅可夫溺死，此第二次的農民大騷動便又被壓迫下去。

當都拉被圍之際，曾遣使求救於波蘭，於是，第二

個僞王『德米特里』又出現了。關於第二僞王的身世，極少人知道。他的部下有兩大隊人馬，一隊是洛真斯基 (Rozynsky) 所領導的波蘭的游民，一隊是查路斯基 (Zarotsky) 所領導的頓河流域及德涅泊河下游一帶的『戈薩克』。新『德米特里』王於一六〇八年春在互耳合甫地方擊敗了政府軍，並準備向莫斯科進攻。第一個僞王的皇后馬林娜 (波蘭貴族之女) 和皇太后馬爾沙，(真德米特里之母，原在寺院爲尼，被第一僞王劫去，強迫其承認僞王爲其子德米特里) 這時剛由莫斯科政府釋放，首途遄歸波蘭，却在路中爲第二僞王截獲，於是馬林娜仍舊作了『德米特里』的皇后，馬爾沙又承認這新僞王是自己的兒子了。六月，新『德米特里』王進駐都深 (Tushino)，被衆尊爲王，稱爲『奴屬之王』，俄國王家的史官便都稱爲『都深之賊』。

都深在莫斯科西北，距離頗近；這時俄國實際有兩個首都：一是莫斯科，爲地主富商所擁護的王巴西耳駐在此地；一是都深，駐蹕的便是那爲農民『戈薩克』所擁護的『德米特里』王。然而，地主富商依自己的利益而

易其趨向，自不必說；便是農民亦多因其小資產階級性而不能有堅決的態度：所以，實際上，當時從王公以下，幾乎都是依違兩可的。儘管此時在歡樂地共殮聚談，分手後，一部份人可以跑到巴西耳的宮中去，另一部份人，用當時的習語來說，便可以『溜到都深去』；有些人甚至於在兩方任事，兩方領取薪金。

都深與莫斯科對峙了約兩年，莫斯科西北部有二十二城鎮在都深治下，東北部許多城鎮也都開始討論歸順都深的問題：『戈薩克』在所佔據的地方都盡情地殺死富商地主，劫奪其穀物財富，沒收其土地田產。可是因為莫斯科方面從瑞典借得精兵七千人，而都深內部又起內鬪（此時波蘭王想乘莫斯科內亂取得漁人之利，因而進兵司莫倫司克，要求都深受其指揮；莫斯科方面又以愛國主義為餌，令都深拒絕波蘭人，都深內部遂起內鬪），新『德米特里』王只得僞裝農民逃至卡路加（Kalyga），於一六一〇年被殺。

這樣一來，都深的農民運動便分裂了。少數的『戈薩克』仍舊不肯投降莫斯科的鉅商貴族，便被驅逐，沿

瓦爾加河而逃往東南部，準備他們更大的鬥爭去了。

『多亂之秋』的時代過去以後，羅利克的遠裔米哈爾一世重據皇位（一六一三年），開始了諾曼魯夫皇朝（Romanov Dynasty）三百年的統治。十七世紀上半期，因為米哈爾及亞勒克西士的各方侵略，故軍費之支出至可驚人；即如一六五四年至一六五五年間征伐波蘭一役的費用，竟與一六五五年以後二十五年間的全國收入的數目相等，便可見一斑。這許多的錢從什麼地方取得呢？

我們看出，主要的來源是直接稅，特別是土地稅。土地稅的徵收最初是以已開墾的地面為標準的，可是許多已開墾的地面都早已荒蕪了。所以，此時期徵收地稅便改作以戶口為單位——這是企圖以土地的担負加到耕作者身上去的第一步。此外，還有許多為特別目的而徵收的特別稅——如，贖取罪犯稅，郵務稅，警衛稅等；後來直接稅改成了一種，就是把各種稅的數目總起來成爲一個總數，這是爲了徵收時便於一次即能得到

一大筆款項的原故。可是政府更注意的是間接稅。許多日用品，爲烟酒之類，都由政府專賣；鹽稅之高，在一六五〇年，竟達鹽的原值六倍以上。這一切的負擔，一重重都是加在最貧苦的農民身上的——貧苦的命運只是更貧苦！

同時，農奴因受壓迫而私遁的，已如前章所述，日益加多，而政府的處置則日益嚴厲。後來，農奴竟多有殺死地主，焚燬田莊而挈家遠遁的；政府的處置則爲拘禁，充軍，打死！

政府與民衆兩方面至此已成兩不相下之勢，一六四八年的莫斯科暴動便開始了這一長期的艱苦鬥爭。此次莫斯科的暴動是因反抗苛稅而起的，俄皇亞勒克西士且身受其厄，哀求羣衆的原宥方得免於死；次日又大火，重起了一次暴動，歷久始息。莫斯科暴動的影響傳遍了全國，各地先後都暴動起來，目的都是直接反抗政府，特別是徵稅的機關。在梳耳費捷柯次克和烏次格都有極大規模的暴動，在魯弗戈諾特，因爲政府把本地的穀米運到瑞典去賣，致本地糧食起恐慌，羣衆

遂暴動起來，丹麥的使臣也被拘禁。主教尼康將暴動份子驅逐出教會，後來為羣衆拘捕，鞭撻幾至於死；俄皇敕令羣衆停止暴動，歸順政府，羣衆以公開的斥罵答之。政府派兵鎮壓，方得平息；但在斯卜戈甫又有同樣的大暴動發生，佔據城池至三月之久，直到後來政府頒布大赦令，羣衆才停止行動。

而在俄國農民的鬥爭史中最佔重要地位的還是一六六七年至一六七一年東南部的長期大暴動。

在十六世紀末，政府為防止克里米的韃靼人之頻頻侵入，便於東南邊境屯駐重兵。此項邊防軍亦並非正式軍隊，乃由邊境之地主及政府委派之官員負責組織而成，頗帶義勇隊的性質。在邊境的生活幾乎全部是軍隊式的，但是並沒有專制的情形，反之，他們的生活且十分民主的，他們有着自己的民主主義的政府，他們自己選出首長，在一種不完全的會議形式之中討論着本地的各種問題。這種狀況尤其盛行於南俄頓河流域一帶，頓河平原且因此被稱爲『自由之母』。各地受壓迫與貧困的農民都以頓河平原爲遁逃藪：他們企求到此地

吸點自由空氣，他們也知道在此地可以謀得較舒適的生活——因為邊境是需要多量勞動力的。這許多脫逃者都以『幫散工』爲生，因為這樣他們可以隨時和主人講工價。他們什麼事都願意幹，打仗，作偵探，經營商業，只要有機會，什麼都好。——這便是有名的『戈薩克』(Cossacks)的起源；所謂『戈薩克』並不是一種族，而是一種行業的人，『戈薩克』一字的原意即是『幫散工的人』。通常聽見『戈薩克』這一名詞，便立刻想到俄帝國軍隊中最可怕的野蠻的馬隊；其實這是彼得大帝以後幾百年來俄國政府招撫暴動的逃農，編成軍隊，給養他們，訓練他們，用以壓迫平民的結果。當初的『戈薩克』，如本書中所描寫的，實是革命的農民之別名哩！

我們要講的這一次長期大暴動，便是在這『自由之母』的頓河流域以『戈薩克』爲中堅爲發動的。最初，農民剛逃出來的時候，因為恐怕追捕，都只在森林中，田地裏與河岸邊藏着。逃來的人聚積多了以後，一時又無以爲生，便成羣結隊明目張胆地向他們的敵人——地主進攻，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確是當時的實情。這時

候，革命的氣焰已勢無可遏，只是還缺乏能指揮的領袖，所以他們的行動終不免是散漫而不經濟。

一六六七年，恰有一羣農民從烏克蘭移向頓河平原來，但都無法維持生活，正當羣衆徬徨之際，一位英雄應聲而起了，這英雄便是頓河流域的農民稱頌爲『國民英雄』的斯提凡·拉貞(Stephen Razin)。拉貞是一個身材高大，意志堅強，既武勇，且精明，而爲友敵所共服的『哥薩克』。他弟兄三人都役於兵，一六六五年土波戰爭的時候，長兄因事被長官處死刑，他便棄兵而逃，誓滅貴族以爲兄復仇。當時在羣情激越之中，他知道有機可乘了，便挺身而出，率衆起事。

最初，拉貞率隊進攻亞卓甫地方，不克；可是雅河(烏拉爾)地方的『戈薩克』却歡迎他前去，他到那兒奪得了砲台，擊退了政府的軍隊，直留到當年的冬季。這時各種不滿意於政府的人——『哥薩克』，脫逃的奴隸，私遁的農奴乃至許多非俄羅斯的人民，都成羣結隊地來歸於拉貞的革命旗幟之下。一六六九年，拉貞建立了一隊海軍在裏海裏航行，劫奪過往的俄國船隻，打败了

一隊波斯的小艦隊，後來他甚至侵入了波斯的北岸。他領隊北歸的時候，在亞斯特拉汗附近與政府的軍隊相遇；政府通知他，只要他肯放還所劫奪的船隻槍械和所拘捕的地主，政府可以赦免他一切的罪。這時大多數的民衆確是站在拉貞這一邊的，因之，拉貞有恃而無恐，接受了政府的通知却並不去履行。同時，更順應羣衆的心理，把『土地與自由』的標語高揭起來，檄告全俄農民起而從事階級的爭鬥。那檄文的大意說：『莫斯科王國，諾曼魯夫皇朝的人，以前都是我們的傭兵，現在却把我們當作奴隸了。你們在全俄境內咽泣的，快些加入我軍，撲滅貴族和地主，復興自由的俄羅斯！』這檄文傳播很廣，後來連白海地方都傳到了。

一六七〇年，農民革命軍的聲勢大振，拉貞便開始向瓦爾加河上游招募補充隊。兩個極大的城鎮，察里城和加米興，都開門歡迎拉貞；由亞斯特拉汗派來的一隊政府軍反歸順了革命軍，官長都降了，亞斯特拉汗的居民都歡迎拉貞入駐。拉貞到亞斯特拉汗以後，便下令殺戮地主，焚燬寺院，劫奪商店並建立民衆的政權；當地

的縣長被羣衆送到教堂的塔頂上由空拋下摔死了。一次，瓦爾加河中的食糧與囚犯的運送艦隊被一小隊革命軍劫取了，船長及官員被殺以後，水手及囚犯都被釋放。這時候，拉貞更對他們演說：『我給與你們完全的自由。我並不強迫你們任何一個來守候着我。可是要是願意跟隨我的，無論是誰，却必然可以成爲一個自由的人。我之從事戰爭，只是反對貴族與地主，我預備把一切的東西都分給窮人與平民。』這種演說傳到了久被束縛的農奴耳中，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歡悅，大家都爭呼拉貞爲『小爹爹』（俄語，父親之暱稱）。城市中服役於貴族富豪之家的奴僕以及久苦戰爭的兵士，都被這話激動了，各地城中遂時起暴動，鄉村中更不必說了；政府派遣軍隊到各處彈壓，可是被遣的軍隊反與暴動的民衆聯合一氣，反戈殺倒他們的將官。

政府的武力政策既無大效，於是又發佈一種公告，說拉貞是反對皇帝反對基督教的叛徒；因爲他們以爲農民是極忠於皇帝及基督教的，想藉此以迷惑人心，減去拉貞在民衆中的信仰。可是這又是政府的失策。頭腦

簡單的農民固不免迷信神權和皇帝，可是他們更其在意的事是吃飯！誰讓他們能自由吃飯，他們便擁護誰，初不問他是賣國賊抑是愛國者，是異教徒抑是基督徒。所以政府的此種宣傳，在農民中並沒有生什麼影響。

革命軍最先還是在南俄頓河瓦爾加河一帶活動，以沙拉得里，里牙鎮，華洛涅守諸州爲中心；七月末，拉貞又開始向瓦爾加河上游出動，佔據了沙拉托甫和沙麻拉兩州。他的先鋒隊則已佔領了尼幾尼，湯波甫和彭查。凡是革命軍足跡所到之處都竭全力號召階級的鬥爭；拉貞也遍處受着極熱烈的歡迎，民衆都稱他作救世主，而拉貞本人也頗能與士卒同甘苦，指揮作戰，均極奮勇。然而革命軍的活動經時愈久，範圍愈廣，而勢力反漸弱，精神且日益散漫了。情形之所以致此，我們可以說，完全是由於革命軍缺乏一種良好的集中的組織，以指導並整飭陣前營後及至敵軍中的一切活動。因此，他們的軍隊都缺乏訓練，軍需亦極不足，而有能爲的軍官更不多見。拉貞屬下儘多勇往直前的戰士，但頗乏足智多謀的將官。

此時，正當拉貞率隊猛攻的時候，新比爾斯克的砲台竟頑強抵抗，久攻不下，政府的援軍開到，革命軍被襲擊，敗退了，拉貞乘夜逃脫，但已受重傷；他所屬的部隊也被敵人追擊潰散了。沙麻拉和沙拉托甫都不容他存身。他又企圖在頓河平原重整旗鼓，作捲土重來之計，不幸為奸人所賣，被捕送到莫斯科，於一六七六年六月六日，在有名的『紅場』的斷頭台上，受了肢解的酷刑。

拉貞雖然死去，可是中部一帶的暴動民衆和潰散的軍卒仍舊不斷地在各處騷動着，農民仍舊到處殺死地主和官員，『戈薩克』仍舊佔據了許多城鎮。經過了政府軍極殘酷的屠殺，暴動纔逐漸鎮壓下去；據估計，在這一鎮壓之下，至少有十萬農民的血在那兒潛流着。亞斯特拉汗原為拉貞的一個代表坐鎮着的，拉貞失敗後，此人仍企圖向瓦爾加河上游出動，一六七一年十一月終被政府軍戰敗了。

拉貞是南俄農民永遠不能忘記的英雄：在流傳民間的山歌裏面，很多都是說的這位英雄的故事：他們說

他怎樣把俄皇亞勒克西士禁閉在海灣裏，怎樣從新比爾斯克縱火燒到裏海邊，怎樣在瓦爾加河設卡徵收船稅。還有一隻歌說，有一次俄皇親自審問他，問他行劫的伙伴是誰，他答道：第一是黑夜，第二是鋼刀，第三是良馬，第四是硬弓，還有利剪是我的使者——俄皇喜他的大胆的回答，就赦了他，還賜他一座高屋，那屋在平原裏，有兩根柱頭，一根橫樑。在沙拉托甫下不遠有一座拉貞山，便是當時農民紀念拉貞而命名的；傳說若是有人在夜間走上那山頂去，便可以探知拉貞的秘密。實在，他的秘密是什麼呢？今天人人都知道了，是：階級爭鬥！

現在我們要說到復興了俄羅斯帝國的彼得大帝（一六八二到一七二五年）了。彼得大帝的政績無須我們在這兒論述，我們只須記着，在他的統治之下，內政和外交都煥然一新，而這『一新』的基礎則是金錢。卽如，在內政方面，所謂『分科辦事』的原則，實際不過是要幾個人來辦原來一個人辦的事，而這各個人的費用更比原來的一個人來得大。而外交的主要武器之一是

賄賂，這更是彼得所深信而常用的。

金錢的來原在哪裏呢？我們最容易看出的是加稅。據克留捷夫斯基的計算，被徵稅的有：印花，旅館，磨房，土地，天秤，帽，鞋，棺木，私債（政府收取百分之十），皮，沐浴，租契，地窖，水槽，火爐管，鐮刀，木柴，肉販，瓜菜販，船艇，最後還有宗教信仰（對於不信新教的人徵收的），鬍須，結婚，甚至小孩的誕生，都是要收稅的。而這五花八門的稅，一重一重都是要加到農民身上去的——這是很顯然的事。

彼得和農民有着很親密的關係，這是空前絕後的事，沒有一個俄國皇帝及他的。許多農民都不再作『天高皇帝遠』之嘆，他們時常能看見他穿着一件不很講究的衣裳，啣着烟管，隨便的談着話。他很懂得社會全體的福利之重要——從他的談話和書信當中都可以看出。他很喜歡農民，他很高興和他們在一處盤桓；他亦很能看出他的祖宗所遺傳下來的社會制度的弱點。可是，他要滿足自己的野心，他想幹一番事業，他要使衰頹老大的俄羅斯強盛起來，能夠和歐西諸國並駕齊

驅。他的聰明指給了他一條道路，那便是維持並且鞏固農奴制度。所以，他對於各方面都有許多改革，對於農民是全然『仍舊貫』的；而且，不只『仍舊貫』而已，所有他的一切新的建設，都是植基於『農民的進一步的剝削』上面的。研究農奴制度歷史的專家英格曼（Engelmann）曾說，『新加上的重量使得農奴制度的根基更深入地中去了。』即以建築聖彼得堡一事為例。聖彼得堡的原址完全是一塊低濕的田況，須用木樁打入土中築起城基，這一工作須數月方能竣事，彼得乃下令，徵發農奴到聖彼得堡擔任此項工作。我們可以想見這是一種怎樣的苦役——這便是彼得給與農民的恩惠。許多其他的公共建築都是用這同一方式徵發勞力的。

彼得頒布了許多關於農民的新法令：農奴可以隨意喚到地主家中役使，完全和奴隸一樣，這是以前不許可的；農奴的財產實際成了地主的一部份，地主可以任意借用的；地主的法庭是農奴唯一可以訴冤的地方——這等於老鼠在貓子面前告狀一樣的滑稽。

而最令農民不堪負荷的是彼得的新人頭稅。從前

只有土地稅——最初以畝爲徵稅的單位，後來以田莊爲單位。這樣徵稅，至少還有貧富不同之分；因爲土地若是荒蕪了，農民當然可以不納稅；農民還可以想出種種規避的方法，如數家聯合起來，用竹籬圍成一家，便可只納一家的稅。彼得把農村的直接稅改作以人爲單位；所謂『新人頭稅』便是按人徵稅的。這樣嚴刻的剝削，在農民一方面只有兩條出路：一是各人儘可能地多耕田以增加收入，這是很難能的，因爲收入多了，地主的剝削也加重了，實際是白吃力的，而且不是個個人，並且也不是多數人，可以有多耕田地的機會的。另一條路便是脫逃——在農民想來，這反是一條比較安全的路。所以，這時以後，因不堪苛征重斂而向頓河流域脫逃的，成千累萬，有增無已。

而脫逃的另一原因便是規避兵役。彼得爲了想從南方得一海口，曾兩次侵入土耳其，又和瑞典苦戰經年，常備軍數目達三十萬，故軍隊的補充極成問題，乃行強迫徵兵制——這是農民極不願意的。

彼得乃頒布法令：凡是沒有在戶口調查冊上登記

的即作為脫逃者(有許多農民為規避人頭稅,有隱瞞人口的事),而脫逃者以刑事犯論罪。又:農民若不得地主簽名的護照,便不能離開田莊;若旅行到二十英里以外,須將護照呈交當地政府審查簽字。一家之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單獨出門,必須有家長率領方可,因為護照只能由家長具名的;沒有護照而出門的即以脫逃犯論罪。村長容納脫逃犯的當受笞刑,地主容納的當受極重的罰金。

一七〇七年,彼得遣派親王多爾戈洛基出發頓河追緝所有的脫逃犯。多爾戈洛基到那兒拘得了三千人;可是這種拘捕實無異於直接向『戈薩克』挑戰,於是『戈薩克』的領袖即通令所屬起來一致拒抗:在巴哈謨地方的布拉文(Bulavin)乃起而領導暴動,於夜間襲擊多爾戈洛基,把多爾戈洛基及其侍從都殺了。但布拉文本人又為一皇室的走狗馬西莫夫所敗,乃逃到德涅泊河的扎玻洛格地方;一七〇八年,布拉文又重整旗鼓,像拉貞在亞斯特拉戈時一樣,號召階級的戰爭。他率隊擊敗了一枝政府的軍隊,佔據了捷爾加斯克——這

是頓河流域『戈薩克』所在的重要城市，就在當地殺死了馬西莫夫。其他還有許多領袖都在布拉文的同一旗幟之下，劫奪了沙拉托甫，察里成和加米興。一個『赤貧黨』(Goly)號召『一切赤手空拳的窮漢』都起來反對貴族。暴動的發展竟達到了北部的湯波甫；可是因為缺乏組織與紀律，故終於為政府軍所乘。多爾戈洛基的兄弟後來到捷爾加斯克企圖為兄復仇，但為布拉文的信徒所扼，結果自殺了。暴動繼續到一七〇八年十一月，兩千『戈薩克』因此逃到克里米王處充兵役。政府的鎮壓比民衆的暴動更為野蠻而兇殘——暴動終於漸次平息了。

繼彼得而起的女皇加特林一世（一七二五到一七二七年），其苛殘不減於彼得，以致她的近侍大臣，如雅古新斯基和曼希可夫，都感到了農民的負擔已經超過了他們的能力，再這樣下去，他們只是死路一條了。曼希可夫婉轉地向加特林陳說：『農民和兵士是像靈魂和身體一樣，缺其一便不能存其他的。』另一高級官員陳說：『陛下會沒有下民了的！』只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得

出農民是怎樣生活的。

女皇伊里查伯(一七四一到一七六一年)的苛殘更是加甚。這時的酒稅特別加重,因為政府以為:人民即在貧困與悲苦之中,酒總是不能離唇的,加重酒稅自然可以使收入大增。農民的私遁與暴動隨貧困與壓迫而俱增,然而伊里查伯還是拿了一千萬盧布去建築那美麗的冬宮!

現在我們要講到第二次長期的農民暴動了,這是女皇加特林第二時代的事,時在一七七三到一七七五年之間。這一次革命軍的領袖叫作耶米連·布卡捷夫(Emilian Pugachev),也是一位『戈薩克』,從『自由之母』的頓河河畔崛起的。布卡捷夫當十八歲的時候,還只是充一個小兵,參加『七年戰爭』(俄土戰爭)。可是當時已經是英氣勃勃,頗為人所注目;他因傑驕不馴,屢受鞭撻;後又因病由前線被遣回家。其時他幫助了一個舊教越獄逃走,自己便也只好逃到烏克蘭去。他在一個親眷的寺院裏寄居,是人資助他,要他起來領導一種暴動。於是,他旅行到烏拉爾河去,但在那兒被捕了,遞

解到卡站。他又越獄走伊爾格地方，冒稱自己是彼得三世，則從波蘭，埃及，耶露撒冷等處旅行回來的。他娶了一個『戈薩克』女子，稱爲皇后，並用了許多女侍，稱爲宮女；他自己的周圍也招納了許多人充近侍大臣，並冒用彼得三世侍臣的名字，如阿爾羅夫，瓦隆柴等。他又招納了一個破落戶的聰明地主名謝萬維奇作爲樞密大臣。他佔據了兩個炮台，便以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名之；他在閱兵的時候竟儼然以皇帝自居。布卡捷夫後來兩年事業確是值得稱許的，不過他自己頗有點做皇帝的野心，如上面所述的，這便是後來被人非議的原因。

一七七三年秋，布卡捷夫率隊攻陷西伯利亞的亞克要塞，佔領阿倫堡。所有頓河流域及德尼帕河流域的『戈薩克』，所有非俄羅斯的民族，如韃靼人，Kirghiz，Bashkirs，Mordvins，Chuvashes 和 Votyaks，所有留居在歐俄東部的韃靼人和芬蘭人，都一齊歸順在布卡捷夫的旗幟之下。還有被充軍到西伯利亞而中途脫逃了的也都加入了布卡捷夫的隊伍，這一種脫逃者，在

卡站一處便有四千人。布卡捷夫宣言：他必將加特林拘禁到尼菴裏去。凡是他所率領的革命軍足跡所到之處，便盡情殺戮貴族地主，農奴都給予自由，土地都分給農民，這自然是布卡捷夫得人心的地方，於是農奴來投者無數，革命軍驟增到三十萬人了。政府懸賞購買布卡捷夫的首級，由五百盧布增加到二萬八千。布卡捷夫的名字成了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街談巷議的唯一資料：在這兩首都中，貴族地主都驚惶萬狀，一般民衆，尤其是一班貴族家庭的侍僕，都只是準備着暴動起來。政府派出了許多鎮壓革命的軍隊，因為被至誠的勸告感動了，多有不戰自退，且有加入爲革命軍作戰的。加特林派遣他的寵臣比比可夫率隊抵禦革命軍，可是他的部隊歸順布卡捷夫了，他不得已便企圖從貴族地主中招募一隊義勇兵，但因為貴族地主的畏蕙，許久方勉強在卡站成立一隊。他自己也知道難以抵禦革命軍，因為他看出『所怕的並不是布卡捷夫而是民衆普遍的激憤。』

布卡捷夫率隊在瓦爾加河及烏拉爾一帶迭克名城，至十一月，便已佔有了沙麻拉，卡站，烏哈，幾乎席

捲了歐俄東半部。可是一七七四年，政府增加了大批的生力軍，三月，戈里真擊敗了革命軍，奪回了阿倫堡。此時，布卡捷夫便將暴動的中心移到瓦爾加河流域中部，甚至更西向莫斯科去。此次的暴動，開始只是一種『戈薩克』與各種遊民的騷動，現在已經轉變而為一種極激烈的農民的階級戰爭了。布卡捷夫此時更高喊出『土地與自由』，『撲滅地主』，『解放農奴』的口號；在三個月中，革命軍殺死了五百牧師和官員；軍隊所到之處即將全部農民都號召起來；布卡捷夫預計在極短的時間中即可到達莫斯科。可是政府的鎮壓政策轉變得更嚴厲了：八月，米切耳孫擊敗了一隊革命軍，殺死了二千人；在察里城附近，一次激戰，革命軍又有八千人被俘虜了。巴林在彭查方面也用着同樣的猛烈攻擊，得了相等的勝利。同時，不幸瓦爾加河流域發生大饑荒，革命軍便難於支持了。布卡捷夫此時又為米切耳孫所敗，只得率領殘部退走烏拉爾。恰在此時，蘇烏羅夫從土耳其的前線上百勝歸來，受加特林之命，率騎兵三百人，日行幾二百里，兼程追擊布卡捷夫；終於，布卡捷夫被

擊潰被拘捕了。布卡捷夫被拘在一只鐵籠中遞解到莫斯科，於一七七五年正月，在『紅場』受了拉貞所受的同樣的酷刑。他在就刑之前，曾痛快淋漓地說：『我是烏雅的儿子。不要以為俄國的革命到了我死就完了。今後當還不有大烏雅出現的哩，拯救俄羅斯呀！』『烏鴉的儿子』是『平民』的意思，果然後來有列甯這樣的『大烏鴉』出現了。

貴族地主於極端絕望與恐怖之中，竟得到了這樣意外的勝利，痛定思痛，一切改良的思想更是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農民的命運隨着布卡捷夫的血，更向深一層的海底流去。加特林二世比彼得大帝更乖覺，她曾經說了許多改良的話，她自己亦曾預言：照現狀維持下去必會直接引起一種社會的大騷亂的。可是，農奴制度在她的時代却比前此任何時代更發展，更鞏固，真正如『夏日中天』一般！靠了她的力量，烏克蘭，頓河流域與南部諸省稱為新俄羅斯的諸都市，都已盛行奴隸制度。她常以廣大的皇室所有地賜與她的愛人和寵臣，因而那比較尚有少許自由的皇室所有地上的農民都靠了

她的恩惠，轉變成爲農奴了。在她統治的三十四年中，農奴增加了八十萬。保羅（一七九六到一八〇〇年）繼位，於一七九七年正月，敕令耶加特里羅斯拉夫，克里米亞與高加索都施行農奴制度；在他統治的四年中又增加了農奴六十萬。人頭稅加重，處置農奴的刑罰加嚴，更不必細說了。

此页无页码

第四章

農奴解放之經過

農奴解放成爲問題之原因

亞力山大一世之口頭改良——軍役之苛重——軍隊中的不安——亞力山大之反動——『十二月黨』革命

尼可拉一世之紙上空談——法律與官僚主義——尼可拉之反動——五百五十六次的暴動

克里米戰爭之教訓——亞力山大二世對於農奴解放之籌備——三種意見——地主的反對與亞力山大之妥協——解放令之頒佈——解放令之內容

俄皇政府之努力於『農奴制度』之形成，表面上看來彷彿只是爲了充裕並鞏固國家的財政地位，而在底裏裡，我們應該看清，完全是貴族地主與商業資本勾結的結果（有許多貴族地主本身就是商業資本家），俄皇政府不過是代表執行他們的意志吧了。貴族地主與商業資本家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獲得量多而價賤的穀物，到國際市場上去競爭，藉以獲得厚利。可是兩百年來，農奴制度發達的結果，完全違反了他們的希望：因爲地主強迫農奴爲自己服役，有的一星期中農奴須爲地主耕作至六七天之多，於是多數農奴自己所佃的土地完全拋荒了；而農奴在地主自己經營的土地上服役，因爲非自願的，有意無意中都是怠工。這樣的結果是收穫日益減少，生產力日益低落，穀物的成本便自然加高了一一這完全是違反貴族地主與商業資本的利益的。

而另一方面，工業資本也開始抬頭了。自然，在十九世紀初年，俄國的工業還是很落後，然而已經是開始向發展的大路上跑，而且工業資本家出台姿勢和商業資本家完全兩樣，他的魄力極大，他開始便要求佔領

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優勢以保證工業資本的繁榮。工業資本所需要的，第一便是『自由的工人』，使勞動力商品化，這樣才可以取得賤價的勞動；第二是『國內市場的擴大』，因為這時俄國的工業品還沒有資格到國際市場和英國的去競爭，所以他只有要求國內市場的擴大，即是國內的一切人民，尤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有購買工業品的能力。然而，因為農奴制度的存在，工業資本家的這兩種需要都無法滿足：勞動力為農奴制度所束縛，無法自由移轉，更說不上競爭；一般農奴穀米都沒有足夠吃的，更談不到購買工業品了！

所以，這時候，貴族地主和商業資本家不再堅持農奴制度的存在，他們且希望廢止農奴制度，把土地以重價賣與農民；這樣他們一方面可以取得更多的金錢作商業資本，另一方面，農奴解放，農民為自己而生產，生產力必可提高，收穫量加大，他們的商業前途也極可樂觀了。工業資本家爲了要取得自由的勞動並提高農民的購買力，自然更不用說，是無條件贊成農奴解放的。這時只有比較小的地主貴族是堅決地反對農奴解放的，

因為他們在商業資本中並沒有地位，他們也沒有作富商鉅賈的幻想，他們只是靠壓榨剝削農奴而生活，雖然他們也知道這並不是自己繁榮的道路，然而他們實在沒有別的生路——一旦農奴解放，他們的土地既賣不到很多錢，而要繼續經營農業，便得僱傭農人，他們得出很高的工價去和大地主和工廠競爭勞動力，簡單說一句，他們將不免漸漸地却是生生地餓死！

至若俄皇政府本身，在財政軍事各方面，都逐漸感到了農奴制度的缺憾，便也需要新的剝削的方法。是在上述的各種情況之下，農奴解放才成爲問題。

亞力山大一世（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年）繼保羅而起，已經看出舊的剝削方法不很適用了，便命令他屬下的一班懷抱自由思想的人組織一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改良俄羅斯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找出新的剝削方法來。一八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亞力山大第一次頒布新令：前此爲貴族地主所獨佔有的土地，今後其他自由階級的任何人，如商人，甚至皇室所有地上面的農民，均可依正當購買抵押等手續取得之。一八〇三年三月

又頒佈一法令：如地主願意，可以出賣自由與土地給其所屬的農奴。依此法令而獲得土地與自由的農民，須向政府繳納地租並擔負兵役，如貴族地主一樣；其他對於國家的義務則如皇室所有地上面的農民一樣；他們的土地可以出賣，典押或遺傳給子孫，但至少須有二十畝以上的面積方得如此；他們可以取得更多的土地，可以自由移居他省……可是，實際在二千二百餘萬的農奴中，直到一八五八年為止，依此法令而獲得土地與自由的不過二十六萬九千而已。亞力山大作了唯一的一件爲人所稱許的事是沒有再把『農奴制度』這一座寶塔加高，即是，沒有再使皇室所有地的農民變成農奴——然而，這豈是值得『稱許』的事？

一八〇五年以後的七年中，俄國軍隊屢被拿破崙及瑞典軍擊敗，處境至爲困難，因而更思整理內政，發憤圖強：代議的國會及地方議會的制度，亦爲亞力山大所採納；尤其是關於農奴制度的問題，建議更多。自由派的甘克林提出一種意見書，謂可於六十年內造成一自由耕耘者的階級；自由派的尼可拉·屠格涅夫（N.J.

urgenev)也提議農奴必須完全解放，社會的進步方能有穩固的基礎。亞力山大對於這些意見都非常嘉許，他又指令保守派的亞拉克捷夫，在不妨害地主的利益且不帶強迫性質的原則之下，草具一解放農奴的計劃。亞拉克捷夫便建議：由國家每年支出五百萬盧布向地主購買農奴的自由及其所耕種的土地。亞力山大也批准了，可是藉口於西歐的政治不靖，只是由政府成立了一個試辦委員會(一八一九年)，按照波羅的海各省已施行的解放農奴方法，在某數處試辦一下再說；可是因為當地地主的反對，委員會也無形消滅了。當時出賣農奴個人的問題又發生了，亞力山大口頭極端斥責這種辦法為不道德，然而終是允許繼續實行，並未加以禁止。地主懲罰農奴的權力，一八一一年曾經明令限制過的，一八二二年又完全恢復到無限制的程度了。脫逃與追捕的騷亂情形仍如以前一樣。

農民在戰爭中受了不堪的犧牲，結果得了什麼呢？請看！因為要防阻第二次的拿破崙之進攻並且爲了行軍迅速起見，亞力山大便於一八一六年頒布了『寓兵

於農，邊防皆兵』的計劃。依據此種計劃：在被指爲邊防軍區的地方，所有農村中的農民，包括小孩在內，均應受極嚴格的操練和嚴密的監督管理；所有男子甚至小孩，日常都要穿軍服；婦女亦都要註冊；結婚須得軍事當局許可。這種邊防軍區發展極快極廣，一八二五年，在魯弗戈洛特附近即有九十營，一八三六年，在南俄已有騎兵四十九大隊。農民極端反對這種苛重的兵役，特別是不願穿那如鐵鎖一般的軍服。他們說，他們願意每家交出兩個兒子充兵役，却不願全體都去；並且，只要不要他們去幹打仗的事，便是把他們充軍到西伯利亞都好。因爲，像前述的那樣，全村都動員去操練步伐陣式，實在再沒有時間顧到田地的耕作了。一八一七年，農民派代表向皇太后請願，被政府拘禁起來；還有些向親王康士坦丁和尼可拉長跪不起請求申訴的，都無結果。一八一九年，有九千農民在秋古野夫暴動起來反抗軍役，却都被殘酷的皮鞭鎮壓下去了。本來，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率大兵侵入莫斯科的時候，俄皇政府曾經宣言戰後即解放農奴的，可是結果適得其反，故農民間不安的狀

况較前更甚。

在軍隊中間亦遍處充滿了不平之氣，尤其是那些留守在德法境內的駐軍。(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第一次大敗後，俄國有許多軍隊留駐德法境內。)在戰幕中圍爐共話的時候，談到了法國革命後人民所得的自由生活等情形，便常時要聯想到俄國農民失掉了個人自由的苦痛與不平。一八一二年戰爭中的英雄不是俄國農民的兵士嗎？戰勝了拿破崙的大軍的不就是他們嗎？而法國的兵士還過着人的生活，俄國的却直是牛馬一樣！這是何等不平的事呀！便是軍隊中的下級軍官也多逐漸失去了對於俄皇的忠誠而傾心於革命，後來的『十二月黨』的革命(一八二五年)便是孕育於此時的。

這時，智識界反映着工業資產階級的心理，自由思想極為發達，而亞力山大則完全拋棄了以前口頭的改良主張，變成了一個極殘暴的專制皇帝，於一八一五年與奧普諸國組織最反動的『神聖同盟』，一八二〇年十月時特洛堡，更與奧普兩國簽定一『不得容許有非法之變革』在歐洲發生的協約，此後亞力山大便完全用武

力鎮壓一切革新運動了。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的革命是答復亞力山大的反動，也是威脅尼可拉一世的。不幸『十二月黨』的革命只是曇華一現，遭受了極殘酷的鎮壓而失敗了。（關於十二月黨革命的詳情將在本書第七章中詳細紀述。）

尼可拉一世（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繼位，也像以前的那些皇帝一樣，開始說了許多的漂亮話，並且也作了少許似乎是改良的事。在他繼位之初，他曾公開地宣言：他不願把自己應該解決的問題遺留給子孫。一八二六年，他也命令設立了一個改革問題研究委員會。他特別在國務院中設立了一個『皇室土地經管部』，皇室土地上面的農民都不再受地方警察的管轄了；並在皇室土地區域內設立學校及其他的機關，以改進農民的生活。他也不想把亞力山大一八〇三年頒布的法令切實施行，並且修正了許多關於農民的法律：如確定地主對於農民的責任，確定農奴對於地主的義務。甚至於後來亦竟允許了農奴有控告權，農奴有財產權（直到當時，地主還是可以任意處置農民的財產的），地主責罰農奴

須依政府之法令等等。

然而，這種種其實都只是紙上空談。第一，在俄國，紙上的法律與實際的法律是完全兩樣的；而且多數行使法律的人實際是絲毫不懂得法律的，因之兩者的差異更甚。他們只有一個原則：怎樣榨取更多，怎樣懲治最嚴，便是最公正的法律。其次是『官僚主義』的障礙。彼得大帝的所謂『維新』以來，官僚主義開始興起，尼可拉繼位以後，官僚主義的政治便完全代替了以前的貴族政治。所謂官僚主義乃是只重形式，我們俗話所謂『愛打官腔的』便是。例如：尼可拉在他的晚年說：『我沒有警察的，我不喜歡這東西；』而實際，警察的組織之精密與壓迫之嚴重實在沒有比尼可拉時代還更甚的。這是何等的『官腔』！又，政府爲了要切实施行一八〇三年農民可以從地主手中買得土地與自由的法令，便建立一種審查『購買合同』的辦法，依照此種辦法，每一合同必須展轉上遞到內務總長親自審閱，因爲恐防此種買賣是出於地主的強迫而非農民自願的。有一次，有十部馬車都是裝滿了的文件，由莫斯科送到聖彼得堡去，這

十車的文件完全是屬於一件案子的；一件什麼了不得的案子呢？是某處的一張合同中有欺騙行為的案子！這樣的官僚主義能夠為農民辦幾件事呀！第三則是地主的反對改革。

尼可拉改革的結果當然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怒潮席捲了歐洲，只有英國和俄國還是屹立未動。尼可拉便大大地戒嚴起來，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一篇極動人的上諭裏宣言俄羅斯正在被威嚇之中，結語說：『大大當心呀，一切民衆們，你們忍耐一些吧，上帝是庇佑我們的。』這時他又宣言：『一切土地都屬於貴族地主，毫無例外。』當時農民間盛傳解放令將要頒布；於是東南部有大批的農民到省城向政府請願，申言願意去參加克里米戰爭（當時正在進行），只要政府允許將來解甲歸田時給予自由。這一運動被政府用武力鎮壓下去了。

十九世紀的上半期，農民革命雖然沒有普遍全國的大規模的運動，但各地小的暴動與騷亂仍是不斷地繼續着。據俄國內務部的統計，一八三五至五四年間，

共有一四四名大地主在暴動中被殺，一八三五至四四年間，共有二九八名農人與一一八名農婦因暗殺地主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又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五年三十年中，農民暴動的總數竟達五百五十六次。這種種社會的不安隨着政府的暴虐與壓迫而增漲，不斷地向政府威脅着；同時反映着各方面的心理的輿論，要求解放農奴的呼聲也如羣鴉噪碗似的達到俄皇的耳邊，使得繼尼可拉而起的亞力山大二世不能不認真注意到農奴解放的問題。

而最是成爲農奴解放的直接動力的却是克里米戰爭。我們知道，俄皇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標，當時只在於財政充裕與軍備的擴大而充實，而尤以軍備爲首要問題，因爲對內對外都實惟軍隊是賴。克里米一戰（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把俄皇政府的大夢驚醒了！俄羅斯的兵力最初是震撼全歐的。而一戰的結果却是蒙了意外的恥辱：割地而外，更恥遭城下之盟！在數量上，俄羅斯的軍隊實在超過了她的敵人，雖然敵人是聯軍；而她的挫敗反與她的軍隊數量成正比例。軍事運輸使人民

身上加重了不堪的担負而效果却極小；醫藥救護的設備不周，致傳染病盛行；在後方，剋扣軍餉的事比那一時代都更厲害，以致前綫軍需不足，糧草難繼。步兵的作戰極其勇敢，他們的指揮官却多半是無多才能的。而最着得明顯的是，落後的俄國農奴與自由的西歐士卒兩者間的智力相差得太遠了，愚昧實在減小了不少俄軍的戰鬥力！他如運輸制度與軍隊組織等等都可以說英法土聯軍戰勝的原因。若是根本地說起來，克里米一戰却完全證明了西歐各國工業資本主義有了極高度的發展，因而軍事政治乃至一般社會組織都有高一級的進步，俄國這時已不能再以土地的資本主義為滿足了；而俄國要謀經濟上的發達，首先便不可不斬斷農奴制度這一羈絆，使資本與勞動力均得依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原則而自由流動，集中與擴大。實在，只有這一覺悟纔是農奴解放的最大原動力。

亞力山大二世很乖巧地迎合着當時的輿論，令一自由派的雷甫斯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作為起草一農奴解放令的參攷；同時又慰藉一班反對派的地主，在某次

地主集會上，亞力山大二世說：『解放農奴的事，與其等到民衆從下面自動地幹起來，反不如由在上者毅然行之爲較好。』他又叫地主們『想想怎樣才是最適當的方法來幹這件事。』

雷甫斯歸納出了當時的三種意見。依據政府的解放令，農奴即成爲完全的自由人，但所有前此耕種的土地都得歸還地主——這是第一種意見；在亞力山大一世時代沿波羅的海各省，這種辦法是已經施行了的，結果是形成了一批無產階級。第二種意見是：農民於得到個人的自由之外，同時仍舊佔有原耕的土地，土地的代價由國家先行墊款付給地主，農民則陸續還給國家——這一種辦法也是很困難的，因爲在克里米戰爭中國家已經發行了許多債券，而當時從國外借債也不可能，所以要國家墊款也是空話。第三意見是：建立一種所謂『農民的義務制度』，即是，解放後農民仍佔有原耕的土地，却按某種規定對地主盡有限的義務作爲土地的代價，直到繳清地價時爲止——這也是在俄國西南部等處施行過的。

一八五七年八月，亞力山大設的御前參議委員會根據雷甫斯的意見書，又提出一種意見：地主將房屋，花園及一片土地給予農民，農民則盡某種義務作為代價償還地主：這樣國家可以不必破費分文。可是這時各地地主反對的聲浪已經噙然四起，紛紛派代表到聖彼得堡請願，並集議反對的方法，各省地主亦均在各地集會反對。地主的意思是，無論如何不能失去自己的土地，也不願失去那些地面上的勞動力，換句話說，就是不願解放農奴；即令萬不得已，決不能使解放後的農奴有安適的生活，因為果真如此，地主的土地上面將得不到賤價的勞動力了。政府一方面，為了自身和大地主以及工業資本家的利益，且表面上似乎是擁護農民的利益，極力主張農奴必須解放，同時土地與自由均須給與解放後的農民。因是一般輿論，尤其是比較進步的智識份子，均十分贊助政府的意見，他們甚至說亞力山大二世聖明實超過彼得大帝。政府方面自然更起勁，於一八五八年一月將御前參議委員會改為正式委員會，四月又在政府中特設一辦理農奴解放事的機關。可是，

地主的反對運動幾乎鬧到天翻地覆，正式委員會的主席又爲反對派的阿爾羅夫攫得；同時亞力山大親自出巡，爲地主所包圍，乃不得不讓步，八月遂下令正式召集地主會議在聖彼得堡集議，並申明解放令必在地主會議以後方行頒布。以後又經了若干紛擾，爭辯與修正，一八五九年二月，成立一解放令起草委員會，根據下述的原則，起草命令，即：『農民不僅要有自由，亦要有土地；地主不僅應得土地的代價，亦應得勞動力的補償；而因此兩點所引起的財政的負擔必須由國家負起。』地主會議自然保守派多數，有的甚至主張全部土地都應歸還地主。農民方面，在這紛紛搔攘的時期中反爾爲極端的沉默所籠罩，可是，一班人都認爲這是大風暴前的沉默，便盼望解放問題得迅速解決。

經過了各種官樣文章的手續，爲千萬人所切盼的『農奴解放令』終於在一八六一年三月三號由亞力山大二世簽名，三月十七日頒布了。在國務會議通過的時候，亞力山大很嚴重地致訓詞，說：『這是我願望的，我要求的，我命令的。』這是很的確的，一班農民所願望

的，所要求的並不是『這』一解放令，當然也無權力命令『這』。我們且看『解放令』的內容究竟是些什麼呢？

『解放令』共有十六條，關於各方面的都有說到。農民完全從地主的隸屬之下解放出來，但他們仍舊各屬於共產村落制度遺跡的『米爾』之中，共同擔負繳納租稅的責任，沒有『米爾』同意的護照，他們仍舊不能隨意到他處旅行。『米爾』被採用作一種新的並且有幾分自治意味的社會單位，牠完全代替了前此地主對於農奴的統治地位；依據舊制，『米爾』可以分配其所有的土地給其所屬的份子，並分派各人應擔負的租額；『米爾』也可以徵收某數目的捐稅為本地的宗教教育或其他社會需要之用。他一方面，『米爾』也是本地警察組織中的一單位，對於國家也擔負了某種責務的。至若經濟方面，大概說來，依據解放令，農民可以取得全部已開墾的土地之一半，即是將原耕的土地交還一半給地主；這許多土地的代價由國家先行墊款償還地主，再由農民於四十九年中分期歸還給國家。今後農民可以租地耕種，也可以出賣勞動力。至若僅在地主家中役服並未耕田的

農奴，則尚須繼續服務兩年，方得自由。所謂『解放令』，概言之，如斯而已！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研究一下，『解放令』究竟給了農民一些什麼？

此页无页码

第 五 章

解放後之農民生活

解放後的土地分配情形——土地仍舊不爲農民所有——個
人的自由問題

解放令的結果：土地愈加缺乏——農業生產力縮小——租
稅苛重——農民的社會地位之低下

農民的救窮法：從事家庭手工業——到地主田莊上傭工——
一到工廠中去——到西伯利亞去

要研究『解放令』對於農民的影響，第一個應該注

意的問題當然是土地分配問題。我們曾經說過，地主是不願意把土地分配給農民的，至多也只能給予少許的土地，使他們不能藉此贏得足食豐衣的生活。地主知道解放後便再沒有農奴的勞動力可役使了，他們將只有僱傭勞動力來經營他們的產業，而最合用的當然是解放了的農奴。若解放了的農奴有了足以維持生活的土地，他便不會再到外面傭工，便是傭工，他的勞動力也決不會肯賤賣；若是他多少要依賴傭工來補足生活的用項；則他必願受僱，工價也必定低廉的。

地主的目的是達到了。農奴解放後，土地的分配幾乎完全是依據他們的利益而行的。當時俄國農民的總數為四千七百二十餘萬，其中二千四百七十餘萬是皇室所有地上面的農民，餘為地主所屬的農奴。解放令頒布後，有四十八萬一千農民沒有分得一點土地，他們多半是在地主家中服役的；有五十五萬農民每人所得不及一俄畝(Dessyatine，合中國一七·七八二二畝)——這些貧農不願為補償金的債務所累，所以甯願只接受這些小的土地，(依據解放令，若所得土地超過了這最小

限度的數量，便要納補償金)；有一百五十五萬三千人每人所得的在二俄畝以下。合計起來，約二百五十萬農民並沒有分得多的土地，有些竟一無所得，這些農民解放之初便已成為無產階級了。至於分受土地較多的農民中，其實也可憐得很，平均算起來，每人所得的不過三·二俄畝。而且最為可恨的是，土地的最好部份，特別是牧場和森林，在農奴制度盛行時代都是給予農奴使用的，解放後便都被地主自己截留了。這種情形以南方及西南方為最甚，因為俄國最適宜於耕作的土地都在這兩部份地方。據調查，俄羅斯中部三十六省中，有二十一省的土地，在解放時被地主截留去了百分之二六·二，在最肥沃的地方，且有到百分之四十乃至四十四的：被地主截留去的便等於從農民手中奪去的（因為地主所有的土地當初是全部給農民耕種的），所以解放後農民所有的耕地比解放前要大大的減少了。就全體的平均計算，（包括皇室所有地上面的農民在內）解放令頒布以後，農民每人約得土地四·八俄畝。實在，農奴解放的結果，就是分受土地最多的農民也比先前作農奴

時租種的土地還要少；而且那些土地中最好的部份又被地主截留，因之農民所分受的量既少，質亦大壞。

我們還要記得，便是這少而且壞的土地，其所有權也並不是屬於農民個人，而屬於地主的代替者——『米爾』；農民所有的不過耕種權而已。土地為『米爾』的共有物，按時重行分配，農民離開『米爾』，土地仍交還『米爾』。農民不能將所耕的土地出賣，後來有一時期甚至規定個人也不能購買土地——只有『米爾』有購買土地權。所以，實際農民還是沒有得到土地——少的也沒有，壞的也沒有。

可是，這為『米爾』所共有的土地，其代價還是要農民出的。依據解放令，除了某一最小限度的土地（此名為『恤貧的份兒』）外，凡是農民從地主所得的土地，都須繳納補償金。可是這種補償金的數目却是大到令人有點難於相信！一千八百六十年代的土地平均價格，每俄畝為十七盧布。而政府規定的補償金却是每俄畝二十七盧布。若照總數來說，依解放令給與農民的土地，按當時市價為六八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政府却

定爲九二三·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又，付款過遲都須付利錢或處罰金，政府徵集補償金的用費等也須農民担負，結果農民竟須付出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已達實價一倍以上了。這種負擔，事實上超過了農民自己全部收入以上，這是彼得格勒大學教授鏗葆報告的。

『解放令』是這樣回答農民所渴望解決的土地問題。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個人自由問題。解放令頒布以後，農民果真都獲得自由了嗎？否，所謂『自由』，不過是『餓死的自由』罷了；實際，農民照舊被束縛於古代村落共產制度的遺物『米爾』之中。政府是萬分不願農民有個人自由的，政府之毅然解放農奴，只是因爲農奴制度不便於對農民進行有效的剝削；設使農民真正有了個人的自由，政府將無法徵取多量租稅和兵丁，這便完全失去了政府解放農奴的『私意』了！所以政府便很狡猾地利用着這個社會進化中已死的形骸——『米爾』，來代替舊日地主的地位，他們給予『米爾』以支配

農民的權力，務使農民不能脫離『米爾』的羈絆。已如前章所述，『米爾』被採用作一種新式的並且有幾分自治意味的社會單位，牠完全代替了從前地主對於農奴的統治地位；他一方面，『米爾』也是本地警察組織中的最下一級的防區，對於國家也擔負了某種責務的。農民非得『米爾』的同意，絕對不能離開所在的農村。又，農民若沒有旅行護照，便不能離開自己現住地三十俄里以外的地去旅行，而要得旅行護照，不僅委得『米爾』的許可，且還有許多繁雜的手續——請求旅行的人先要取得『米爾』首長准許離開的憑證（凡是有欠租未納或補償金未繳清的人都不能得到離開的允許），呈交縣長，縣長交書記，書記製就旅行護照，再由縣長審閱後方發給請求人——這樣，每次總需月餘或數月的時日方能取得一旅行護照。

所謂『幾分的自治意味』是什麼呢？仍照舊制，『米爾』可以分配其所有的土地給其所屬的份子耕種，可以分派各人應擔負的租額。又如，選派本村夏季的牧羊人，決定在何處牧羊，在何處牧馬和牛等，以及決定所

屬農民應繳納於本村的常平倉的穀物的多寡，都可以在『米爾』的村會中辦理。『米爾』也可以自己設立鑄鐵店和風磨房，也可以自己僱用鐵匠和磨夫；倘使證明鵝與小雞有害禾稼，牠也可以自己製定禁止飼養鵝與小雞的命令。可是，比較關係重大一點的事，『米爾』便完全失掉了牠的自治權，便要受政府的指揮了。政府之所以使農民隸屬於『米爾』，顯然只是因為把數十隻小綿羊納在三數個籠中，便於提挈而已。即如農民納稅一事，『米爾』對政府負有繳納所屬全體農民的稅款的責任；姑無論『米爾』何所屬農民如何收集，政府只須向『米爾』負責人整數提取便可。政府為避免麻煩起見，甚至如放逐農民於西伯利亞，干涉農民分配遺產等事，都准『米爾』自行辦理。簡言之，政府只是把『米爾』當作了箝制束縛農民的武器，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為地主的所有物，此時便為『米爾』的所有物了。

然而，政府也很知道『米爾』並不是一個十分可靠的武器。『米爾』究竟是由農民組合而成的，我們都能夠互相了解，互為幫助，互有同情的。他們對於不滿意的

命令是可以不遵行的，對於難堪的待遇是可以起而抗爭的。而且，充其極，『米爾』也可以變成爲一個叛亂的策源地，革命黨人也可以激動他們，領導他們起而發難的。在這種恐懼之下，政府便派遣了許多軍隊駐在各農村間，並領率以各種各色的官吏（如直轄於內務部的 Land Gaptain 之類），以監督『米爾』的行動。這些官吏可以自由逮捕農民，或予以笞刑或課以罰金；有些官吏且任意以沒收名義劫奪農民的耕地。在這種情形之下，『米爾』不特無力保護農民，便是『米爾』自己所選舉出的村長也都甘受這般官吏的指使，虐待他的村人。

土地與自由這兩個根本問題，『解放令』是如上答復的，我們且進一步攷察一下情形是怎樣發展的，即是，解放令後農民的生活情形如何？

第一，我們看出的是土地愈加缺乏。俄國農村的人口增加極快，在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間，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九，家族增加了百分之五七·八，而農民的所有地（包抱『米爾』的共有地和後來農民自己購

買的私有地)在這期間不過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農民現在所耕作的土地(除所有地之外,向大地主租來的土地也算在內,)不過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因之,每逢『米爾』將土地重行分配的時候,每一人所分受的土地便逐漸削減了。在這期間,農民每人握有的土地由四·九俄畝(一八六一年)減為三·三(一八八〇年),後來每人只有二·六俄畝了(一九〇〇年)。有許多農民且完全失掉了他們的土地。他們之所致此,是因為土地過少,不能維持生活;他們有兩種救濟方法,一是再從地主或其他的人多租一些或買進一些土地來種,一是將自己原耕的土地租出去,或甚至自己完全退出『米爾』(補償金沒有繳清,退出『米爾』也不可能,)而去專賣勞力以為生。前一補救的方法自然比較的好,因為多租或多買一些土地來種,便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力增加,這樣便可以稍救餓與窮了。然而事實上又不能盡如此。一八八三年,政府以援助農民購買土地為目的,設立了一個農民土地銀行;但這銀行實際不能予貧農以絲毫援助,因為銀行代墊地價,必須購買土地的人有地價百分之二

十乃至二十五的資產作擔保。這樣，能夠享受購買土地的利益的實際還是比較富裕的農民，並不是急需土地的貧農：結果只是助長較富裕的農民剝削貧農，兼併土地罷了。至若租地，對於貧農更是無益而有害了。因為租地的人極多，所以租價特別昂貴（一九〇〇年，歐俄某二十七省的地租，竟佔全收穫的百分之八八·一）；貧農急不暇擇，結果便只有負債纍纍，迫緊的時候，便只好出賣農具，家畜或替地主服役來償還欠項。而他們的服役，估價又極低廉，每年內勢不得不耗費許多日子為大地主耕種土地，結果反多把自己的土地拋荒了。所以，最多的還是取最後的一方法，租出自己的耕地或完全退出『米爾』。據俄國內務部附設的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司事卓洛特里夫報告，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俄國有二百二十萬家族是農業勞動者，他們自己是手無寸土的。這個數目佔全體農民百分之十五。據同年的報告，歐俄某四十七省的一一·九五六·八七六農民家族中，每家所有的土地，有百分之二十三僅在五俄畝以下，百分之七十在十俄畝以下。但據政府專門家當時的計算，

平均每一家族必須有十二又半俄畝的土地纔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農民是如何缺乏土地了。

第二，我們看出的是農業生產力的縮小。中世紀的耕種方法，此時還在俄國農民中盛行着。據一九一〇年的調查，他們的農具足有一半還是古代使用的。他們用的犁頭都是本鄉中自造的。他們打穀並沒有機器的，只是把稻莖堆在場上用一種竹節器去打，時常因為太多，一天兩天打不完，便叫一個小孩夜間睡在稻堆上，防人來偷盜。田中的野草多半任其滋生，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芟除，由此便可見一端。田中所施的肥料極其不足，每不及所需的千分之一。他們用的舊式農具常是需要極大的馬力方能使用的，可是他們的牲口之缺乏更是驚人，據一九一二年的統計，全體農民家族中約百分之三十一是並沒有牲口的，有馬一匹的約百分之三十二，有馬二匹的約百分之二十二，有三匹以上的不過百分之十四而已。他們的耕種方法都是由祖先遺傳下來的，如承襲破舊的皮靴或皮袍一樣。政府既沒有設立學校

教導他們，便是所謂『地方議會』也只能給予少許極細微的知識。

而且，『米爾』的土地分配制度，更叫他們不願意改進自己一時所佔有的土地。『米爾』的規定，土地不是農民個人的財產而是『米爾』的公有物，已如前所述。因為人口的增加以及各人家族情形的改變，『米爾』每一年或三年須把土地重行分配一次：這樣，今年屬於甲的，明年或即屬於乙或丙了。這種不斷的變換，誰願意冒險投入自己的寶貴資本去改進土地而讓他人明年收獲較好的結果呢？他們不僅不肯圖改進，且更從現時自己所分受的這一片土地上面儘量榨取較多的利益，就是使得土地的生產力枯竭了亦在所不惜的；他們都想着：『橫豎將來多半不會屬於我的。』

而且，便是有人有意改進土地，改良耕作法，然在實事上也絕對難能。因為，第一，『米爾』分配土地的時候，爲了保持分配的公平起見，常把土地按照土質之殊異和位置之優劣，區別作好幾種，再把每一種分作三部份，其中三份之一，更迭作爲空地，不加耕耘，其餘的三

份之二，作為耕作之用。各家族對於各種的土地都有一份；假設本村的土地分作三種，各家族便都有九處的耕地。例如，在最北部，全村的農戶約有五分之一都各有六十處的耕地，而各人所有的耕地的總數不過七俄畝左右而已；而且這些碎片的土地都是東零西散的，有的甚至於在五英里或十英里以外，那些地方收穫所得實不抵所費的勞力的價值。而且這樣分配的結果，耕地大概都成為長而狹的一條，至多寬六尺長三丈，四周田界橫亘隔斷，決不能用機器來行大規模的耕耘。其次，『米爾』又有『同作同息』的規定，一『米爾』的人同時都要作同樣的事，不許任意更變的，彷彿像各種科學的定律一樣，在農民腦中，幾乎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

因為上述的種種情形，俄國農民每年的收穫便完全受氣候的支配。遇着天旱，洪水或大風暴，便是他們的『劫數』；若是風調雨順便是他們最幸運的豐年。歐西各國的農民多已一躍而為自然力的主人翁，俄國農民却仍然作着自然力的奴隸；忍飢受凍，由命聽天。美國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因為採用新式耕作法，他們的生產

力已經增高一倍了；俄國的農業生產力此時却反比以前更減小了。據米留可夫(Paul milyoukov)所得的統計，我們得一土地生產力的比較表如下：

(每一俄畝的生產量，以『蒲特』爲單位，每『蒲特』合中國三十斤。)

國名	小麥	黑麥	燕麥
瑞典	一〇〇・二	七五・九	八三・二
德意志	七七・〇	五六・四	七三・九
加拿大	六二・三	六二・〇	九七・七
美國	六〇・三	四二・〇	六三・一
俄羅斯	二八・二	三二・八	三九・〇

又據星德司(M. Hiudus)所得的統計，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一個土地生產力比較表，表中的數目是各國每一海克特(一萬方米突)的土地所產出的各種穀物的分量。

國名	一海克特之產量	國名	一海克特之產量
比利時	二一・一昆特(註)	希臘	一二・八昆特
英吉利	二〇・二昆特	烏拉圭	一二・四昆特

挪 威	一九·七昆特	英屬印度	一二·一昆特
日 本	一九·〇昆特	西 班 牙	一一·八昆特
荷 蘭	一八·七昆特	奧 地 利	一一·四昆特
丹 麥	一八·一昆特	羅馬尼亞	一〇·五昆特
德意志	一六·八昆特	保加利亞	九·五昆特
瑞 典	一五·六昆特	意 大 利	九·四昆特
阿根廷	一四·五昆特	奧大利亞	八·三昆特
加拿大	一四·三昆特	阿 爾 士	八·二昆特
美 國	一三·六昆特	塞爾維亞	八·二昆特
匈牙利	一三·六昆特	俄 羅 斯	六·四昆特
法蘭西	一三·二昆特		

(註)一昆特(guintal)合一百磅重。

在二十五個農業國的土地生產力的比較中，俄國的生產力最小，小到平均數一倍以下；而俄國還是全世界農業生產量最富的國家——無論大麥或小麥，亞麻或苧麻，乃至甜菜等，他的生產量都佔全世界的第一位。固然俄國的耕地面積是世界最廣的（二億四千萬英畝），然而他的生產技術却又是極落後的啦：所以，我

們不能想像俄國的農民是怎樣地在他們的田地中苦捱着，怎樣地奮力着的！

第三，我們看見的是租稅的苛重。補償金的苛重，前面已經說過，這壓在農民身上實在已經使他們無法支持了。可是其他的各種的捐稅更是加倍苛重。在農奴解放後的十餘年中，每年國家徵收的直接總額為二億零八百萬盧布，其中有一億九千五百萬（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農民擔負的；人頭稅總額為四千二百萬盧布，這幾乎全部都是農民擔負的。據調查，一八七二年，魯甫戈諾特省的前皇室所有地的農民，把他們收獲物的全部都作租稅繳納了；至若解放了的農奴所繳納的（包括補償金在內），最少的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六十一，最多的竟超過百分之四百五十六（即倍半以上）。又，在彼得格勒所屬地方，租稅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四，在莫斯科超過百分之零五，在土地肥沃的南方，舊農奴所繳納的超過百分之二十四乃至二百，舊皇室所有地的農民超過百分之三十乃至一百四十八。所以，農民就是儘量賣去所得的收獲物，儘量賣去所有的東西，儘量

去借能借到的錢，還是不夠納付租稅。在一八七一到七五年間，過期未納的租稅佔全額的百分之二十二；到一八九一至九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在一八七一至一八八〇年間，每俄畝土地平均欠租美金一角九分，一八八一到一八九〇年間增加到二角四分，到一九〇〇年則已增加到五角四分了。單說沙麻拉省的幾縣，在一八九〇年，收稅吏因為農民過期不納租稅，將農民財產沒收作抵，其總額竟達到了九百萬盧布。不但如此，在一八九二年，該幾縣的過期未納的租稅，竟達到原稅額的百分之七十一另九哩。本來，在彭基(Bunge)當國的時候(一八八一到一八八六年)，因為看見農民之日陷於絕途，曾下令把補償金減少，人頭稅完全豁免去。可是這樣一來，國家的收入便大大受了影響；於是，到了維希涅格拉茨基(Vyshnegradsky)任財政總長的時候(一八八七年到九二年)，便對於日用必需品增加了大宗的間接稅，計在一八八五到九五年這十年中，增加的間接稅的總額已達到當日豁免去的直接稅(補償金及人頭稅)的總額六倍以上。魏捷(Witte)繼起(一八九二

到一九〇二年)，把間接稅更加擴充了。一八八〇至一九〇二年這二十餘年間，茶稅加了三倍，煤油加了四倍，糖稅加了五倍，棉花稅加了六倍，鋼與鐵稅也都加到了六倍以上，最後麥酒也收歸政府專賣了。據米留可夫的統計：一八八三到一八九二年間，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稅額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在一八九三到一九〇二年間，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稅額却驟增到百分之四十九——這是何等驚人的數目！

第四，我們看見的是農民的社會地位之低下。農民雖然藉解放令而獲得了自由，可是他在社會上仍舊完全被排斥於一切其他階級之外，而獨成他自己的一窮苦階級；在法律上的地位，他與一般市民，商人以及貴族地主都不同。直到一九〇六年，農民還是不能放入高等學校肄業，還是不能充高等官吏。他階級的人在農民社會中決不會同化而為農民，同樣，農民在其他階級的社會中也決不會同化而被視為他階級的人。總之，農民在這時候，還只是一個俄國俗語所謂『乃權力的目的物而非權力之所有者』的人而已。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之

低下與孤獨，解放後與解放前沒有兩樣。

土地的缺乏，生產力的薄弱，租稅的苛重以及社會地位的低下等等——在這重重經濟的與社會的壓迫之下，農民之難以維持生活，我們可以想見。據調查，在十八世紀末期，俄國人口中每千人不過死亡二十人，到十九世紀末，每千人中死者達五十人。這比歐洲各國當日的死亡率大二倍之多。

然則他們竟都是束手待斃麼？自然不能呵！他們也有着他們的捱苦的方法。

第一是從事家庭手工業。在農業技術幼稚的俄國，許多家俱和農俱都是家庭手工製造的。他們製造的時間多半在冬季：在矮屋的一角，濃烟籠罩之中，微光之下，他們遲鈍地運用他們的粗笨的工具從事工作，每天工作的時間總在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有時且到十六小時。但這究竟不能增加很多的收入，因為他們的出品既不佳，而自已又不善於交易，每常被居間人愚弄，不能得到較好的賣價，只是比沒有要好一點罷了。

第二是到地主田莊上傭工。他們於自己耕作之暇，像手無寸土的貧農一樣，出外傭工。地主擁有廣大的土地，農奴既已四散，自然只有僱傭貧農從事耕作，日趨絕境的農民便從這裏得到另一生路了。然而還只是如亞列金斯基所說的，『這種生活並不是生，只是緩慢的死呵！』在解放令頒布的後二年，政府對於田主與傭工間的關係即制定法律，承認地主是需要保護與扶助的弱者。法律規定，設傭工怠忽其工作，地主有權科以罰金；罰金的數目每先在合同上規定了的——若未規定，則以兩天的工資為率。又，設傭工對於地主的家族或產業經理人稍有無理，地主有權將其斥退。一八八六年，因為地主的要求，法律更規定：雖傭工並無過失，地主仍有權將其辭退；而傭工被虐待或侮辱，却不能隨意毀約求退。又，地主因傭工怠忽工作而科取的罰金，並不須到法庭報案，地主有權私自處理的。又，傭工棄約逃走，作為刑事犯論罪。一九〇二年的法律更規定星期日及假期傭工均須照常工作。

說到這些傭工的工資，那便更可憐了。因為失業者

的多寡，土地的肥瘠，以及收穫的豐歉，他們的工資自然有高下不同；然就一般看來，總是最底的了。據調查，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這十年間，俄國波爾特瓦等二十八省的農作傭工的工資，平均每日為三十二戈比，每月為三盧布六戈比，每年為二十九盧布四十六戈比；而美國除南部以外，農作傭工在一九〇〇年每月可得十七元美金，計算起來，他一月所得比俄國農人一年所得的還多了。下面的這個各國農作傭工每年之資平均數比較表，是美國農業部一八九二年調查的。

英吉利	七七〇法郎
美 國	一•二五〇法郎
法蘭西	六二五法郎
荷 蘭	五〇〇法郎
德意志	四五〇法郎
意大利	二五〇法郎
印 度	一五〇法郎
俄羅斯	一五三法郎——

——（此數係根據地主之報告）

俄國農作傭工的工資只比印度的多三法郎，而印度却有極宜於農作的氣候，印度人的生活也比俄國農人的簡單而便宜，可知俄國農作傭工是世界上最苦的了。

第三是到工廠中去。十九世紀後半期，俄國的工業開始有相當的發達，尤以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為中心；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俄國棉花停止出口，因之莫斯科的紡織工業更是大大地發達起來。南俄頓河流域的煤礦和鐵礦的開採，北部各省的製蔗業也都相繼勃興。感到土地缺乏農村生活艱苦的貧農便開始走到工廠中去尋他們的新生活。農民之到工廠中去，並不會完全脫離農村，他仍負擔着自己對於『米爾』的義務；他只是把自己分受的田租給別人耕種，有時即由自己的妻和子女耕種，設使工廠臨近農村，他便仍舊住在家中，只是白日到工廠中去，有的且同時仍經管着耕作的事。這樣的辦法確還能相當幫助貧農增加一些收入，有許多農村且是靠了這些到工廠中去的貧農而繁榮起來的。

可是，俄國工業的發達不能像她的人口的增加與農民的破產那樣快。我們只須研究一下都市發達的情形便可了然。在西歐方面，十九世紀後半期工業極其發達，都市因隨之勃興。便是半封建的奧地利，在一八四三年的時候，都市的人口當全人口百分之十九，到一九〇〇年則已增為百分之三十八了。至若俄羅斯，一八六三年，都市的人口當全人口百分之十，到一九一二年還只是百分之十四。我們再一看下列的比較表，則俄羅斯都市之不發達可以概見了。這是一九一二年的統計

國名	都市人口百分數	鄉村人口百分數
英吉利	七八%	二二%
德意志	五六	四四
美國	四二	五八
意大利	二六	七四
俄羅斯	一四	八六

而另一方面，俄國農村中人口的增加與貧農的破產之速度則至可驚人。貧農之破產，只須看看前面所述

的欠租之增多，失地者之日衆，便可顯然看出。至若人口之增加，據烏根洛夫斯基——他是對於俄國農業問題最有研究的一位學者——的計算，俄國鄉村的人口每年要增加二百萬，這二百萬中只有三十五萬被都市吸收去了，剩餘的一百六十五萬都得留在鄉村中，與他們的先輩在逐漸減少的土地上面掙扎着。所以，第三條路只是一小部份貧農能夠幸而走到的路，雖則這條路其實也是苦的。

第四是到西伯利亞去。既然前面幾條路都不易走得通，他們便率性放胆追跡那些無產的貧農向國外逃去。歐洲各國本已患人滿，澳非等洲的情形俄國農人還不很知道。他們所常聽見的是物產豐饒的美洲與土地廣博的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美洲當時自然還可以容收若干俄國的貧農，只是赴美的費用既大，到美洲後語言習慣都不能讓他們如意地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移住美洲的並不見多。至若中亞細亞與西伯利亞都是大可移住的地方了。依據米戈林教授的調查，現在作一個中亞細亞，西伯利亞與歐俄的土地及人口比較表如

下!

地名	土地(俄畝計算)	人口	每人佔有的土地
西伯利亞	1,000,000,000	10,000,000	100.00俄畝
中亞細亞	314,000,000	8,000,000	29.25俄畝
歐俄	314,000,000	30,000,000	3.40俄畝

從這表看來，貧農向西伯利亞或中亞細亞逃去，當可以滿足他們對於生活舐望。可是，俄皇政府雖然看着農民在國內展轉就死於貧困之中，却始終妨阻他們向西伯利亞等處移住。一八八九年七月俄皇的上諭說：『凡未先得內務部及生產部之允許而擅行移住者，着當地官員仍將其拘回服役於原地。』一八九六年，有數省更明文規定：農民非有現金三百盧布者，不准變賣產業，希圖移住。政府之所以這樣妨阻農民的移住，唯一的原因是企圖維持國家與地主之經濟的繁榮與穩定。若大多數農民移住西伯利亞與中亞西亞，則地主將受兩重損失：第一，勞力的供給減少，工資必因之增高；第二，佃戶減少，租價必因之低落。至若國家方面，很顯然是為的收稅的關係。

雖然情形如此，農民之移往西伯利亞的仍然年有增加。解放農奴後的數年，每年不過二千人，一八八一年有七萬四千，一八九六年則達二十餘萬。可是去而復返的却也不少，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九年間，約百分之十都回轉歐俄來了，一九一二年回來的竟達百分之二十八另五。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移往的既多，不易尋得適當的土地耕作；便是稍次一點的土地，却又缺乏資本去開發。因此他們便不得不重返故鄉來。他們去的時候，一切都已典賣淨盡，現在回來便都是赤手空拳，其境遇更難堪了！

此页无页码

第 六 章

農 民 之 思 想

沒有政治觀念——法律是『狂風暴雨』——不輕信新皇帝
『革命』

社會觀念：土地應屬於耕作者——對於取得土地之熱望：
土地是『萬應膏』——農民之『土地國有』觀

關於俄國農民之經濟的與社會的生活，既已略如
前述，請進而研究其思想。

因為歷代愚民政策的結果，俄國農民的思想極其

狹隘落後，乃是當然的事。關於世界的事，甚至關於本國的事，他都一無所知。他所知道的，所敬服的，只是一個俄皇——『察爾』，因為他很聽見了一些讚美『察爾』的民歌；他並不知道什麼國家，因為在他的意識中，國家並不是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並不了解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他以為他不過是某地的一個『住客』罷了，像在外地旅行着的人一樣。

對於法律，他也有一種很奇特的觀念。他只知道法律是自己應該服從的一種東西，但並不了解這東西是怎樣來的，有何種意義。法律在他的生活中，猶如一陣可怕的狂風暴雨一般，是無法避免的，是有着不可抵禦的力量的。隆納茨利夫是研究農民對於法律的態度極有心得的學者，他說：『在農民的心目中，法律只是一種恐怖的，神祕的，且不可解的東西；因為政府一切暴虐，殘酷又不自然的行爲，如比追欠租，充軍西伯利亞，剖死屍，燬民屋，殺牲口，強迫從軍，強迫種痘乃至實行強迫教育等等『都是藉着法律的名義來施行的，永遠如此，至於無極。』

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後，農民的態度還是沒有改變。『察爾』被推倒以後，在有一時間中，農民竟不肯繳納租稅，因為他們平時唯一敬服的『察爾』倒了，新皇帝——『革命』（彼得格勒附近某村於三月革命後確派人到城內購買新皇帝Revolutsia的遺像）；還不知道是否可靠的一個人。三月革命後，彼得格勒的工兵蘇維埃和農民蘇維埃成立，通令各地派農民到彼得格勒出席農民大會，討論與農民有切身關於的土地問題；通令傳到了農村裏，有些說立刻派出，有些不主張派，恐怕受騙，經了種種的爭議，結果得了一個最高明的解決，就是：把村中最壞的人派遣到彼得格勒去。

總之，農民對於國家，法律等政治的觀念，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他不信服政治的權力與作用，只是知道一些過去政治的罪惡。

現在我們再來略談幾句，農民對於土地與勞力等社會的觀念是怎樣的？

農民自從有生以來，便專食息工作於土地之上，所以對於土地異常親密，他常叫土地作『土地母親』，『飲

食之源』等等名稱。可是他在土地上的經驗終只是限於耕作的勞動，所以他便把土地的所有權與土地的耕作權聯而爲一了。他相信：土地是上帝創造的，在牠的天然狀態之中是無所屬的，只有用自己的手在牠上面耕作的人纔能享有牠的所有權。諸如溪流，森林，田園之類，都是爲那些以自己的勞力去利用牠們的人而創造的。這是俄國農民對於地土的所有權的觀念。

他又相信，勞動力是一切生產的^必必要成分——這種信念大概是從過去的經驗中得來的，因爲，第一，在他的生存競爭中，勞動力是他唯一的武器，他自己所取得所享受的，無一不是靠着勞動力得來的，第二，在他的狹隘的眼光中，他確看見了勞動力生產了一切的東西。

根據上述的觀念，農民便堅信土地所有權應屬於自己。便是在農奴未解放以前，他們自己還被視爲地主的財產的時代，他還是高唱着他們的習語：『我們是你的，可是土地是我們的。』他把地主當作土地的劫奪者。一九〇五年農民大會中，有一代表說：『在農民的認識

之中，土地是上帝賜與人民的禮物，與空氣和水一樣的；却是只有耕作的人纔能取得牠，各依所需要的多少分取。』又有一代表說：『我們之要土地，並不是拿去出賣或典押，亦不是拿去作投機的生意，也不是拿去租給人以取利，我們唯一的目的只是拿來自己耕作。土地之有益於我們，並不是像商品那樣，只是因為牠能生產有用的物品。我們只要土地來耕作。』他們的這種觀念，反映在農民運動中，自然歸結到『一切土地都歸耕作的人民』這一句口號來。

實在，農民的見解，以為只有土地能夠醫治他們的萬孔千瘡。土地！土地！土地！這種呼聲已經日高一日傳遍全國了。他們堅信，將來必有一日，某種事情發生，一切都變動了，他們自己成了俄國土地的唯一所有主，這樣他們便即刻跳出貧困的圈子來了。這是他們的一種熱烈的希望，在長期的茹苦含辛的生活中，他們全賴着這個希望來鼓勵：來慰安。可是，對於這種希望，他們自己究竟有沒有具體的辦法來實現呢？有的。『土地國有』便是他們公認為可以實現這希望的手段，而且俄國的

農民運動實際早已趨向於這方來了。一九〇五年所開的農民大會，是俄國農民第一次的全國大運動。大會決議：『救濟農民因缺乏土地而生的疾苦，唯一的方法是將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再分配於那班依家族的勞動或依合作形式而耕作的人使用。』自然，這個大會只是代表小地主，特別是代表盛行『米爾』這種土地共有制度的大俄羅斯諸省的小地主的；可是大會的精神還是可以代表全體農民——當時『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已經從上層民衆當中高喊出來了。

不過，我們應該把『土地國有』的意義弄清楚。許多政黨和理論家，都以為土地國有的意義是：由國家收取一切的土地作為國家的財產，再拿來租與農民耕作，或是由國家直接備農民耕作，和國家所有的其他一切大工業一樣。農民的意思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意中的『土地國有』，就是由國家廢止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增加農民各人的土地，同時免去他們過去的担負的土地的債務。一九〇六年，列甯也說過：『(有人)反對土地國有；他對我說，農民主張土地國有，那便是他自己聲

明不要那他曾經說要的東西了。可是，我們不要只就字面看，應該就他所說的事實看。農民要私有制，自己的土地的販賣權以及『上帝的土地』等等話頭，都只是他希圖奪回地主手中所有的土地的一種反映罷了。這都是真的，我答應他。』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俄國農民的思想還純粹是自給的小農的思想。

此页无页码

第 七 章

十九世紀之革命思潮與農民運動

自由思想的先導者：魯維可夫與拉吉協夫

『十二月黨』之先聲：『救世團』——福利社』

『十二月黨』之派別：北社之政綱與策略——南社之政綱

與策略——『斯拉夫人聯合會』之政綱與策略

聖彼得堡『十二月黨』之兵變及其結果——南俄『十二月

黨』暴動之計劃，實行與失敗

克里米戰後之智識界——『西方派』與『斯拉夫派』『民粹

派』思想之創造者赫爾貞——繼起者

捷爾涅協夫斯基

『到民間去』運動之初試——拿洛夫的『宣傳派』——巴枯寧的『暴動派』——涅恰也夫之計劃與失敗——一八七三年以後『到民間去』的大運動——『民粹派』在民間的失敗

『土地與自由社』之組織，目標及其活動——暗殺之盛行——『土地與自由社』之分裂：黑分派與民意派——亞力山大二世之被刺與政府之高壓政策——學生運動之活躍與失利

社會民主工黨之成立及其分化：多數黨與少數——『黨地方議會』之活動——社會革命黨之成立

拉貞與布卡捷夫的運動，雖然在血腥的鎮壓之下，先後平服下去了；可是農民的困苦並未有絲毫解除，即因此而引起的不安與謀改革的要求反更潛滋暗長，並且從鄉間影響到城市，從愚昧的農民羣衆中反映到智識份子的腦網上。尤其是從國外傳播進來的革命思想的激盪與工業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於是俄國的革命思潮頓時匯成了一股巨潮。而立在最前綫，喊出『給與自由』的第一聲的，我們應當說是十八世紀末的魯維可

夫(Novikov)。加特林二世是最會扮鬼相的，最初她且自命爲是法國福綠特爾(Voltaire)的信徒，她曾和福祿特爾通信過，魯維可夫便在她的這種假面具之下，發表了許多希求自由與改革的意見；雖則都是用的譏刺的舉調，說得有些朦朧茫漠，而且又多偏於慈善的輿論理筆一方面，並不敢明言要求如何改造國家與社會，可是他也曾竭力攻擊加特林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戰爭，他確是作了一種『破壞運動』，他確是引導俄國的智識份子注意到政治與社會改造的第一人。他的結果是很可憐的，他先後辦了三種雜誌(懶漢，畫匠，錢袋)，後來雜誌被封閉，一七九一年，他已鬚髮斑白，却被迫投入Schliisselburg的國家監獄中去了——這時因爲法國大革命的威嚇，加特林已經完全拋去假面具了。

當時還有一個拉吉協夫(Radishchev)，也是受了法國盧梭的影響，深不以少數人窮奢極欲而多數人饑寒致斃的現狀爲然，他作了一部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旅行記，用者極簡潔明瞭而又雄偉動人的筆調描寫當時官僚的腐敗以及農民生活的痛苦等等，讀了真可

以令人裂眦潰血。其中有一篇詩，題作自由頌，簡直是公開地號召人民起來反抗皇帝，反抗萬惡之首的農奴制度。這一部書充分表現了自由思想逐漸在俄國得勢，加特林看見了，大為驚懼，竟說這部書『比布卡捷夫還要壞些！』因而，拉吉協夫被判定處死刑，後來加特林又賣好，改為十年徒刑，放逐西伯利亞。

亞力山大一世時代警衛軍中有一部份抱着自由思想的青年軍官，於一八一六年組織了一個『救世團』(Society of Salvation)。這個團體並不與民衆接近，却反與亞力山大有着密切關係——這和戊戌維新時代的康梁黨相似。這團體中有三派佔有勢力的思想。一

派是穆拉維夫(Nikita Muravyev)代表的，他是一個高等參謀，他贊成一種英國的憲法，用元老院去限制皇帝的行動。一派是尼可拉·屠格涅夫(Nicholas Turgenev)代表的，他是一個稅務司，他贊成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而尤為他所想望的是農奴的解放；他認為解放可以自上而行，可是倘使政府不肯這樣辦，他也準備和其他的人去採用別種進行的方法。第三派的代表人

物是拍司特耳(Paul Pestel)他贊成法國雅可賓黨的辦法，用暗殺皇帝及政府官吏家族的手段推翻現時的政府；但他承認這只是一種社會大改造的序幕，此後，農民應全部解放，消滅一切階級，建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藉偵探與檢查種種方法去鎮壓反革命；土地的一半仍留在現有主的私人手裏，一半拿來平均分配給全體農民。後來，因為亞力山大日更反動，『救世團』的依靠皇帝的思想逐漸失勢，大部份都主張舉行一種政變，可是，終於因為內部意見分歧，遂改組為『福利社』(Society of Welfare)；接着因為內部份子意見的分歧和居住的離散，又分化成了『南社』和『北社』兩團體——這便是後來被稱為『十二月黨』的組織。

『北社』的領袖人物是特陸伯次科(S. P. Trubetskoy)，穆拉維夫，詩人李列夫(K. F. Ryleyev)，他們可以稱作『十二月黨』的右派，他們大致都是贊成君主立憲的，只有李列夫主張民主共和。據穆拉維夫所擬的憲法草案看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取得，都有極嚴格的財產限制，(選舉權之取得須有不動

產五百盧布或動產一千以上的財產；被選舉權須有不動產三萬盧布或動產六萬)，這實無異於取銷大多數農民和貧民的分民權了。他們對於農民問題的主張是：農奴可以解放，各人所有的房屋及園圃可以賞給，原有的農具及牲畜亦歸農民所有；但土地則歸地主——後來他們覺得這樣太不像話，便改爲每戶農奴於解放時頒給二俄畝土地。至關於革命的策略，『北社』的主張是：趁亞力山大一世逝世的時機，將他們運動成熟的軍隊，整隊排列出來，要求新政府實行憲政；如果政府方面看見兵士很齊心很堅決，社會方面又看見反抗朝廷的軍隊並不擾亂，那就可以不放一槍不遺一彈，成就革命事業於雍容揖讓之間——這其實何曾是革命的策略？總之，『北社』的政治主張與農民政綱等，顯然是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甚至於地主階級的，亦即是使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妥協而使農民吃虧的主張。我們明顯看出：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既可因農奴解放而得到『自由的工人』和『國內市場的擴大』（解釋見第四章）；別方面，地主和商業資本階級又可以保存剝削壓榨小農最便利的

經濟形勢——田地仍在地主手中，僱農佃農勢必日益窮窘，仍舊不得不將所有的農產品儘可能地快，結果是賤價，賣給鉅商。

『南社』可以稱作『十二月黨』的左派，他的領袖便是拍司特耳。他們的主張，大致可以從拍司特耳所著的俄國正義一書中看出。他們對於政治制度的主張是：國民會議之中選出一種執政委員會爲中央政府；憲法上沒有公民資格的限制，的確是很『民權主義』的共和派。他們對於農民問題的主張是：將貴族地主的閹閹取消，一切土地都收歸國有，然後將土地之一半頒發給所有的農民，『平均地權』，使全國人人都有田耕；其餘一半土地則由政府經營，或是發賣給大資本家。據他們的意思，農民所耕的一半田地是供給全國糧食的，政府或大資本家所經營的一半是供給國外市場的。當十八世紀時，俄國全國土地之中，還有二分之一屬於農民；到了一八二五年的時候，農民所耕的便只有三分之一了。所以如果照拍司特耳的主張，農民的確可以多^得些土地；而且他的土地國有計畫，的確能取消貴族閹而開關工

業資本發展的大道路。他又主張有五千俄畝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一律無代價沒收；五千俄畝以下的方能從政府取得若干田價；而對於農民之中的『各戶獨立的自由小農經濟』，則須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沒收。拍司特耳的社會思想是很急進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他痛恨『財富的貴族』，即資本家，和法國大革命中的『山岳黨』相似；然而他終於容許大資產階級式的農業經濟，這便不免是和資本家妥協了。『南社』的革命策略是徹底的武裝暴動，認為必須宣傳兵士羣衆，激起極大的兵變，然後以革命軍的力量推翻俄皇政府，組織臨時革命政府，召集國民會議。

此外，還有一派可稱為『十二月黨』的極左派的，便是『斯拉夫人聯合會』這個組織。牠的份子多半是駐在南俄烏克蘭一帶的軍隊中窮苦的下級士官，領袖是彼得·波里莎夫 (Peter Barisov)。『斯拉人聯合會』成立不久便歸併了『南社』。他們的黨綱是很左的。政治制度上他們主張建設斯拉夫各民族的聯邦共和國——北至北冰洋，西至波羅的海，南至黑海，東至裏海。而

且他們是澈底的民權主義派，『民權主義』一字只見於這一派人的著作裏。對於農民問題，他們的主張雖然不很詳細，可是也很澈底。他們在哲學思想上又主張極端的無神論。至關於革命策略，他們是最堅決地主張武裝暴動的；而且在實行上，他們也是唯一的與兵士羣衆有關係的人。

現在我們要紀述『十二月黨』革命的實情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亞力山大一世在赴塔干洛 (Taganrog) 會晤皇后的途中逝世了。皇位本已宣佈決定由他的二弟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繼承的 (亞力山大無子)，但康士坦丁早已辭去，又內定由三弟尼可拉繼承——可是直到亞力山大死後才宣佈，於是朝野大譁。當時又起了一種謠言，說亞力山大一世死的時候，有一道遺詔——應許農民自由，並減少軍役的年限 (當時爲二十五年)；可是這一遺詔却被尼可拉藏了，不肯發表。『十二月黨』的北社便利用這個時機規劃他們的革命政變。他們當然依照他們的『不擾亂』的革命策略行事。十二月二十六日，正當尼可拉一世即位後下令軍隊

向新皇宣誓的時候，有兩千爲北社所『宣傳』的軍隊到了謝德場(Senat Square)，高呼『Constantine and Constitution!』(『康士坦丁和憲法!』)，聲勢極盛。立刻

波及了一般『看熱鬧的』民衆，民衆的怨恨已深，受着這種武裝示威的刺激，有一能即發而成羣衆暴動之勢；同時在謝納德場對面正在建築的伊薩吉也夫教堂中忽然飛出了許多磚石木棍，向尼可拉一世當面打來。最初尼可拉還不知道『十二月黨』在軍隊中的力量，不敢下令開槍，只派聖彼得堡的警備司令米羅拉多維奇代表新皇覓暴動的領袖解釋。可是十二月黨的負責領袖特陸伯次科因爲恐怕開鎗，並沒有到場。米羅拉多維奇轉身的時候，被暴動中的加何夫斯基槍擊了數下，傷勢極重。尼可拉看見危急到了，便下令用大砲鎮壓，一響空砲之後，接着兩排連珠彈，騷動便立刻肅清了，剩下着不能動彈的死屍浸在殷紅的血泊裏！

聖彼得堡的兵變失敗之後，十二月黨人差不多全體被捕了。一八二六年審訊的結果，五個領袖——伯司特耳(在南俄被捕的)，李列夫，亞坡斯托爾，(H. I Ap.

stoe)，盧明 (M. P. Bestujev-Riumin)，嘉霍夫司基，(P. A. Kahovsky)，即時被處死刑；其餘一百六十餘人分別流配到西伯利亞各地，大半都受終身苦役的徒刑；還有幾千兵士充軍到高加索，差不多都因水土不服慘受折磨而死，或者被那地方的山居民族所襲殺。

『十二月黨』本因聖彼得堡十二月二十六日北社所『指揮』的政變而得名，其實真正的『十二月黨的革命』乃在南而不在北。我們且略述南社所指揮的革命之經過。南社當初的計劃是，乘亞力山大一世首途到塔干洛之際，帶領當地為他們所鼓動的一師人沿途劫駕，一面通知北社，運動禁衛軍及海軍兵變，同時便帶着這一師人進攻莫斯科。我們可以看出，南社的規劃和北社的完全不同：北社並沒有準備武裝暴動，南社却很却定地準備了，並且準備實行革命戰爭的『北伐』；北社並沒有認真宣傳兵士，他們只想用軍官的資格帶領兵士作武裝的示威；而南社却想宣傳一師的兵士羣衆，然後以革命領袖的資格率領革命軍作戰。不過左派的規劃沒有實現——亞力山大中途病沒，南社的密謀又被發覺？伯司

特耳竟於聖彼得堡起事的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南俄被捕了。然而南社黨人却始終不肯放手，仍舊積極進行，尤其是極左派的『斯拉夫人聯合會』的份子主持最堅，他們和兵士羣衆很有關係；已經宣傳成熟的有捷爾涅可夫一營。一八二六年一月九日，（俄舊歷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們便舉兵暴動，率領這一營革命軍的便是亞波斯托爾。可是其他的軍隊宣傳尙未成熟，却還聽從政府的命令來彈革命軍。這一場衆寡不敵的惡戰當中，捷爾涅可夫營的兵士都奮勇爭先，至死不却，更不用說革命黨的軍官。其結果當然也是失敗，可是這種失敗是『雖敗猶榮』的——因為南社社員，尤其是『斯拉夫人聯合會』的份子，在這次暴動中，的確充分地表現他們革命鬥爭的決心；他們知道革命的勝利祇有革命戰爭可以取得，希望皇帝召集各閣會議等等立憲的計劃，完全是機會主義的空想。

『十二月黨』的革命是失敗了，可是牠的影響却至可驚人，正如赫爾貞（Herzen）所說，『謝納德場的砲聲驚醒了全時代的人。』這時以後，壓迫更加殘酷，因為

作了一個手勢，便遭流徙，爲了一句話，便受絞刑；然而，無論如何，勇敢的青年仍舊不斷地與黑暗勢力搏戰，『十二月黨』的思想終於不能消滅。好像一顆活的種子，埋在地下，等到三十年後，克里米戰爭的時候，又開起鮮艷的花來。

『檢稿官』的制度是最有效的箝制言論的工具，俄國的智識份子，雖然懷有不少的自由思想，都作聲不得。然而他們終於找到了脫逃的方法，這是一種爲非俄國人所不習的翻弄檢稿官的手段。一種是純粹用滑稽的筆調寫出時代的黑暗，如戈戈耳的巡按和死靈，如格里波也多夫的聰明者的不幸，都是此類。另一種是運用哲學的文句來討論宗教政治的根本問題——德國黑智兒的哲學這時跑進俄國來代替了法國的實際的革命思想；這本來容易使人由實際而轉入只逞空想，然而在當時使得他們藉此能多說幾句話，却是很有益處的。尼可拉一世的檢稿官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之徒：他們檢查只憑個人好惡，常是鬧許多笑話，哲學的話頭是他們不懂

的，因此極容易混過。克里米戰敗，各方面都陷於不靜之中；在智識份子方面，各地都有團體發生，討論社會與政治各問題。在司丹克維奇教授(Prof. Stankevich)家裏常有許多人聚談着，其中重要的人物是亞克沙可夫(Conotanrine Aksakov)，他是一個理論家且是一個詩人，是一個專於寫農民故事的作者的兒子，他和他的兄弟伊凡都是斯拉夫派(Slavophilo)的代表人物。他們都相信俄羅斯對於歐洲實負有知識的與宗教的使命；卡可夫(Michael katkov)^中，他是他們中間最年輕的一個，主持着一種雜誌(名莫斯科報)；巴枯甯(Bakuniou)他是特維爾省的一個地主，是俄國無政府主義的創始者；赫爾貞，他是一個老年人，曾被充軍，此時方得允許回來的。最可注意的是這班人都是莫斯科大學的同學，後來大學生之成爲革命的中堅人物，當然是他們的影響。而這一羣人物的真正中心並不是司丹克維奇而是著名的批評家伯林斯基(Belinsky)。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政治思想在俄國的智識份子中已經非常活躍，當時有兩派對壘着——即『西方派』

與『斯拉夫派』。這兩派的爭端是由於恰達也夫的一封私人的信引起的。恰達也夫(P. Chadayev)是與『十二月黨』友好的而非其信徒，他是極端鄙視俄羅斯的；在他的那封信中，他盡情地描寫着俄羅斯自己的道德之窮乏。『西方派』願意俄羅斯成爲西方文明中的一部份；『斯拉夫派』也同樣不滿意於當時俄羅斯的官僚政治，可是他們爲一種愛國精神所影響，便不理會西方而掉頭從俄羅斯本身去尋取自己的一種文明的原素。而其實在每一俄羅斯人的本性中都存有這兩方面的傾向；俄羅斯之終於得救，我們可以大胆地嘗試說，是兼有兩派的思想而成的，但也可以說完全不是那兩派思想的勝利。赫爾貞便是同時具有這兩種傾向的人。赫爾貞是被稱爲『俄國的福祿特爾』的一個思想家；『俄國的農民是俄羅斯的且是歐洲的希望』，這種『民粹派』的思想之創造者却也是他。他很受了聖西門的社會主義的影響，他却又很贊成『米爾』的土地公有制，以爲藉這種制度便容易實現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他忍受不了本國的那種沉悶的令人窒息的空氣，跑到巴黎去，看了法

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後的情形，對於資產階級的文明又很快地絕望了。與赫爾貞同時的還有捷爾涅協夫斯基(Cher Nyshevsky)，他是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和批評家，也是俄國的第一個唯物論的哲學家。他也很肯定『米爾』的共有土地之重要意義；他因此斷定俄國可以立時實行社會主義，至少可以縮短私有制的期限。他以爲人民應該有權指揮政府；只因爲現在教育未普及，所以改革能從上而下；但要行這種改革，從下面發生的種種暴動反抗也是必要的。他又主張各國民族都應有自決權，因之不但波蘭應該獨立，便是烏克蘭也應聽其自主。一八六〇年以後發生的許多革命主張和行動都受了他們兩人很大的影響。

農奴解放會頒布的前後，農民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注意，而其中最活躍的當推大學中的新智識份子。一班大學生幾乎覺得自己對於農民實負有極大的使命。一方面，那些農民家庭出來的學生，受了歷史上和社會制度上農民之孤獨的地位之教訓，對於本階級的忠誠自然是出諸本性；而另一方面，那些地主的子弟們這時

也覺醒了，看出那作成了本階級的榮華富貴的農奴制度却是最不公道最不合理的東西。大家都帶着一種熱烈的同情去讀那些寫農民生活之艱苦窮乏的著作。一八六一年的學生騷動便是由於他們關心於農民運動而起的；政府對於騷動者之處罰和開除等等；只是使得學生羣衆中更跑出了許多自願的犧牲者。赫爾貞在他的雜誌裏面作了一篇很可注意的告被除名的學生的文字：他說民衆的騷動乃是迫在眉睫的那種大風暴的第一吼聲。『到民間去吧！』他寫着。『那兒是你們的出路，被放逐的學生諸君，俄羅斯民衆的戰士。』他的這種勸告立刻被數百人接受了。一八六三年波蘭暴動以後，革命的潮流本來比較低落，到了一八六七年，政府對於大學取了加嚴取締的手段，於是又從新喚起了學生爲民衆服務的熱情，一八六八年司莫倫司克大饑荒以後，學生騷動更爲活躍，政府的鎮壓也極嚴厲，後兩年中常有全體驅逐出校的事。

在這騷動與壓迫並進的時候；革命的領導方面撐出了兩面緩進與激進的旗幟。

一面是拿洛夫(Colonel Lavrov)的，他是俄國哲學家中最有科學思想的人。他以個人的進步與發展爲他的學說的中心。他說，有知識的精粹的人民，從思想上得到確信，纔真是歷史的創造者；其餘的因襲的奴隸，對於古來習俗傳說，不加考察，一味盲從，都是歷史以外的人物。他們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識，但他們只用這知識來擁護現存的制度，並不仔細批判，只以爲古來傳下來的便都是好的——所以這班人還只可稱『有教化的野蠻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人』。他估算現在的統治者便都是這種歷史以外的人物；他們固執地不肯講論法理，又竭力保守他們從歷史的因襲上得來的特權。其餘的是窮苦的勞動者，他們爲生存競爭所迫，每日僅夠工作，沒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們是文明的犧牲，是人類的『罪羊』。所以這是有思想的少數人的義務，去啓發他們，察知他們不幸的原因，使他們能協力來改造歷史，向進化的路走去，使個人的自覺與社會的共存同時并進。

他在他的有名的歷史論集(Historical Letters)中

說道：『我們將到了這時期了：那時人類的理想可以實現；個人本能的傾向，也可以與公衆的幸福相調和。只有將人類組織成一個合衆的大團體，用公益公理互相繫住，這樣才能造成個人的幸福。』那時人能戰勝生存競爭，戰勝動物世界，能夠將批評思想壓服自然：這乃是真的進步的根基。但要做這事，孤立的思想家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必須依託着在那兒作工受苦的民衆纔可。凡是有知識的少數人孤立存在的時候，文化必然消滅。試引古代文化爲證，其時民衆立於奴隸的地位，不懂得文化內面的意義，所以並沒有要維持文化的意思；所謂超人的一個等級（指貴族），自己掘了一道溝，同民衆隔開，造成他自己的滅亡。反過來說，便是凡有關心個人的發展與公衆的幸福的人，都應該從他們的 Piogah 山（舊約出埃及記摩西登高望樂土的地方）下來，走進平民的大平原裏，握着漂流人民的手，引導他們到乳蜜隨處流着的樂土。……

拿洛夫的歷史論集在一八六八年出版，在革命運動中影響頗大。這部書將從前一班智識份子的人朦朧

感着的思想總結起來，對於『怎樣辦？』這一問題給了一個明白確實的回答。他說，智識份子對勞動階級應有一種義務，因為他們全仗着勞動者而生存。他們自己並不生產什麼物質的財富；所以他們倘若仍然很傲慢高貴地同民衆遠遠隔離，那時他們非但自私，在社會的意義上簡直已毫無價值；他們這樣就是自己宣告了對於社會的破產，對於社會的債務無力償還了。他們對於供給物質享樂的民衆所負的債務，只有一法可以報答，便是投身於平民中間，順應了他們現時的需要，永久的權利與所有的力量，去啓發他們。

拿洛夫所要求的不在部份的改良而在社會根本的改造，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採用激烈手段，但是主要的方法仍在教育與宣傳。

另一面旗幟是巴枯甯的。他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是柏林斯基派中有名的角色，最初在那兒號召智識份子的騷動。一八六二年從西伯利亞脫逃回來，從一八六八年起並在日內瓦主辦人民事情雜誌（Delo Naroda），他要大家最先一步要拋掉宗教的束縛，同時也不

要爲家庭或財產的遺跡所困惑。他說，國家必須毀滅。巴枯甯的信條是無政府主義；將來的社會應立基於若干自由的地方共產團體之上；生產機關必須社會管理。巴枯甯號召一種武裝暴動。『要任何鄉村暴動起來，這並不是難事，』他很輕易地這樣寫着，他的這種號召比較拿洛夫所宣傳的溫和方法要動人些。涅恰也夫(N. ehayev)是一個青年教師，是巴枯甯的信徒，受巴枯甯之命着手組織一種反抗政府的大暴動。他主張革命應該有整齊的步驟和嚴格的紀律。他當時的計劃分作三個步驟，第一步注重城市，第二步注意鄉村，第三步實行大規模的城鄉大暴動。他建立了許多小團體，他自己便在上面指揮管理一切。他是一個極強項的人，他只用一個空洞的委員會的名義行事，絕對的獨裁，甚至於命令殺却他所不滿的人。他的計劃因是被告發了，一八六九年冬，八十七人被捕，其中三十七名被判決監禁，其餘的都被放逐（一八一七年）。涅恰也夫逃到瑞士，一八七二年被捕引渡，判二十年的徒刑，一八八三年死於獄中。

急進的學生分成了兩大派：信從拿洛夫的宣傳者與信從巴枯甯的行暴動者。滿心反對政府並願意以全力為農民服務，這是兩派完全相同的；他們當然可以繼續合作，除非他們所採用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衝突，那時才會成問題。即令是一個小小的學生團體當中都有兩派的信徒；一個宣傳者是否會更進一步變成實行家，這完全看政府的壓迫程度如何而定。那些宣傳家當中最有名的是尼可拉·恰可夫斯基 (N. Chaikovsky) 和他的同志，無政府主義者的克魯泡特金也在裏面。他們最先在聖彼得堡進行宣傳工作，特在工人羣衆中，傳佈他們所信崇的經濟理論的印刷品。後來他們有了經驗，知道要去幫助農民便須穿農民一樣的衣服，過農民一樣的生活。於是數百男女學生便都到鄉村中去尋找任何可能的職業，作為宣傳工作的基礎；有些充當教員和村會書記；有些作鐵匠或保姆；有些去開小旅館或小店舖，這兒便同時是他們的印刷品的堆棧。他們的印刷品大多數是小冊子；可是一八七二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也譯成俄文了。

不久，政府明令禁止恰可夫斯基與他的同志的活動。然而這只是使他們更加倍活躍起來。他們藉了政府的印刷機關，米希根印刷所，仍舊可以在莫斯科印刷各種宣傳品。一八七三年他們吸收了許多新份子，有許多是工廠的工人，那有名的出身貴族的女革命黨人蘇菲亞(Sophia Perovskaya)便是在工人羣衆中活動的。他們又在各省設立支部，例如克拉夫金斯基到特維爾省去作鋸木匠，亞克塞爾名特到基也夫，柴立亞波夫(一個僱農)阿捷沙都先後成立了支部。一八七二到一八七三年間，到民間去的運動掀動了許多青年的熱情。許多都在農村中尋得了一種經常的職業，特別是任學校教師，同時爲農民服務。蘇菲亞在加馬地方充種痘的醫生。卜列希戈夫斯基是一個省法院法官的妻，她在農民中得了極大的信仰，農民竟稱她作『皇后』。他們傳佈的印刷品是拉員和布卡捷夫農民暴動的故事，或是暴露租稅苛重的真情(一部聰明的機器)，或是講述租田制度的黑暗(我們的土地怎樣變成不是我們的?)。他們又印了一部金色丹書(Golden Charter)，用金字

印的封面，在烏克蘭一帶散分，並要求以這部書作為真正的土地法律。在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間，幾乎每省都有許多小的革命團體，特別是在瓦爾加河與復尼拍爾河下游一帶有名的不安靜的許多地方，更是如雨後春筍一般怒長起來，總算起來，約有兩千人到三千人從事這種工作的，其中大部份是女子。一八七四年，政府大加搜捕，有一百九十三人被捕，其中多數判了徒刑。後一年，又有七百七十人被捕，其中被監禁的二百十五人，還有許多受各地行政處分的。

這些『民粹派』(Narodnjkj)並不能完成他們到農民中去的使命。面生的人在鄉村中最易為人們發覺驚異，不比在城市中。農民看見了這班面生的人的舉動，都弄得有點莫名其妙；他們許多都把接的印刷品拿去請牧師為他們解釋。有時他們自己竟把宣傳員捆綁起來送到巡警局裏去——我們只要去讀一下屠格屠夫在新時代中所描寫的，便可以知道當時農村中落後的情形。『民粹派』的這種失敗，自然使他們對於拿洛夫的慢慢宣傳的方法起了懷疑，而更傾向於信徒巴枯寧的簡

單的『力』的理論。而另一方面，也只有一個例證，（一八七七年，司捷凡洛維奇和杜習在奇格林作的）是由宣傳煽動家號召起了一次農民的暴動，而這次的暴動還是靠了造謠言，假傳聖旨，說是俄皇已經下令把土地給與農民，只是地主從中阻撓，現在派他們來，要農民起一次暴動反抗地主，才能成功；這次的暴動引起了極大的壓迫，不僅使當地的農民羣衆胆怯了，便是其他的『民粹派』亦多有點畏縮，大家都歸咎於這種錯誤的策略。他們的失敗的教訓之一是，農民只關心於土地一件事，對於政治是不管的；便是社會主義，大體說來，也並不能引起農民的注意。

這一切使得宣傳者與實行家間的裂縫更擴大了：宣傳者是主張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工作，使農民知道起來要求一種更公平的財富的分配，因而宣傳者是比較沒有很好的組織的；而在實行家一方面，他們覺得在鄉村中是沒有什麼可作的，而傾向於爲人民而活動，不必經過人民去活動，因此主張一種最嚴密的政治組織作工具。這些爲失敗所苦惱的黨徒現在便都聚集在大

城市的貧民區域中，都沒有護照的（按，俄國當時每人必須有一護照，寫明他的姓名籍貫職業住址等，隨時須受巡警的檢查，）便在那兒盤桓着，和巡警作一種有計劃的鬥爭。在另一方面，各種團體仍繼續合作着；各省的支部仍舊被視作一種有用的根據地，用以幫助一種有組織的進攻。實行家的行動常是使得政府大發雷霆之怒，加嚴搜捕，不僅是連累了許多宣傳家，並且還連累了一般的公共團體；一八七七年莫斯科有五十個和平團體的會員被捕聽審，便是爲此。

這時，（一八七六年）拿占生（M. Nathanson）和其他的人在聖彼得堡組織了一個團體名『土地與自由社』（Land and Liberty），這團體的目的是想用武力的方法從下層作起，實現一種經濟的革命。牠懸的目標是：『土地應當是耕田的人所公有的財產，自由應當是一切人支配自己事務的公權。』牠設有一個組織很有系統的參謀部，參謀部的作用便是造出各地可能的罷工與暴動，同時也進行宣傳工作。牠的『heavenly chancellery』部便是專於製造假護照的，牠的『破壞部』（dis-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是專於計劃恐怖行動的。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在卡占大教堂前面舉行的大示威運動，當時主要的演說人便是卜列哈魯夫 (Plekhanov)，結果被政府拘捕了許多，並受了嚴重的處分。在革命黨人中間，潮流實更向恐怖主義的方向湧去，和平的方法逐漸被人遺忘了。

俄土戰爭(一八七七到一八七八年)中，革命運動暫時平息了一會，這是愛國精神的影響所致。戰爭失敗，失望的空氣充滿了民間，革命運動立時又活躍起來，而且比以前更有強固的組織。一七七六年，巴枯寧已經在伯恩去世，特卡切夫 (Tkachev) 在瑞士主辦 Tocsin 及 思想之安那其 兩刊物，便鼓吹由少數有組織的黨人用恐怖主義為手段來發動一種革命；——這種主張，從各方面得了很大的同情。在吉也夫地方有一個暴動的團體，共有二十五個人，都是全副武裝；組織齊格林的農民暴動的便是他們當中的兩個。米哈洛夫奔走於俄羅斯東部及東南部，組織各地革命的大小團體，而以之統率於聖彼得堡的『土地與自由社』總部之下，

一八七八年四月以後，他便住在那兒指揮一切。吉也夫的黨人更有高明的把戲：有一個黨人謀得了一個管獄官的位置，後來又提升為獄長，於是他便把被拘的同志都釋放了。大規模的拘捕與審判實際是替革命運動登廣告，特別是一八七八年一月聖彼得堡審判一百九十三人案的時候，米希金當堂咒罵法官是賣淫婦，同時全市起了一次大的示威騷動，抗議政府的處分。聖彼得堡的衛戍司令特里波甫將軍為女黨人維拉，查蘇里奇（Vera Zasulltch）所殺，也在這時候，是抗議官廳對於犯人波戈列波甫用笞刑的。阿節沙也有暴動，結果科瓦耳斯基被處了死刑。聖彼得堡的憲兵長官梅占塞夫將軍白日在街市中被克拉夫金斯基刺殺了。（一八七八年八月）。聖彼得堡與哈戈夫被拘禁的罪犯，有許多都是還沒有經過審判的，於是全體絕食反抗，結果都依戒嚴令的處分定罪。暗殺的案件日益加多，最後却集中於刺殺俄皇本人了。

一八六六年，卡拉科卓夫刺殺亞力山大未成；一八七三年莎羅維夫向亞力山大連放五槍，仍未命中。此時

暗殺已變成了一種有組織的行動，政府便也用很嚴密的鎮壓方法來對付。不久，吉也夫的黨人全體被捕，領袖阿奧斯基處了絞刑。在此種嚴重情形之下（一八七九年），『土地與自由社』的諸領袖便召集同志到烏洛涅奇開會，討論今後進行方針；各地的許多溫和派正在烏洛涅奇等候的時候，激烈派却先在里卜茲克舉行了一次預備會議（一八七九年六月），決定立時下手刺殺俄皇。後來溫和派多已離去烏洛涅奇，到正式會的人數並不是多數，但兩派的人都有，並且同意決定：除了對於普通的工作仍舊合作外，可以各行其是。溫和派在卜列哈魯夫的領導之下仍繼續他們的宣傳工作，他們出版一種機關報，報名Plack Partition，因此他們一派便被稱為『黑分派。』激烈派使用『民意派』（The Will of the People）的名義活動，他們更激進地謀殺俄皇。此時他們組織有一百餘人，以炸彈為武器，一八八〇年二月哈耳都林（Halturin）再一次失敗以後，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在蘇菲亞的手帕飛揚的當兒，兩顆炸彈，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早在一年以前，政府便已設立最高委

員會，作為最高行政機關，可以管理政府各部，實際便是防備俄皇被刺，免致中樞失主；果然，政府此時仍舊極其鎮定，只是嚴索黨人。自由派的官吏和議員們（各地地方會議的）最初本來是取中立態度，一方面要求俄皇政府切實施行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勸告革命派勿過於趨向激烈；亞力山大二世被刺以後，他們便大部分都投到政府方面去——其實此時政府便是對於他們也加意防範束縛哩。此次的結果是：謝里亞波夫，蘇菲亞，啓巴爾奇，里沙可夫和米哈洛天被處死刑；格里涅夫斯基是自戕的。其餘被捕的都判了長期監禁或充軍西伯利亞。革命的組織此時實際都被破壞了，領袖多逃去國外。個人的暗殺行動仍繼續着，這完全是由於憤怒激起的，但很少成功。

此時政府的壓迫仍舊轉向教育界和出版界兩方面來。亞力山大二世發佈的大學法令廢止了，新法令把大學的自治權完全取消；學生俱樂部的組織也遭封禁，如有企圖組織的即罰去當兵。政府又通令，下等階級的子弟不許入高等學校肄業。各地初等小學本是「地方議

會』主辦的，但政府還覺得『地方議會』的自由思想太濃厚，主張改由教會主辦；但因教育經費的徵集，『地方議會』比教會有力得多，便作罷論。一八八二年卡站大學與聖彼得堡大學都有學生的騷動，一八八七年，莫斯科，阿節沙，哈戈夫與卡站各地的大學生都先後騷動起來。政府派馬隊去鎮壓，接着便是開除，充軍。此時入學試驗的主要點是政治信仰，稍有可疑的便不收取。一八九六年，聖彼得堡的學生舉行年會也遭禁止了，莫斯科的學生舉行一種示威向政府抗議，却被『戈薩克』的軍隊驅散了。第二天繼續有示威運動，因為學生不允解散，於是有四百人被捕了，其中百五十人判處流刑，二十六人開除了。一八九八年，教育總長換了一個極反動的人物（波戈列波夫。）次年，因為聖彼得堡的教區長痛斥學生的行動不合，學生便示威反抗，結果，『哥薩克』用皮鞭驅散了。此種消息傳到莫斯科，也發生了同樣的騷動，一萬三千學生罷課示威，政府便命令全部罷課學生均須強迫去當兵。一九〇〇年吉也夫有一千學生集會，被『哥薩克』包圍了；結果五百人被捕，其中一百八

十三人被強迫從軍，其餘的都被開除了。此後莫斯科，哈戈夫，聖彼得堡均繼續有騷動發生。一九〇一年，波戈列波夫被暗殺，此後便轉於一新時期了。

工業的發達，在俄羅斯同時造出了兩個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最初，兩個階級都是比較幼稚，都要求一種法律來保護——否，毋甯說，來劃清兩方面的義務與權利。當時，因為交通等等關係，勞動力的供給還沒有十分充裕；因此，在一八八二到一八八六年間的勞動立法，對於工人的利益都還有相當的保障。可是，工業愈發展，資產階級愈聰明，從前的立法不能再忍受了，頒佈那些法令的彭基被加上了實施『社會主義』的罪名而褫職，一切勞動立法都失去了實際的效力，無產階級便完全陷入了悲慘的命運。馬克思完成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因此在俄羅斯得到了實際的例證，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因之也盛極一時了。『土地與自由社』於一八七九年在里卜茲克分裂以後，為卜列哈魯夫領導的溫和一派便認定政治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騙局，』

因而絕口不談政治而專於研究經濟問題。到了一八八二年，『民意派』的武力政策顯然是失敗了，『黑分派』便也轉而注意於政治問題。『黑分派』贊成馬克思的主張，反對巴枯甯，牠不主張毀滅國家，却要藉國家作工具來實現自己的理想。牠不注意農民而注意工人。牠準備與中等階級合作促成民主立憲，這樣便容易拿馬克思主義去教育工人；在牠的黨綱裏並包含了自由派的要求——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在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四年間，卜列哈魯夫和他的同志組織了許多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一八九一年，社會主義者聯合自由派，準備發起一次立憲運動，但無結果。社會主義者自身却都極力謀團結。一八八九年，在南俄舉行了一次社會主義者的大會，各地的革命團體以及猶太人的社會主義的團體（朋德社）都派有代表到會，結果成立了『社會民主工黨。』在最初，社會民主工黨內便有兩派意見：一派是聖彼得堡和烏洛涅奇各團體的，他們認為工人運動只是一種經濟的鬥爭，在這鬥爭當中，各個團體的行動均應絕對自由；另一派的意見是主張有

一集權之中央機關，同時須有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這派的代表人物便是列寧。一九〇〇年，他們出版了一種機關報，名火星 (Iskra)，由卜列哈魯夫，列寧，馬爾託夫等編輯的，並且進行有組織的宣傳工作，不僅在工人和學生中，並且要到農民和軍隊中去。一九〇三年，社會主義工黨在倫敦舉行第二次大會，爲了修改黨綱和章程的問題，分裂成了兩派，列寧所領導的佔了多數，遂被稱爲『多數派』(Bolsheviks)，卜列哈魯夫與馬爾託夫便成了『少數派』(Mensheviks)。一九〇四年曾有一次兩派聯合運動，因爲『少數派』拒絕參加，遂無結果。他們以後的發展，不在此地說了。

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雖然社會主義已經是輸入了俄羅斯，而實際流行着的還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基礎便在於各地的『地方議會』(Zemstvo)——這是一種民選的地方自治的組織。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三年間，在南俄及瓦爾加河流域一帶產米的省份都遇着了大的饑荒——這次饑荒是空前的大災難，農民真是十室九空，坐以待斃。政府沒有能力施行救濟，這救濟的責任

便完全落到『地方議會』身上去了。這時又如七十年代一樣，大批的學生都下鄉了；他們都到『地方議會』中去服務，藉救濟的工作與農民接近。『地方議會』的議員中，最好的份子自由派，牠的職員中最好的便都是革命黨人；這兩者的合作，在農民中間頗有好的影響。

尼可拉二世（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七年）繼位，聲明繼承他的父親的一切政策，而實際是更黑暗，更兇殘。革命黨人多數只能避居國外，却是活動更力。『民意派』中有一部份人這時便着手組織了一個『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工黨』顯然不同的，便在於牠專注意於農民。牠認定農民是俄羅斯的救星，牠從農民中尋出了俄羅斯人民的『愛國精神』出來，與社會民主工黨的『國際』觀念全然不同。牠的黨員的數量立刻便多過了社會民主工黨；牠也沒有十分集權的中央組織，牠的黨員有很多機會插足到『地方議會』中去活動。因此，牠立刻便被承認為一個農民的革命黨了。『社會革命黨』是信奉社會主義的，可是牠的社會主義不過是『要求一切土地盡屬於農民』這一條而已。同時，因為牠

的工作環境的影響，這些『社會主義』的黨員實際多是超等的『個人主義者』；他們確是勇敢有為，他們的思想却不過近乎英國的激進派罷了。

倘使我們把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當作一次大火災，那末，本章所說的一切都不過架柴引火的工作。

此页无页码

第 八 章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後

農村經濟大恐慌——革命黨人的活動——日俄戰爭自由派
及社會革命黨之癡奔——俄羅斯最初的工會——『官
辦的』工人運動
一月二十二日之大流血——大騷動與大壓迫——『公園聯
合會』之成立——日俄停戰
農民大騷動——『農民聯合會』——小農民共和國——農民
運動與無產階級運動之匯合
鐵路工人大罷工——聖彼得堡總罷工——『蘇維埃』之出現

——『立憲民主黨』之成立

政府的十月卅日宣言——『十月黨』的來源——『蘇維埃』的

要求——波蘭大示威——繼續的罷工與騷動

政府的高壓政策——第三次總罷工——莫斯科的襲擊——

自由派與政府之妥協——南俄之騷動——尾聲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主要原因——政府的改良政策——

斯特利賓的建議：家庭建設條例——及其結果

農奴解放令頒布以後，因為人口愈增多，土地愈感不足，加以生產力減小，捐稅苛重等等，在農村中已經引起了經濟的大恐慌。茲據米留可夫在俄羅斯及其危機一書中所列的統計，縷述恐慌的情形如下：

一，土地的分配額減小 「米爾」分配給其所屬農民的土地，假定一八六〇年為百分之百，到了一九〇〇年，其減小的程度，每人所得最多的僅百分之五十一又三，最少的僅及百分之三十五又六。

二，生產力銳減 穀物及菁薯的收穫量，假定一八六〇年為百分之百，到了一九〇〇年，最多的為百分之八十八又二，最少的僅及百分之六十二又三。

三，家畜之減少 假定一八七〇年時農民所有的

家畜爲百分之百，到了一九〇〇年則最多的還有百分之八十三又三，最少的僅有百分之五十又八了。

四，火酒消費量之減小 假定一八六〇年時農民的火酒消費量爲百分之百，到了一九〇〇年則最大的只有百分之六十三又二，最小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七又五了。

五，欠租之加多 一八七一到一八八〇年間，農民欠租的總數當租稅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到了一九〇〇則已加到，最多的爲百分之四百四十四（二十倍，）最少的也達百分之一百七十二（約八倍。）

六，移民之加多 因無以聊生而移住他處的，在一八八六到一八九〇年間，每萬人中有一百七十八人（百分之一又七八，）到了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間，每萬人中移住最多的有三千六百〇一，最少的也有一千二百六十一人：即，最多的比以前加多了二十倍以上，最少的也比以前加多了七倍以上。

七，農業僱工工資之低落 在一八七一年時假定農業僱工工資爲百分之百，到了一九〇〇年則已低落

至百分之六十四又三了。

在這樣大的經濟恐慌中，各派革命黨人都在『到民間去』的口號之下，羣散在愚昧而痛苦的農民中間，因之更幫助了各地農民的騷動。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從歐俄以至高加索與西伯利亞，農村中都充滿了不安的空氣；政府與貴族地主的鎮壓政策亦隨之而更嚴酷，農民的怨憤因是更無可遏抑。然而，真正的大規模的暴動，足以威脅俄皇統治的，却是一九〇五年工農暴動的大革命。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戰爭開始，全國都陷入了軍事狀態，民衆的大多數都是反對此次戰爭的，『愛國精神』也再騙不着民衆了。七月二十八日，最反動的內務總長卜雷弗被社會革命黨人沙卓魯夫刺殺，空氣更緊張了。十月，自由派，社會革命黨和波蘭人在巴黎開了一次聯席會議，決定利用『地方議會』作領導，發動進一步的運動，十一月，各地『地方議會』代表聯席會議開幕了，一致決定要求：個人身體的自由，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不分民族宗教，一切人民均有同等

的公民權；地方政府應由民選，但不能以階級限制選舉權；擴大『地方議會』的選舉權；教育自由；特別是施行農民的與工人的生活之改良。大會又一致主張立時召集一民選的國民會議，不過大多數主張國民會議應有立法權，少數人只主張限於備諮詢的性質。

自由派與社會革命黨的這班人都自以為這些要求是很有把握的，因為新內務總長米爾斯基已應允將這些意見轉達俄皇。可是俄皇的回答是：『地方議會』的議員們去管自己地方的事，不許過問政治問題；改良由俄皇自己作主，不許召集國民會議。這時各種職業的人，得了『地方議會』的幫助，都活躍起來了。他們本來是不許有政治集會的，但可以開會討論關於各本行的問題：於是作家（十二月三日，）律師，大學教授和新聞記者（十二月十八日，）醫生（十二月三十一日）都先後集會，採納了『地方議會』代表大會的意見，一致主張召集有立法權的國民會議及其他。此後數月中，這些自由職業者都各自成立了工會一樣的組織——這便是俄羅斯最初的工會。

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旅順口被日本攻陷，消息傳到了聖彼得堡，政府的威信掃地了。一月十八日，聖彼得堡卜其洛夫工廠大罷工暴發，立時便蔓延到了其他許多之廠。一月十九日，正當舉行宗教祭禮的時候，聖彼得保羅砲台上不知誰向冬宮放了一砲；從這時起，俄皇便不敢在宮中起居了。『地方議會』中的自由派和自由職業者此時更聯合起來，堅決地要求改良工人生活。此地我們應當說明，當卜雷弗專政的時代，曾經命令他的走狗查巴託夫（莫斯科的一個警官）組織一種工人運動，在警察的監護之下，用以欺騙並抵制真正的工人運動；這種『官辦的』工人運動，和我們今天看見的並沒有兩樣。神父加朋是查巴託夫在聖彼得堡最親信的人，他用他的一副『上帝的面孔』確是誘騙了不少人的信任；這時看見了自由派的活動，加朋便也組織了許多工人的代表，決定叩闕請願，要求改良。一月二十二日，聚衆約有七八萬之衆，都捧着聖像和皇帝的御照，唱着讚美上帝和愛國的歌，加朋扶杖作先導，大似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狀，蜂擁般向冬宮進發。可是政府的回

答是什麼呢？連珠似的排槍，怒馬的衝擊踐踏，更加上『戈薩克』的長鞭：數千人的血便這樣流出，寫成了一九〇五年大革命的開幕。

內務總長米爾斯基被認為與民衆接近，因而撤職，代以一舊官僚布里金；同時又任命極反動的特里波夫將軍爲京師警備司令，而實際是全國的警察總監。他的第一步政策是將所有參加一月二十二日大請願的人一律充軍到遠鄉：這政策的結果是替革命作了宣傳，聖彼得堡大屠殺的消息都藉了這班後死的工人帶到全國，於是，莫斯科，里加，里費耳，阿節沙，洛茲，拉東，科弗洛，沙拉託甫，能耳納，莫西雷甫等地方，罷工和罷課，示威和暴動，流行症一般先後沸騰起來，震動了全社會。在波蘭方面更有華沙的大罷工，各礦山的罷工。科爾蘭，里瓦里亞，愛斯多里亞和俄羅斯本部甚至遠東的伊爾庫次克地方都波及了。十三條重要的鐵路都停止了工作。警察官吏被暗殺的無日無之，而暗殺者大部分都是從容逃去的。二月十七日，皇叔塞爾吉司大公又在白日中被狙擊於克里姆宮。因而俄皇變成了困獸一般，

還是企圖最後之一逞。他宣言專制政體決不取消，同時又令內務部相當考慮各方面對於改良的意見。四月三十日，下令允許宗教改爲隨意科；六月，猶太人也得到了少許自由；對於農民的疾苦也着手討論救濟的方法。

在革命黨人一方面，便以爲政府大讓步了，於是紛紛集會，提出進步的政治綱領出來。各自由職業者的團體此時已成立了一『公團聯合會』(Union of Unions)，以米留可夫教授爲主席。『地方議會』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各自集會。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次大會也在這時召集了。五月的海軍大覆沒，證實了戰勝的絕望，要求停戰的呼聲四起；八月，停戰終於被迫實現了。同時政府又下令設立『帝國議會』(Imperial Duma)；但這是滑稽不過的事，因爲政府規定的是：鄉村的學校教師，城鎮的自由職業者和工廠的工人都沒有選舉權，農民更是提也沒有提到。

現在，我們要講到一九〇五年大革命中農民騷動的情形。最初，因爲農民不願遵守所謂『山林條例』並時常侵害地主的牧場等事件，地主與農民間已常有衝突，

不過都只是散漫的。二三月以後，城市的革命潮流捲到了農村，同時社會革命黨人又集中全力宣傳『一切土地歸農民』的口號，於是騷動遂漸擴大，其迅速與普遍，真是如火燎原；布卡捷夫第二次農民革命軍起事以來，到此已一百三十年，俄國政府中從來沒有發生像此次這樣大的騷亂的，『土地的所有權問題須在貴族地主組織的帝國議會中決定，』這一消息更激怒了農民。這時靠了社會革命黨的努力，已經成立了一個『農民聯合會，』並以『土地歸農民』為其政綱。農民的騷動，最初在瓦爾加河下游各省最為活躍，後來，在中部，西部，波蘭，東海地方以及高加索一帶也都蔓延到了。貴族的住宅到處都被燒燬；穀物，家畜，農具，土地都被劫奪：特別是意圖反抗的地主受禍更大。有許多地方，特別在南部和東南部，警察覺到自己無力，便都退避逃去；於是，農民便不得不自己來處理本地的事，因而成立了一種小共和國模樣的政府，不過他們還缺乏明確的政綱，也沒有與俄皇政府分離的意念；直到這年的秋季冬初，他們都還是很活躍的。在波羅的海方面農民的知識程度較高

且有較完善的組織，而當地的地主也是最兇酷的；所以全期農民暴動中以波羅的海方面殺戮最慘，死傷最多。在波蘭；波特連及東海地方的一部份——這些地方的農民運動，一半是農民運動，一半是無產階級運動，所以比旁的地方的運動格外有自覺，格外具有目的的意識的形式。這年夏季，發生了農民暴動的地方有六十二縣，佔全國百分之十四的數目；到了十一月，歐俄的一百六十縣都波及了。

在城市的各種職業組織當中，以鐵路工人為最強有力。十月十七日聖彼得堡總罷工實現後，二十日便已波及莫斯科。同日，鐵路工會大會的全體代表都被捕了，於是各鐵路都立刻罷工下來。最初，這一總罷工並沒有一種有組織的指揮，可是各處罷工工人喊出的口號都是一致地要求召集一個基於普選的憲法會議。各種職業組織此時都已聯合起來，一致行動，在聖彼得堡，一切工作都停頓了。電燈都熄了；報紙也沒有出版；學校都關了門。特里波夫將軍沒了主意，只有命令他的兵卒『不要愛惜你們的槍彈。』十月二十七日，社會民主

黨等所努力的『蘇維埃』在聖彼得堡出現了，於是『蘇維埃』立時成了運動的領導者，公團聯合會也和他一致行動。『蘇維埃』的主席是赫陸司他列夫，副主席是託洛斯基。『蘇維埃』恐嚇沒有停工的工廠，如再不停，必定被焚燬的。米留可夫此時已經脫離了公團聯合會，却去和『地方議會』中的自由派與溫和派的自由職業者拉攏，成立了一個『立憲民主黨』(Cadots)。

俄皇政府這時採用了責任內閣制，以維吉為內閣總理，於十月三十日發佈了一篇宣言，將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地方議會』代表大會對於改良的意見全部採納了；同時修正了『帝國議會』的選舉法，擴大了選舉權的範圍，並規定有立法權。然而，維吉並不能放手辦事。第一，反動的軍人貴族都反對他，認為他太新了，處處和他掣肘。其次，在改良派一方面，從最溫和的自由派起，都不信任他，因為維吉的行事和十月宣言實際是兩樣的；有一部份溫和的自由派便組織了一個『十月三十日同盟』來擁護新宣言，後來的『十月黨』(Octobrist Party)便是從這兒來的。再左一點，他和立憲民主黨或

較左的自由派，和波蘭人接洽，都是一樣的無結果，而尤其難以對付的是『蘇維埃。』十一月一日，『蘇維埃』命令暫停罷工，準備更大的爭鬥，牠宣言要求一民主共和國家的實現。十一月五日，葉沙有大示威，撐起了舊波蘭的白鷹國旗；第二天，波蘭的民主國民黨公開要求自治，並準備召集一個一千二百教區的農民大會；維吉給與的答復是在波蘭全境宣佈戒嚴。十一月八日，克隆司達發生了兵變，被政府鎮壓下去了。

『蘇維埃』相信任何時都可以再行宣佈總罷工的。十一月十四日，『蘇維埃』命令罷工，要求八小時工作制，但結果很小。同時又宣佈為抗議政府壓迫波蘭及克隆司達的變兵而罷工，此次罷工到十九日完結了。十二月九日，政府又發佈了一種限制出版自由的新法令，也引起了大的抗議。維吉沒有辦法，企圖取得農民的贊助，便宣布將次年農民應付的補償金減少一半，以後便完全豁免去。然而，他得的回答仍是反抗的騷動，而且波及全國的騷動：在波羅的海各省；在西伯利亞從前線上回來的駐軍中；在西瓦司多波耳又有海軍兵變；南俄

也是如火如荼地亂着。

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動的軍人貴族便有機可乘了，維吉只有率性拋掉假面具，倒到反動軍人貴族的懷中去。十一月二十八日，農民聯合會的委員會全體被捕。人們老是在那兒疑慮着的一個問題：赫陸司他列夫會拘捕維吉呢，還是維吉拘捕赫陸司他列夫？現在得到回答了：十二月五日，赫陸司他列夫被捕了。一星期後，聖彼得堡宣佈了戒嚴令，特別是防阻鐵路工人的集會。『蘇維埃』請贊助牠的人從儲蓄銀行中取出存款，並拒絕付給一切捐稅；維吉對於登載『蘇維埃』宣言的報紙加了嚴重的處罰。十二月十四日，郵政電報的雜役宣佈罷工；兩天以後，『蘇維埃』的大多數——一百九十人——被捕了。十二月二十日工人方面又宣佈第三次的總同盟罷工，在聖彼得堡沒有成功，在莫斯科倒鬧了一些亂子。十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少數革命黨人引了一羣工人襲擊政府，本來已經得手了，可是因為沒有把尼可拉車站守住，於是西北方面的軍隊開到，用極殘酷的手段將暴動壓服下去了。在南方，如沙拉託夫，洛司託夫，

魯瓦洛西克，埃克特林堡，莎奇和蘇虎木，都是騷亂一片；可是，實際上，革命到了此時，已成強弩之末了。維吉爲莫斯科的暴動所懾，只得向自由派讓步，把『帝國議會』的選舉法修改得更合了自由派的口味，『十月黨』都表示了維持維吉的態度。可是，反動的軍人貴族是沒有讓步的，尤其是對於革命的民衆。派遣到鄉村中鎮壓騷動的軍隊，時常在不願多事麻煩的時候，便放火燒全村，人畜都不許逃出：在這樣血腥鎮壓之下，農民暫時不能不屈服了。爲此次大暴動之尾聲的是波羅的海方面立陶宛人與愛斯多尼亞人反抗他們的德國地主的大暴動：鎮壓的兇手自然不會例外，結果，農民的血灑遍了數十村，與一月二十二日冬宮前的血先後輝映，完結了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的一篇章。

一九〇五年的農民革命運動，比較拉貞和布卡捷夫所領導的顯然帶了更革命的色彩，『一切土地歸農民』的口號在農民羣衆中有了很深切的回應，在行動方面不單是一種軍事行動，而是羣衆的暴動，農民用自己的力量摧毀了他們的敵人，且進而建設了自己的統

治；並且和無產階級的運動也有相當的連絡。不過，從整個的運動看起來，還是缺乏統一指揮，仍帶了很濃厚的原始暴動的色彩；尤其是沒有和無產階級運動建立嚴整的聯合戰線，又沒有得到出身於農村的兵士的援助，大部份兵士都只作了敵人的工具。這便是這次革命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無論在城市鄉村，固然都失敗了。可是政府也知道農民終於是一個國家的生死問題。爲消弭後患起見，政府便不能不相當施行農民生活的改良。原來在革命的趨勢日益緊迫的一九〇三年的三月間，『米爾』負責繳納所屬全體的租稅這一制度便已廢除。同年八月，對於農民所施的肉刑也廢止了。一九〇五年以後，農民的地位在形式上比較提高了一點，高等學校也有農民考入肄業了，各官署中也有了農民出身的官吏，請求旅行護照的手續也比較簡單容易了。

更有趣的是狡黠的斯特利賓所建議的經濟政策。他的目的在於消滅農村的革命運動，他的手段便是打破共產的『米爾』制度。因爲『米爾』雖於政府有利，但牠

自然成了農民社會生活的一種單位。一有事變，他們極易於一致行動。而且，『米爾』打破以後，又可以在農村中造出一種中產的農村階級，他們的利害是與政府及大地主一致的，若以之抵制貧農，便是最適用的武器了。他根據這種見地，便向政府作一種建議，於是那慘澹經營的『家庭建設條例』遂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發佈了。根據這條例，凡是十二年來沒有重行分配土地的『米爾』中，其所屬農民得請求退出『米爾』另建自己之家庭，並得將其現在所耕種之土地作為私有而有自由處置的權利。

當時政府果能另取一部份新土地分給農民，稍取代價或竟免費，使農民有足夠的土地以贍養其新建設的家室，則農民於既得安定的生活之後，必會忘記革命，斯特利賓的奸計便可告成功了。政府自然不會察及此點，斯特利賓的失敗便也成為必然的事實了。雖然政府多方誘導，而根據這條例請求退出『米爾』的家族不過二百四十萬，他們都只是住在新開發的，『米爾』制度並沒有深固基礎的幾省中的。而且，便是這二十四萬

中，實際建設家庭的不過一百四十萬；其餘的不過只是企圖取得土地私有權以便販賣土地，纔退出『米爾』罷了。那些真正建設了家庭的人，因為土地太少了，森林也沒有，牧地也沒有，收穫也不夠贍家，便立刻覺到退出『米爾』對於自己是一件極不利益的事，結果，許多便不得已而出賣他們的牲口，家具，這樣，他們的境遇便更難堪了。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前數年中，許多已退出『米爾』的都有重行加入的趨勢，至若請求退出的便更少見了。一九一五年的調查，建設家庭的獨立經營者，僅及一九〇八年的七分之一而已。

此页无页码

第九章

三月革命後之農民問題

歐洲大戰與俄國農民生活——農民對於三月革命之熱望
立憲民主黨之原形——及其對於農民的政策——農民議員
之反對聲
社會革命黨之原形——及其對於農民的政策——社會革命
黨的收場：下令逮捕「土地委員」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了俄國農業界以空前的
恐慌，這是熟知俄國經濟生活的人都可以顯然知道的。

第一，農民有一千八百萬被徵發充兵役去了，勞動力的供給陡形減少。第二，交通的阻塞，國外輸入停止，舉凡農具以及補修農具的原料都極缺乏。第三，因為軍隊的收買，農民均乘高價將牲口出賣，以致可以耕作的牲口都被運到戰場上去了。此時的農民確比以前有較多的錢，但多是紙幣，不能用以購取穀物；且穀物也日漸缺乏，終至無物可買了。戰爭愈延長，他們的困苦便愈甚。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又記起『只要有了土地，我們便有了一切』的話來了。工業的衰敗，軍事的失利乃至一切國家的不幸，都不能叫他們注意；甚至於戰勝德國也不是他們企求的事，因為他們以為國內地主不倒，土地仍在地主的掌握之中，這樣，便是戰勝了德國，對於農民又有什麼利益呢？所以，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前，農民對於地主的襲擊，遍處都烽起了；保護地主的軍隊調到戰場上去了，騷動的形勢更形險惡，直到三月革命以後。

農民是極歡迎三月革命的，因為他們認定三月革命立刻可以實現他們歷年所懷的『取有』土地的酣夢。

三月革命真能實現他們的酣夢麼？

三月革命後，第一次臨時政府的內閣，立憲民主黨佔了多數；所以名義上雖然是『地方議會』聯合會的主席留渥夫 (Prince Lrov) 任首揆，但在事實上却變成了外交總長米留可夫的內閣，因為他是立憲民主黨的領袖。

立憲民主黨對於農民問題是怎樣解決的呢？

我們已經知道，立憲民主黨是一九〇五年米留可夫教授這一流的人組織的，黨員多數是大學教授，著作家，法學家，『地方議會』職員，實業家，小商人以及有進步思想的貴族。他們一面反對專制政治，一面反對社會主義。三月革命以後，帝制黨也都加入立憲民主黨了。

立憲民主黨在經濟上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代表那反映着資產階級思想的智識份子之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反對中世紀的專制政治，而主張資產階級固有的政治形態——立憲政治和議會政治。他們不屬於民衆，且並不與民衆接近，却極熱心地口口聲聲要擁

護民衆的福利。

他們主張有步驟的穩健的改良，反對一切急遽的變革。他們極尊重法律，他們相信在法律以內可以拯救俄羅斯。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米留可夫曾說，『倘使因企圖戰勝（德國）而必需革命，我甯可不要戰勝。』——因為他認為革命的行動是非法的。三月革命將爆發的時候，外間謠傳米留可夫正到工廠去煽動工人起事，他却正式宣言否認。革命爆發的當時，他看着街上潮水似地湧着的羣衆，還說：『一刻鐘以內，這些人都會成爲血餅的。』倘使他有權力，他必定要強迫他們解散，把革命的思想從他們的心中取去。直到被遣去鎮壓暴動的軍隊也加入了民衆，槍斃了他們的指揮官，革命已成事實的時候，米留可夫等才改變態度，歡迎革命。

然而，當時的帝國會議是唯一民選的政治組織，而立憲民主黨是帝國主義中最有力的黨派，所以，雖然立憲民主黨對於此次革命的態度是如何下流可鄙，而國會選任臨時政府的時候，牠終於佔了多數而成爲新政府的中樞。

我們從上面說的看來，可以想見立憲民主黨對於農民問題的態度會是怎樣的。現在分兩層來說：一是在憲法會議未召集以前暫時的政策，一是在憲法會議中農民問題最後的解決。

在憲法會議未召集以前，立憲民主黨主張：最要緊的是保持農村的和平，禁止一切的侵害行為；地主與農民間關於租稅與工資的事端，都由地方的或國家的土地委員會解決；地主對於土地財產的所有權還是認為神聖不可侵犯；地主還是可以自由販賣或典押他的土地。當時農民大會曾通過了『認為必要時，應禁止地主將土地變賣或抵押』的議案，立憲民主黨極力反對。第一次臨時政府推倒之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捷爾魯夫起為農民總長，發出了禁止變賣並抵押土地的法令；立憲民主黨極不以為然，終於誣捷爾魯夫為德國偵探，把他排出內閣之外去。這便是立憲民主黨對於農民問題所取的暫時的政策。

關於土地最後的解決，立憲民主黨和多數黨以外的政黨相同，主張完全由憲法會議處理。然而他們却假

借種種口實，延不召集憲法會議，因為他們知道，在開會的時候，代表大多數的農民代表，在革命情緒緊張之中，必會通過與立憲民主黨初意相違的議案的。

現在我們且看一看一九一七年四月立憲民主黨所提出的政綱是怎樣的一回事。這政綱雖然認定要沒收皇室領地和寺院領地，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強制買收大地主的私有地，以謀農民所有地的增加；而一方面又主張對於大地主的土地，要累計土地的實際收入以定補償價格；又主張土地的分配須按政府的土地委員會酌量各地狀況而定的給養標準（如酌量副農業的收入以定維持生活所需要的土地面積）辦理。

這個政綱之不能滿農民的素願，可以一望而知。第一，大地主的土地不沒收。果然俄國的土地多，可耕的土地已足供農民的需要，這也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然而實際上並不如此。據調查，歐俄十萬七千大地主共握了五千三百萬俄畝的土地，平均每人佔有四百九十五俄畝；而農民多手無寸土，或至多在十俄畝以下。連年不斷的騷動爭執，只是一個『土地缺乏』的問題，而立憲

民主黨的政綱竟如此。

第二，農民的給養標準須由政府的土地委員會決定，不能由農民自己決定，他方面對於地主却毫無規定：是地主可以自由享有優裕的生活，而農民則只有囿於簡陋或竟貧乏不足的環境之中了。這種情形，革命後的農民能夠忍受麼？

第三，對於收買大地主的土地，要累計土地的實際收入以定補償價格。我們知道所謂『實際收入』與『租價』是大相懸殊的；立憲民主黨不說照租價，這顯然是袒護地主了。有人說，此項補償金並不由農民付與，只由國庫撥給；但是國家的財源主要的是租稅，俄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則這項補償金仍然間接出自農民身上，這和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令完全是一樣的一套騙局。

而且，農民是根本不承認收回地主的土地而須付代價的。『土地應屬於耕作土地的農民，』這種觀念已深入農民心裏，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再把國會討論這個政綱的時候，農民議員反對的言論擇錄於下，也可見農

民的心理一斑。

農民議員里亞卡依路說：『有人告訴我們去買那些本來屬於人民的土地。買嗎？我們是新從英國，法國或其他國來的外國人嗎？那麼，我們爲什麼要買我們自己的土地呢？我們已經用了我們的勞力，我們的血汗和我們的金錢——十倍於原價的價格去買到這些土地的呀！』

議員塞姆約魯夫說：『我們等候了兩百年，希望財產從天上落下來，可是毫無結果。土地都在大地主的掌握之中，他們都是從我們的祖先的犧牲之中剝削去的。土地並不是他們的，是上帝的。我十分知道，土地是應屬於耕作的人民——在土地上流汗的人民。布里希克維奇君（一個極反動的議員）說，「救救呀！革命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是的，倘使原來是他們的而現在被奪，他們便會起來革命而非我們起來了。我們必須繼續爲我們的權利而奮鬥；……現在是我們開始真正生活的時候了。……我們的農民教我到這裏來，是要把皇室的，寺院的以及大地主的土地都取回，交與那些耕作土

地的人民，是要取得我們應有的土地與自由以及公民的權利。……』

議員摩洛卓夫說：『我們必須把寺院與大地主的土地都取回。寺院的牧師們對着我們宣講神聖的福音，常爲我們唸着：「去要求，他（指上帝）必定會給你的；去敲門，他必定會迎接你的。」我們已經要求過，要求了無數次，可是他們沒有給我們；我們已經敲門敲了無數次，可是他們沒有迎接我們。這樣，未必竟要我們自己踢破門，用武力去拿麼？……』

吉也夫省的議員沙克魯夫說：『爲什麼大地主能夠有那些土地，而農民却只有一個牧師口中的天國呢？農民們教我到這裏來，是要我保障他們的利益，要求所有寺院，皇室以及大地主的土地都無代價地沒收。諸君，議員諸君，請想想，一個饑餓的人，看見了政府不顧他的疾苦，却只爲地主謀利益，他能夠安靜地坐着不動嗎？即令要求取得土地是犯法，他也還是不得不要求；饑餓困苦強迫他要求的。一個饑餓的人是任何事都不懼怕的，因爲饑餓與困窮強迫他無暇顧及一切了。』

米留可夫因民衆的不信任，不得已而辭職，繼起的便是克倫斯基內閣，於是政府的中心便由立憲民主黨移於社會革命黨了。這種政治勢力的推移，可以說是已經由三月革命（即資產階級純粹的政治革命）更進了一階段；而這種變動的原動力實是農民。

社會革命黨是恐怖主義的革命組織『民意派』的後身，這是前面已經講過的。立憲民主黨反映的是英國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而社會革命黨却帶着純粹的俄羅斯的色彩。他們繼承『民粹派』的思想，把『米爾』這種村落共產制度當作是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制度，主張俄羅斯可以不經過如西歐資本主義發達的悲慘的路徑，即可以在『米爾』制度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所以他們完全否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階級爭鬥說。

社會革命黨最注重的是農民；他們却也不忽視工人。在他們的政綱上，也有企圖改進工人生活的條款；他們也如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以工業的國有與社會化爲他們奮鬥的最後目標。可是他們主要的力量還是注

在農民身上。他們把『米爾』制度當作拯救俄羅斯的聖藥。他們與農民十分接近；從第一次帝國議會選舉以來，農民大體是贊助他們的。所以一般人都以為社會革命黨是『農民黨。』但是社會革命黨實際所代表的，却不是農村中無產階級的份子而是較為富裕的農民，智識份子的黨員也居多數。

社會革命黨對於土地問題的最後解決，也是主張付與憲法大會。至於他們對於土地的根本主張，照他們在一九〇八年的政綱和一九一七年的政綱上所反覆聲明的說起來，就是，『主張土地的社會化，即是把一切土地從私有移作公有，由民主的形式組織的自治團體管理着，以期公平的利用。』說具體些，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策分為下列八項：

- 一、一切土地的社會化；
- 二、由中央及地方自治政府管理土地；
- 三、以消費為標準來分配土地使用權；
- 四、用一種特別稅的形式徵收租稅，專供社會的使用；

- 五、使用土地不便於屬諸地方的，如大森林及漁獵場之類，移歸中央自治政府管理；
- 六、地下的利源爲國家的物產；
- 七、一切土地無代價的收歸公有；
- 八、對於因沒收土地而失却生活方法的人，在相當時期內得給以必要的生活的資助。

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策，在社會民主黨看來，只是空想，他們（社會革命黨）的根本觀念，還是承着往昔『民粹派』的傳統思想來的。他們關於土地制度的改造，關於實行推翻資產階級財產權的根基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都是依然根據俄國農民生活之傳統的形態而努力的。他們抹殺農村中的階級爭鬥，要使那依『米爾』制度所組織的農民直接進到新社會的天國去。篤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是承認農村中的階級爭鬥的事實的，他們主張把農村中的無產階級份子作爲農村革命的真要素。所以對於社會革命黨這種復古的反動思想，他們始終下猛烈的攻擊。

然而一班爲小農的心理所支配的農民，却在社會

革命黨的主張中發現了自己的希望，他們並不懂社會革命黨所主張的『土地社會化』的意義，他們沒有想到所謂『土地社會化』是連他們自己所有的土地都要社會化，是想澈底地廢止農村中的工錢制度的，他們只以為一旦『土地社會化』了，便可以實現他們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而分給耕作者的素願。所以他們都狂熱地歡迎，擁護社會革命黨的執政。

社會革命黨既佔得了臨時政府的樞要地位，便開始實行他的政綱了。農民總長捷爾魯夫一面在中央和各地設立土地委員會，處理關於地主與農民間，或農民與農民間，關於租價，工資等項的爭議，藉以維持農村中的和平。又幫着農民圖謀種子，農具，牲口等項供給的充實，實行政府和中央土地委員會所發佈的關於土地的一切佈告。同時又公佈禁止買賣土地的法令。

我們從前數節所述，已知道農民日夜企求的是什麼。但，便是所謂『農民黨』的社會革命黨執政以後，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素願，還只是施行一些皮毛上的政策。農民之失望，我們可以想見。因農民的失望，臨時政

府，亦即是社會革命黨，在農民中的信仰，已經開始動搖了。

臨時政府地位的危殆，社會革命黨諸領袖何嘗不知道；可是我們知道，克倫斯基內閣中社會革命黨雖佔優勢，而根本上却是聯立內閣，閣員中有幾名是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也有社會民主黨。克倫斯基內閣組成的意義，就是說明：聯盟國繼續作戰的要求與民衆對於和平的熱望相聯合；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所代表的）與無產階級相聯合；大地主的利害（十月黨所代表的）與農民的利害相聯合的。然而實際上所起的影響却不是聯合，而是階級間生死的鬥爭。就是有利於工人和農民的最溫和的政策，也要受那資本家和大地主的猛烈打擊與妨害。各處的土地委員，因為大地主的反動，或被監禁，或遭慘殺。遭逢了階級鬥爭的事實的農民，早已不能遵從社會革命黨的政綱行事了——其實社會革命黨自己何曾真正實施了他的政綱的！於是，農民開始依自己的直接行動去取得他們的目的物了。到了克倫斯基內閣的末期，俄國農村中，農民與地主間的直接鬥爭

遍處皆是：農民燒燬貴族的住宅，破壞他們的倉庫，掠奪他們的穀物與家畜，地方的土地委員會也自由地沒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分配於農民了。於是，捷爾魯夫反下命令逮捕政府自己所創設的土地委員會的委員，完全陷入了一種滑稽的矛盾，社會革命黨的生命也從此斷送了。

此页无页码

第 十 章

農民問題之解決——多數黨與農民

多數黨之農民問題觀——機會主義者之農民問題觀

列寧論工人與農民之關係——一九〇三年社會民主黨的農

民政策——列寧對於一九〇五年工農革命之指示——

一九〇六年多數黨與少數黨關於農民問題之爭論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的「進一步」革命之主張——多數黨取

得羣衆的策略——農民羣衆歸於多數黨旗幟之下

多數黨執政後之「新土地法」

柯祖基對於多數黨之批評——批評之解釋：社會革命時期

問題——農村中階級分化之真相——土地分配政策之必要——土地社會化之實施：蘇維埃農場，農業公社，協作社

蘇維埃政府的行政原則：宣傳和教育，不用強制力——對於中農的政策——『新經濟政策』之採用與協作社之提倡——『剪刀問題』及其解決——再讓步——工農聯合之鞏固

社會革命黨是專於代表農民的要求和熱望的，而社會民主黨代表的却是都會勞動者；社會革命黨被稱為『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可稱為『工人黨。』——然而這種稱謂是並不正確的。

社會民主黨多數派，(以後稱『多數黨』)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固守着馬克思的學說，努力於工人運動，這是事實；可是他決沒有忽視農民，反之，對於農民運動，他們和對於工人運動實在用了一樣的努力。只是，農民問題，在多數黨看來，不是獨立的，是與工人問題不可分離的，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他們以為不接觸於資本主義的全體，而單靠『土地社會化』以謀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實現，這實在

是可笑的空想。

本來，在二十世紀初年，確是有許多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掛着社會民主黨的招牌的人，都非常藐視農民問題；他們以爲工人的利益和目的總是和農民的相衝突的，所以農民實是將來無產階級革命進行中的障礙；便是在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十年多的今天，俄羅斯共產黨內的反對派託洛斯基等還是認定農民是資產階級的一部份，其發展的方向只有資本主義的方向。即令有些注意這個問題的，在當時都只是想利用農民，以期選舉的勝利；而今天，託洛斯基派還是認定：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必須了解只是極短一時期，在這期間，無產階級便須將農民的一切盡所有地都剝削出來。——我們應該認清，這都是機會主義者的主張。

俄羅斯的多數黨，在一九一七年所以能夠集合那樣偉大的力量，得到最後的勝利，牠的政權又一天鞏固一天，其原因不但在於牠的奮鬥目標很對，牠能深入工人羣衆，而且在於牠同時又能夠注意到農民心理和利益，與農民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早在一九〇一年的時

候，列寧便已特別注意到工農聯合問題；他在該年八月的火星報上發表了一篇工人的政黨和農民。這篇文章開始是描寫俄國的農民在一八六一年以後的痛苦生活狀況，接着就提出這些問題：農民的出路在那裏？用什麼方法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接着他便很明瞭的對農民說：『農民要想從壓迫底下解放出來，只有傾向於工人運動，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沒收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工廠，礦山，鐵道等，歸於公有而奮鬥。』他又說過『俄國將來的革命，工人是居首領指導者的地位，是最前列的軍隊；若沒有多數農民的幫助，他們還是不能達到目的。』

一九〇三年七月，社會民主黨在倫敦舉行第二次大會時，列寧提出了一個對於農民的政綱，這政綱極其溫和，主要的要求只在把一八六一年以後被剝削的土地交給農民，取消補償金以及廢止間接稅等數項。列寧之所以如此主張，據他自己說，只在開放資本主義在俄國農村中發達的路徑，助進階級鬥爭在俄國農村中自由的長長罷了；因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認定，農村中

也和都會工業一樣，農民之隨資本集中而化為無產階級，乃是歷史上必然的歸趨，其結果必生出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只有靠這種階級鬥爭纔能實現的。

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爆發，列寧便已看出了這一次運動的趨勢和領導者的責任。在三月的前進報上，他作了一篇無產階級和農民，開始便說：『農民的革命運動已經開始了，各省俱聽到農民焚燬地主的房屋和沒收地主的穀物及家畜的消息。俄皇的軍隊在滿洲被日本打敗以後，就只想對於無槍的國民復仇，派遣軍隊來攻擊他們的國內的敵人——城市的工人和鄉村的貧農。城市的工人運動已經在革命的農民中得到了新的同盟者。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運動實有直接的實際意義，牠在發展黨的組織和進行宣傳煽動工作的任何時，俱須注意到這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條路：和貧農聯合起來共同去反對農奴制度和地主，和城市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去反對富農和其他的資產階級——這就是鄉村無產階級的軌道。』他又接着說：『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是有

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牠是竭力要將全體的勞動者從一切剝削底下解放出來，幫助一切的革命運動以反對現時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組織，所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是積極地維持現時的農民革命運動，用有力量的革命方法以改良農民的生活，且不以奪取地主的土地為終止的目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牠就須堅決地去組織鄉村無產階級的獨立團體，並且時常對鄉村的無產階級說明他們和富農之間的利益的矛盾性，他們祇有和城市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去奮鬥反對一切的資產階級，才能得到真正將鄉村的貧農羣衆從貧困和剝削中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

然而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終於慘痛地失敗了，其重要的原因之一當然是運動未能使工農有密切的聯合，而且工農本身的組織也都非常散漫，沒有作到如列寧所指示的。

一九〇六年四月，多數黨與少數黨因一九〇五年之慘敗，乃開聯席會議（第三次大會）於瑞典的首都司

多爾康。在這次大會中，對於土地問題的政綱，多數黨與少數黨頗有爭議。列寧所領袖的多數黨主張在原則上一切土地都歸國有，連小農所有地都包括在內，馬司洛夫所領袖的少數黨主張小農所有應該除外。多數黨主張沒收的土地歸國家管理，少數黨主張交給地方自治團體。馬司洛夫以為，土地而歸國有，中央政府的實權不免過大，反之，土地保留於地方自治團體之手，就可以使革命得到強有力的保障；而列寧却以為，國有土地，於助長農村中的階級爭鬥更為有效。關於這一點，兩者的目的都在於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與農村的無產階級化，只是手段不同罷了。至關於實行的方法，馬司洛夫主張當用合法的手段，藉適當的國家機關來沒收土地，而列寧則主張當用革命的手段，農民應直接地奪取土地——列寧主張組織農民委員會，即時打破大地主的權力和特權，在憲法會議召集以前，已經奪取的土地當由這委員會管理。但是這次大會上少數黨佔了多數（因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武裝暴動失敗以後，多數黨的執行委員會和受多數黨所指揮的工人組織多被解散，所

以這次有表決權的到會代表，少數黨佔六十二人，多數黨佔四十二人，)所以列寧的意見沒有被大會採納。然而在實際上各地的革命運動都還是受多數黨的指揮。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暴發的當時，一般社會主義者的領袖都只以為這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罷了。四月四日晚上，列寧從瑞士逃回俄京，便主張立刻促進這個革命到社會革命。四月五日，在多數黨的大會上演說，題目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責任』；他說，『我們應該從第一步（政權在資產階級手內）走到第二步（無產階級和貧農奪取政權）：沒收地主的土地並沒收一切的土地交給貧農和農民代表的蘇維埃管理，且利用各大田莊建設公共的大經濟（即大規模的經營。）』他的意思以為如此，則一方面農民有了組織，就可以免去內部的紛亂；他方面就可以消滅地主的經濟勢力，免得他們有所憑依。此時便是多數黨的領袖，如戈爾登保和斯特克洛夫，也都譏笑列寧為幻想，但列寧自己仍堅信不疑。

俄國民衆，尤其是農民，本來不懂列寧的社會革命

的理論，而且他們並不知社會革命的意義。列寧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重建俄羅斯與世界的這種策略，他們看來毫無趣味；便是『多數黨』這個名詞，在革命的當初，他們也都很少知道是什麼：可是列寧的理論和多數黨的政綱却很仔細地代表民衆表白了他們的熱望。試舉一例，當時曾有一個農民出身的兵士，向一羣對他咀咒列寧的人說：『呵，那些人說列寧是德探等；我不很知道，在我看來，似乎他所說的便是我所願聽的，所有頭腦簡單的人都像我一樣地這樣感到。』多數黨是極會把捉民衆的：兵士希望和平，牠便給與兵士以和平；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依然把工人放在資本家的支配之下，多數黨却主張工人用革命的行動獲得完全管理產業的權利；農民多年的酣夢是在獲得土地，多數黨便鼓勵他們直接去奪取。列寧在俄羅斯各政黨一書中代表多數黨回答『農民可以立時奪取地主的一切土地嗎？』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一切土地必須立時沒收。』五月二十二日，列寧又在彼得格勒王宮內舉行的全俄農民代表（實在其中以地主富農及商人佔多數）大會

上，用很簡單很明瞭的口號來表明多數黨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於是一班素來被惑於少數黨的謠言的農民始大大覺悟起來，羣聚於多數黨的旗幟之下而受其指揮，各地農民的暴動，驅逐地主，佔領土地等，日益活躍。而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已如前面所述，還在那兒一方面繼續製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而他方面則派兵士鎮壓農民。

十一月七日，多數黨握了政權以後，便即於次日公佈了『土地佈告』宣佈土地私有權之廢止並沒收分配等辦法；十一月十八日又發佈了一篇『告農民書』，解釋工農政權之意義與農民之責任；次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土地法』便公佈了——這完全是以『土地佈告』為依據而製定的。

『新土地法』的大要是：永遠廢止土地私有權，無代價地沒收皇室，貴族，寺院及大地主等的一切土地與財產，暫時由各地農民所選出的土地委員會代為管理。至於屬於『哥薩克』兵士及農民的土地，却不在沒收的範圍以內；對於農民自己利用舊日所有地一事也沒有涉

及，即是，在原則上，一切土地雖為社會全體所有，而農民依舊有使用他的土地的權利，所以事實上對於小農的土地所有權還是沒有什麼影響。又，依據前『土地佈告』沒收的一切土地都收歸國有，作為國家保留地。由這種保留基本地之中，提出一部份給農民，一部份由國家管理經營。分給農民的方法是，看農民的家族用自己的勞力能耕多少，就按數分配——不許僱用人力，一定要完全用自己家族的人力來耕作；至於分給的面積，是以地方的狀況及土壤的性質為標準的。有些地方人多地少，則由農業人民委員設法把過剩的一部份農民移到土地豐富的地方，以謀調濟。

照上面說來，既把土地分給農民，那麼土地不是就歸農民所有了嗎？他的所有權不是像以前貴族及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一樣的嗎？固然，在原則上並沒有承認給與土地的所有權，而實際與土地私有制度並沒有兩樣。多數黨的理論是主張土地社會化的，而牠的實施却歸結到私有制度；所以柯祖基攻擊多數黨的土地分配政策說，多數黨因為要賺得農民的援助，竟不惜拋棄純

粹的馬克思主義而與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妥協。柯祖基對於多數黨利用這樣的方法企圖社會革命的實現也下了猛烈的攻擊，他說：『俄國的革命，本來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而多數黨却用人工使這革命變為社會革命，這種企圖是畢竟要歸於失敗的。社會革命必須要等待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與農民的無產階級化之後方能成功的。』

對於柯祖基的話，多數黨有以下兩層的解釋。

第一，先說社會革命時期的問題。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只就農民一方面來說，在最初的一時期中，確是農民全體對於專制政治，大地主與黑暗的中世主義（Mediaevalism）的運動，在這範圍內，農民運動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運動。但是後來，因為農村中階級的分化，這個運動就貧農和平無產階級說來，就變成對於資本主義的運動了；在這範圍內，這個運動就變成社會革命的運動了。這兩個階級要看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怎樣，才能由第一階段進到第二階段的；這兩者之間不能由人造的牆壁截然區劃的。

我們且看，在當時的俄國農村中，從這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是怎樣推移的。當初，大地主還沒有撲滅，土地沒有完全沒收的時候，農村中農民階級內的區別還是在潛伏的狀態中，多數黨乘這個時機，掃除了一切躊躇逡巡的態度，聯合着全體農民把十月革命以前還存在的舊制度和大地主都完全破壞，這樣便完成了農村中資產階級的革命。

本來，在當初全體農民都結合起來反對他們共同的敵人的時候，列甯便說過：『在現在土地尚未奪回，敵人尚未推倒的時候，所以能有這種現象。到了他們得到了勝利，內部利益的衝突就會表現出來，那時這種關係便不能維持下去了。所以，貧農及鄉村無產階級應立即起來組織獨立的團體，以保護本階級的利益。』果然，到了一九一八年夏，農村中階級的分化漸漸成熟了。投機的富農和放債人把較好的土地都佔領去了；農民蘇維埃最初是代表全體農民的，結果因為一般農民思想落後，蘇維埃的領導地位又被中產農民和智識份子佔領了去。那班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徬徨於資產階級專政和

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並沒有何等堅決的政策，實際多半在富農的影響之下；因此，農村中的貧農和無產階級的份子漸漸離開他們的指導了。同時，捷克白黨又佔據了糧食的中心產地，投機的富農把糧食囤積起來，故意提高價格，於是糧食大起恐慌。這時農村中的貧農和無產階級覺悟了他們自己和農村中的那班資產階級（富農等）之間，其利害是完全相反的；他們從實際生活中學會了階級對立的事實，覺悟了自己有實行獨立政治生活的必要。順應這種趨勢，列甯於是即建議於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用法律來規定在農村中組織貧農委員會，將農村的政權實際奪到貧農和無地的農民手中：這樣，貧農便離開了農村中資產階級的羈絆，和都市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對抗剝削者和資產階級，於是俄國革命運動便明確地達到社會革命的途徑了。另一方面，政府又決定採用『軍事共產制，』將農民的餘糧（自己食用以外的）一律收沒入官，這是爲了供給紅軍和城市居民，同時也是打擊投機的富農的。

第二，與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心理妥協的問題。俄國

農民知識的幼稚，眼界的狹小以及思想的遲鈍，已是我們所習知的；加以歷年對於取得土地所有權的熱望，『給我們土地呵！』這個口號已經深入了農民的心底。多數黨執政以後，設使還如前兩次臨時政府一樣，不滿足他們的欲望，他們便立刻會鬧起亂子來。關於分配土地給私人這一問題，列甯曾經說過：『法律不是我們的呀！我們並不贊同這種方式；可是我們還得通過牠，因為這是農民羣衆的要求，任何勞苦民衆的要求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左右的。』

蘇維埃政府雖然採用了土地分配政策，而對於『土地社會化』的理想仍在積極地企圖實現。只是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強制的：他們一方面用宣傳教育的方法來誘導農民，另一方面則作出實例給農民看。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政府即利用沒收得來的土地設立『蘇維埃農場』及『農業公社』等，作為農業的大規模經營的實例；同年八月，農業人民委員乃發佈農業公社的組織法；十一月二日政府又決定積聚一千萬盧布作為基金，準備借給農業公社或其他集合經營的農民團體作為發展事

業之用。結果，同年末，除掉蘇維埃農場（當時的面積有三百餘萬俄畝）之外，成立了五百個農業公社，此外又有許多村實行了集合耕作的協作社組織。

但是一切的努力都只是向着農業社會化方面前進的預備工夫，其間沒有統一，而且作業時也欠精密的計劃。於是政府便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召集地方蘇維埃農業局，貧農委員會委員及農業公社社員，舉行了一個全俄大會；由這大會的結果才起草了關於土地社會化的基本法律。人民委員會根據這草案，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公布了一個『關於推移到社會主義的土地組織及社會主義的農業諸手段之佈告』的最重大而且最廣泛的法律，蘇維埃共和國對於土地社會化的根本政策於是確立了。（此項土地法詳見李達譯勞農俄國研究頁二五〇——二六八。）

蘇維埃政府企求農業社會化的方法，完全是宣傳和實例教育，決不用任何強制力，且不惜百般委曲求全，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列寧的農業政策和他的一般的政治原則是一樣的。他對於積極的反革命行動，完

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取極嚴酷的手段；而對於民衆，則不信強制力而信說服力。在列甯指導之下的蘇維埃政府行政的原則，不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是盡力使民衆多知道一些。他們相信自己的主張和政綱是很正確的；設若民衆不容認，這必是民衆還沒有懂得，若是民衆懂得了，必然是相信他的。關於農業政策也是這樣，他們相信集合的，社會主義的農業，比個人的小規模的農業，在任何方面都是好些的；因此，他們相信，由事實上的實例來表明這個好處，是達到農業社會化的最有效的手段。這種態度，愈到後來愈見明顯，直到專政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且來簡略地說一下。

貧農委員會設立以後，收效極大，常有被富農攫去的土地，仍由貧農或無土地的農民取回集合經營，成立公社或協作社的組織。富農因而隨著地主也倒台了。於是貧農委員會乃轉向中農挑釁，因為這時只有中農手中握有的私有地比較多點。此時列甯非常注意這件事，便立刻提議解散了貧農委員會：因為貧農委員會之組織乃在於喚起貧農的階級意識，使他們起來和農村的無

產階級及都市的無產階級結合起來，共同抗禦資產階級及富農，這一目的，現在已經達到了；而另一方面，貧農委員會之繼續存在會引到錯誤的打倒中農階級的爭鬥上去。自然，中農階級是最討厭的一個東西，列甯曾說這個階級『在大農和小農之間動搖着，一方面也是有產者，一方面也是勞動者。這個階級並不榨取勞動階級。他們爲要維持自己的地位，數十年來不知嘗了多少艱苦，親身經驗着地主和資本家的榨取，一竟地忍受了下來；雖是這樣，而他還是有產階級。』然而，在俄羅斯，中農的數量極大，他們底向背實足以左右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所以列甯對於中農所採取的完全是妥協的，非強制主義的政策。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採納了列甯關於對付中農問題的提議，裏面說：『在經濟落後的俄國，鄉村中的中農有較深固的經濟基礎，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和他們有長時期的合作。……中農不屬於剝削者，因爲他們不是從他人的勞動得到利益。社會主義的國家必不可失去了這個小生產階級。……蘇維埃政府不應對他們有什麼強迫的舉動；否則祇

有增加他們反新穎的心理，致得不好的結果。……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農民的幫助應該竭力推廣開去，最主要的即須以城市的工業品供給中農，且宜偏重於改良農村經濟的工具，種子及提高鄉村的文化，改良農民的生活條件。……地方蘇維埃應找出可能的方法給貧農和中農以實在的助力。』列甯又說過：『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和對於中農階級的態度之差異是，對於資產階級，宣告完全的沒收，而對於中農——只要他們不是榨取者——承認和他們提攜，結合。……對於中農施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就沒有半點好處，只會引起莫大的危害罷了。……此地所需要的是繼續的教育事業。』

列甯的這種非強制的態度，曾為多數人所非難，而他自己仍堅信不移。俄羅斯經過了歐洲大戰的劇創，又加四年的內戰，國家的經濟真是破敗不堪：工業約六分之五以上都被破壞了，剩餘的也都充了軍事工業之用；交通機關大部份都停頓了；農村經濟更是完全破產。同時，農民因為自己所收穫的糧食，除自己所需要的以外，俱須交給國家（軍事共產制，）而國家又因工業的大

破壞，已無能力將工業品供給農民以交換其農業品，農民於是怠工起來，只是生產足夠自己消費的東西。一九二〇年的大饑荒便出現了！當時燼餘的白黨又乘機煽惑，農民暴動的消息於是時有所聞。這種種困難對於蘇維埃政府實在是一種大威脅，因為工農的聯合與生產力之提高是革命勝利的唯一保障，在這種威脅之下，那唯一的保障將被打破了。怎樣辦呢？列甯很堅決地仍用非強制的妥協態度，於一九二一年三月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中提議廢止了軍事共產制的食糧征收法而採用食糧納稅法：即是，農民所收穫的食糧，除了繳納某定額的租稅以外，剩餘的他們可以自由處置。所謂『新經濟政策』的便是這個。這樣，農民便都願意盡力加多生產，都市工人的食糧因而也得到保障，工農的聯合依舊鞏固了。另一方面，列甯又竭力提倡農村協作社的組織，因為蘇維埃農場和農業公社的發展，都有其客觀的限制（物質的供給及農民的心理等等），不能有預期的速度；只有協作社組織甚其簡易，效果也頗明顯。列甯曾說：『快去組織農村經濟協作社，因為牠是對於農民渡到社

會主義裏去的許多橋樑之一。』又說：『倘若協作社（消費的，農業經濟的及工業的）現在已經普及於全體農民，那麼，我們兩隻腳已俱踏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了。協作社對於農村的重要點還是在於提高農民的科學程度；若農民的科學程度不能提高，那便無論什麼社會主義都是不能和他們見面的。』

後來（一九二四年），因為工業的恢復與發展不及農業的迅速，工業品的價格不能和農業品的一樣低廉，於是，所謂『剪刀問題』又發生了。當時又有不少人利用農村間的不安狀態，造作種種蜚語，中傷蘇維埃政府，俄羅斯共產黨仍舊遵照列甯的政策，提出『面向農民！』的口號，同時用政府的力量儘可能地減低工業品的價格並提高農業品的，使城市和農村接近，使工廠和田野有實際的連絡，也就是使工農的關係更加親密起來。

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二次共產黨大會，依列甯的提議，將租稅劃一了以後，每年的稅額均逐漸減低，一九二五年春第十四次大會議決減去總稅額三分之一，即由四萬七千萬盧布減至三萬萬。又，爲了提高農業生

產力起見，對於從前不許租地，不許僱用工人等限制，都相當地解除了。這自然是給敵人造謠的口實，什麼『恢復了資本主義』，什麼『無產階級的政權變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政權』，都隨着起來了。可是，俄羅斯共產黨老是固守着列甯的遺訓：『我們若沒有農民，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共產主義；』和『要是我們把一種正當的政策施行下去，他們（中農）的躊躇和動搖自然會停止下來；中農，結局總是要同我們來結合的。』並且列甯的遺訓也逐漸變成事實了，明顯的證據是巍然崛起於帝國主義圍攻中的十年的工農蘇維埃政權。

第十一章

蘇聯農業之現狀

耕地之恢復——農業生產之加多——農業技術之進步——

農產品之貿易狀況

資本主義的發展抑社會主義的？——產業的『社會化』成份

之抬頭——協作社之發展

國家的健壯必須有強大的生產力作牠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的國家必須建築在『社會化』的經濟基礎上面——這是極明顯的道理。蘇維埃俄羅斯掛的是社會主義的招牌，並且在全世界——自然是資產階級的

世界——的咒罵與襲擊之中撐持了十多年，這似乎是她真的已經成爲一個健壯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了；然而，傳到人們耳中的，又有許多話，最初一般的是俄羅斯生產力銳減，經濟基礎全部崩壞了；到了近來，又有了另一種聲調，『蘇維埃俄羅斯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完全向資本主義發展了』。

只有事實來回答人們的疑問。

我們且看，蘇維埃俄羅斯的生產力是否真的銳減了。我們在此地只就農業方面的來說，因爲農業是蘇俄的主要經濟原素，而我們又是講的農民問題。（其實，若就工業以及交通事業等全部來講，可以得到與農業方面同樣而更有力的結論。）

先說耕地，在一九一六年的調查，耕地有兩萬萬三千五百萬英畝；經過了戰爭與革命的破壞，到了一九二一年，減少到了一萬萬五千萬；可是到了一九二五年，便又增多到二萬萬二千萬了，比一九一六年時只少了一千五百萬萬畝，即已達到一九一六年的百分之九三·六了。

說到農業的生產狀況，我們只須看看下表，便可以看出農業生產品之加多是有何等驚人的進步：

年 度	農業總生產額 (百萬盧布)	百份數
一九一三	一二·八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一——二二	六·二〇〇	四八·四
一九二二——二三	八·六〇〇	六七·二
一九二三——二四	八·九〇〇	六九·五
一九二四——二五	九·五〇〇	七四·二
一九二五——二六	一一·三〇〇	八八·三
一九二六——二七	一一·七〇〇	九一·四

說到農業技術的進步方面：一九二三年以後的四年中，犁的產額已增三倍，轆轤則六倍；一九二六年，流白來斯基公司重行改組，每年所造的收割機器已達一萬三千餘架；然而每年仍須從國外輸入農耕機器值二千餘萬盧布。十年以前俄國農村還不知道有脫拉克脫車 (Tractor) 可以耕，可以耙又可以作其他農村工作的機器)，一九二六年末，却已有二萬五千架了，現在還續增無已。蘇維埃政府為發展農業起見，現在發行大批內

國公債；在一九二六年內投入農業國債內的總數有四萬萬盧布。至若『農村電氣化』——被認為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之唯一重要手段的電氣化，更有驚人的進步。一九一九年，俄羅斯共產黨全國大會決議，自一九二〇至三〇年間，須建設有一百五十萬基羅瓦特的發電所三十處，即歐俄二十七處，土耳其斯坦一處，西伯利亞二處。據一九二四年的調查，有五處業已完成，七處正在建設中；一九二六年的調查，則已超過預定的計劃。

關於農產品的貿易狀況：一九二三年以後四年內，農產品（農耕機器除外）在進口貨物當中，已由百分之一一·九八減至百分之二·六三，其總價值已減少四十倍。在出口貨物中，農產品則已由百分之五一·五一增加到百分之五七·九五。這證明農業生產力加大，農產品加多，所以農產品在對外商業中地位也漸漸抬高了。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份，全國市場所存穀類農產為二三·三六〇百萬『蒲特』較上年份多一〇·八一六百萬。一九二七年份農產的總值照戰前價格計算為一一·

一二四·四〇〇·〇〇〇盧布較一九二六年份多二·〇九三·一〇〇·〇〇〇盧布。

不必更多寫了，從上面簡單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蘇維埃俄羅斯的農業生產力是有如何驚人的『銳進』而不是『銳減』了。但是，有人說，這只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美國英國一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罷了。其實，這還是沒有看清楚事實的人說的話。

第一，我們應該看清，在蘇維埃俄羅斯的生產當中，私有的和社會化的（國有的和合作社所有的）成份，究竟那一方面佔優勢：若是私有的佔優勢，那便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反之，我們便不能否認牠是社會主義的了。

在農業方面，我們就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蘇聯中央設計委員會公佈的農業總資本額來看，其成份如下：

國有的	五八〇百萬盧布
合作社有的	七〇百萬盧布
私有的	六四·六二〇百萬盧布

從這數目看來，似乎毫無疑義地是『私有的』佔

優勢；然而我們若一考察每年消長的形勢，便可以看出，『私有的』實際是逐年失勢，『社會化』的成份却每年更抬頭了。下面是蘇聯產業之國有的，協作社有的及私有的成份之逐年消長的百分比比較表，是就農業工業生產產品的總量計算的：

年 度	國有的	協作社 有的	私有的
一九二三——二四	四四·四	四·三	五一·三
一九二四——二五	四八·四	四·五	四七·一
一九二五——二六	五一·〇	五·二	四三·八
一九二六——二七	五二·三	五·二	四二·五

只在四年中，國有的和私有的便全然立在了相反的地位，若把國有的與協作社有的合計起來，則社會化的成份顯然佔了更大的優勢。自然，在農業方面，社會化的成份沒有像在工業方面加得那樣快，可是只要看看協作社的發展也自可驚人。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協作社的有三百五十萬戶，到了一九二七年便加到七百七十萬戶了。這數目幾乎佔了蘇聯全人口的三分之一。

第二，我們應該看清，在蘇聯，交通機關及一切大

的工業生產機關都是在國家手裏，大工業百分之九十九在國家手裏，而這個『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是全然不同的：後者只是少數資本家的，蘇維埃的國家却是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廠的。

此页无页码

第十二章

蘇維埃農村生活

農民目前的需要：整理土地——移民——團體的活動
土地法——森林法——租稅——地方政府——互助委員會
——國家保險——協作社——文化生活：學校，讀書
棚，驅盲所，圖書館，白日保嬰院，非職業的戲劇運動，
無線電話，新聞紙與讀報——工農聯合運動

大戰與革命所損耗的自然極大，然而由此而獲得的利益，在農民一方面看來，亦可謂不小。第一件事：俄羅斯農民的將來的命運，現在已經掌握在他們自己的

手中了。他比世界上所有的農夫都幸福，他已經獲得土地永遠的使用權與收益權；他已經是直接管理自己的地方政府，並派遣像他自己一樣的農民去出席蘇維埃的全國大會。他應繳納的租稅逐年都在有計劃地減輕；現在他所繳納的僅及在俄皇時代的四分之一。他們並知道政府是非常希望完全免除農民的租稅，而以鐵路，工業及其他國有產業的收入去充政府用費的。然而俄國農民的一般生活程度仍舊非常低賤。百份之九十的農民家庭所有的土地都不過二十英畝（約八俄畝）。據蘇維埃政府稅務處的計算：每一英畝耕地的淨收入為七元美金，每一匹馬的淨收入為十元。依據這種計算，則每年每一農戶生產的淨收入不過美金一百五十元。農村人民的稅收，平均計算，每人應繳納美金一元五角，每一家庭以五人計算，即應納七元五角的稅，這一數目，在農民看來，已經是奇重的了。而且，大饑荒以後，據調查，百分之三十七的農戶都沒有馬匹，百分之四十五的有一匹馬，有兩匹或兩匹以上的不過百分之十八而已。

然而，農村的繁榮，農民生活之充實與提高。已經不是幻想：富強之道的樞紐已經在農民自己的手中。現在已經沒有地主來困擾他們了；銀行之設立並不是來剝削他們，而是靠了他們自己的合作來幫助他們的；市場已不再為奸商所操縱，一旦穀物販賣場所不為他們所滿足，他們可以立刻自己成立販賣協作社去推銷他們的生產物。其他如教育等等都需要許多根本的變革，他們自己準備了長時期有計劃的努力，政府一方面也是竭力予以贊助。

農民目前第一件需要的事是整理土地，使距離過遠和分配零碎的困難都因此而減去。現在整理土地的進行非常迅速，對於因整理而得到了便宜的人則課以每英畝一角到三角(美金計算)的稅，對於較貧窮的，由政府給以特別的幫助。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份，有三千五百萬英畝的土地經過了整理。然而其中二千七百萬英畝都只是把各村間距離過遠或分配零碎的整理好了，各村內部的分配仍未得適當整理，只有八百萬英畝是把各村以內都整理好了的。

有許多地方，土地不足以供給人口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移民到新土地上去才是救濟的方法。政府爲了幫助移民起見，在人口稠密之區的附近易達的各地，特別劃出了四千萬英畝的土地，作爲一九二七年移民的居留地，又在西伯利亞較遠的地方劃出了六千五百萬英畝，在高加索劃出了二千五百萬英畝，作爲一九二八年移民之用。移民之進行，其速率遠過了政府的預計；向新土地移住的五百萬人口中，僅五分之一是經過了政府的指導，有適當的計劃與組織的。其餘的都是志願的冒險者，他們是在利用政府的新法律，即：凡是志願移住於政府所劃定的自由土地地帶者，耕作五年以後，即可取得該地之永遠使用權。在政府指導之下組織的移民團體，由政府給了許多特權——如，免去三年租稅和兵役，火車免費，原住地的土地所有權仍保留三年，在此期間，從該土地的現使用人收取田租。

在農村中，出現了許多組織，農民自動成立的或由政府設立的，對於農民生活影響極大。其中許多完全是革命以後新成立的，有些是舊的形式，然而內容完全是

新的了。農民與政府發生關係的媒介，主要的是村蘇維埃，土地法，租稅，國家保險，學校，讀書棚，田莊的信用組織。主要的自動的組織是農民互助會，協作社，共產青年團——共產青年團主要的活動是設立演劇俱樂部，召集講演會，組織休息日的示威游行，領導白日保嬰院 (day nurseries)，展覽會及其他文化的種種運動。共產黨本身在鄉村中，表面上勢力極弱，許多鄉村中甚至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可是，在實際上，共產青年團的活動，不僅對於一般青年的，便是對於中年人的生活與思想，也都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將蘇聯農村中的生活情形分述於下：

土地法 在俄皇政府統治的時代，歐俄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五屬於農民，百分之二十六屬於地主，百分之三十九屬於皇室和寺院。今天，所有的土地都永遠是『勞動者的政府』的財產，可是『每一公民，不分性別，宗教別或種族別，都有權向政府取得適於耕作的土地，並得將此土地保留至某期間，不需給價或納租。』取得土地可依下述三種方式之下：(一)本人為農業公社之一

員，(二)從政府的土地部領取，(三)移民到政府劃定的自由地帶，經過五年的耕作而取得土地永遠使用權。

依上述方式取得的土地可以享有永遠的使用權；若本人停止耕作，即失去其使用權。土地不能典押或販賣，但在貧窮或缺乏農具的情形之下，可以將土地有限期地出租於他人。土地使用權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全家族；若夫婦離婚，妻可以將其應有的一塊土地取去；父親死去，並不需遺囑處分土地，因為土地已為全家族的共有物。若全家族都不幸死亡，土地即由村蘇維埃收回處理。

土地法中還有一條可注意的就是：一切用以耕作的農具和牲畜都是全家族共有的財產，不能為任何個人的債務而典押賣去。因此，父親不能再為了自己的酗酒或其他個人的享樂而任意耗費家中的財產了。

森林法。森林法對於農民也極其有利，使農民感覺到森林直無異於是自己的財產。蘇聯的森林面積有二十萬萬英畝，佔全國地面百分之四十，佔世界森林面積三分之一。在革命以前，農民可以自由使用的森林地

面爲三千六百萬英畝，現在可以使用的已達六千二百萬英畝，比德國森林的總面積還大得多了。此項森林的使用均須依照森林法辦理；森林法的目的有三：（一）使森林得繼續永遠使用；（二）供給工人以足夠的木料，完全免費或取價低廉；（三）使政府能從森林收得最大的可能的進款。

森林區分爲兩種——一種是有地方意義的，一種是全國的。較大的森林都屬於國家，由大規模的政府木料公司經營。採取最大的木料出賣，供給建築之用或出口運往外國。小的森林屬於地方，給農民以使用權——自然須依森林法辦理。得了村蘇維埃土地部的允許，森林可以伐去以便於田莊的整理與耕作，但若此種森林有遮風的蓄水的作用，這是公共利益所關，砍伐是不允許的。

租稅 在革命與內戰的初期，蘇維埃政府採用軍事共產制，實行沒收剩餘的食糧，這種稅則當然不爲農民所喜。一九二一年以後便採用糧食稅的徵收法，以農民所有的土地面積與一般收穫的情況爲徵稅的標準。

但此項稅收，在蘇維埃政府看來，並不是充裕國家財政的一種最好的辦法，不過是戰後恢復元氣的一時期中的一種應急的辦法而已。政府急切地希望免除農民的一切租稅負擔，由國家產業——磨坊，工廠，森林，礦山等——的贏餘來維持國家的財政。

『政府的收入若能迅速增加，農民所擔負的租稅必可立時減低，』——這是共產黨的決議案中採取的第一個原則。自從施行新經濟政策以來，農民所擔負的稅額已經逐漸減低，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份，總數僅美金一萬二千萬元，平均每人所擔負的僅一元二角了。這數目包括地方的和中央的一切稅收在內，農民應納的國家保險費（保險火災或牲畜死亡的）是除外的。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份，稅收總額又提高到一萬五千萬元，即每人一元五角；但此項數目中百分之六十是為地方事業用的，如修築道路橋樑，建築學校醫院等等，所以中央政府的實際收入比前一年是更減少了。這是根據共產黨對於農民租稅所採取的第二個原則而來的，那原則是：『租稅之用途應使農民因此更富而不可因此

更貧。』

租稅的形式逐年都略有變更。現在的形式(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份)很像累進所得稅的辦法：較貧的完全免稅，富農的稅額隨他的收入而增加。稅額本身雖然很低，然而俄國農民的生活程度也一樣的低，每人每年的收入不過美金五十元，超過此數的便作富農計算，稅額便為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俄皇政府統治下，租稅總額每人為美金六元二角五分，現在農民並不納租，只有一種低廉的單一稅，總算不易得的了。

地方政府 村蘇維埃是鄉村的地方政府。倘使你現在到俄國農村中去，向一個小孩問一個比較重大的問題，他必會立刻指引你到蘇維埃機關中去，那是村裏一切問訊和權力的中心。蘇維埃是在村中公開的羣衆大會中選舉出來的，選舉的比例大概是每居民一百選出一人。村鄉選舉後，即繼續舉行市鎮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市鎮執行委員會——市鎮執行委員會有權制定本地施行的法令，且有處罰美金一元五角之罰金或五天之苦工等權力。中央蘇維埃政府便是由鄉市蘇維

埃這種方式遞選上去的。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之密切，是政府當局所積極努力求其實現的。常有許多重要的法令，由中央政府建議的，都先送到鄉市去討論，然後決議施行。最近的『婚姻法』的討論便是一例。中央所建議的婚姻法在中央大會中遇到了小部份的反對；本來有大多數贊成，依法定的手續，通過是不成問題的，但蘇維埃政府是不願這樣幹的，牠必須在實際上得到了全體的一致，方拿出通過。於是，政府將原案撤回，送交各鄉市蘇維埃，令在村民大會和工廠大會中詳細討論，並不立刻要求得到結論，儘可反覆討論，直到羣衆完全了解贊同爲止。這種製定法令的方式在政治史上確是一種新的例證，這可以說明，蘇維埃政府不是一個『議會』，也不是一個辯論的組織，而是一個『執行委員會』，牠的責任在於執行勞動民衆的公共意志——牠，且相信，這種公共的意志，經過了教育與討論以後，是必定能夠達到合理的一致的。

鄉村政治還有一種特色，就是儘可能地誘導居民

『參加蘇維埃的工作』。任何人，只要是願意在地方政府中工作的，政府即竭誠歡納，並予以鼓勵；加入租稅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從事協作社和商業機關的工作，教育工作，地方改良事業等等，都是極受歡迎的。這在鄉村中，因為積習難返，故未能充分實現。中央政府是特別注意於此的，牠會訓令各鄉村蘇維埃：『鄉村蘇維埃的工作必不可限於牠本身以及牠的委員會這少數人的勞動，否則必不能實現蘇維埃政權之理想，即，使全體民衆都能參加一切問題之決定。農民大會必須舉行；中央或地方政府提議的法令不僅須在蘇維埃會議中討論，並須在更廣大的羣衆大會中討論』。蘇維埃最後的理想當然是在於消滅那種帶有強迫性質（即令是多數強迫少數）的國家，而使政府完全是全體人民中極和諧的一部份，從事於人民自己要作的事業。

互助委員會 農民自動的組織，與政府並立而從事於福利民衆的活動的，有互助委員會和協作社兩種。農民互助委員會雖然是自動的組織，現在加入的已佔農村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共有五萬七千八百〇二個。

牠們有自行徵取稅金的權力；有一些是以土地為標準而徵收的，有一些是以牲畜或其他的財產為標準，但是一切都是量其人之所有而決定稅額之多寡，而稅款的主要用途便是幫助那般遇着了不幸事件（如死亡，火災，或牲畜失亡等）的會員。牠們的活動範圍極廣；牠們幫助寡婦或是沒有馬匹的農家耕田；在饑荒的時候，牠們便組織粥廠這一類的救濟所；有時牠們還設立『讀書棚』或是『紅色茶店』——這是和舊式的茶酒館對抗的。牠們也開磨坊和乳酪所，牠們也量力購置農業機器，然而都不是商業的性質，牠們給與會員們的幫助也不是平等的，只是最貧苦或最不幸的得惠最多。然而，牠們絕對否認自己是一種『慈善』的組織，牠們認為這種稱謂真是一種侮辱，牠們自認為是一種具有共產主義精神的互助組織，屬於這種組織的人，量力予以指助，同時按自己的需要而取得幫助。每年有五十萬農戶從互助委員會得到了經濟的或勞力的幫助——即是，全體農戶中有四十分之一是得到了幫助的。

國家保險 和互助委員會作用相同的是國家保

險，不過國家保險是帶強迫性質的。經過了五年強迫的期限以後，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計農民住屋保火險的有一千九百三十七萬八千戶，土地保冰雹險的有一萬七千萬英畝，保生命險的有牛二千五百十七萬一千頭，馬八百八十六萬四千匹。保險的範圍雖然這樣擴大，而政府還是能夠把保險費減到極低，每間屋每年只付保險費美金四角，若遭火災，却能得賠償金一百元。馬的保險費每年一元五角，死亡的賠償金是二十五元；牛的保險費四角，賠償金十五元。保險費提高也可以的，這完全出於農民的自願——有許多農民希圖得到較大的賠償金，便自願繳納較高的保險費。保險局同時還積極地從事防禦火災以及防止牲口染疫的宣傳。

協作社 協作社有多種：純粹的消費協作社是在農村中從事零售商業的；農業協作社是農民聯合購買農業機器或是販賣或製造他們的生產品的；信用協作社是貸款給農民的。

現在加入協作社的已有五百萬農戶，佔全人口四分之一。協作社的活動成績至可驚人，牠們僱用了一千

五百名農業技師，設立了四千處選種的場所，二千五百處繁殖牲畜的場所，七千處地方的乳酪所，五百處麥粉磨坊，兩百所菜油工場。信用協作社平均每市鎮有一個，貸出的債額約為兩萬元美金，其中一部份是由本地存款支出的，而大部份還是由政府的農民銀行借來的。

現在農民借貸的辦法，還是根據一九二四年中央農業銀行成立時政府所頒布的而來的。中央農業銀行成立時原有資本額為美金二千三百萬元，次年即增加了三倍之多，以後尙年有增加。據政府宣稱，農民的主要經濟需要有三種：(一)土地的正當分配；(二)足夠的種子，農具和牲畜；(三)最高明的農業知識。農業銀行之設立，目的便在於供應第二項經濟的需要，甚至於還企圖介紹一些適當的耕作法。一九二六年底的調查，農業銀行已在五十二省中設立了分行。而在各鄉村中從事實際借貸事業的還是八千個信用協作社，牠們從農業銀行借款進來再貸出給牠們的社員。

在貸款事業當中，政府特別注意於農業的改進方面。政府多次訓令各鄉村的信用協作社，令細心考察各

本地的農業特別狀況，必須使貸出的款項能用到改進並發展農業方面去。例如，北部某省的情況，適宜於製乳和種麻而不宜於種麥，因此便不必貸款去購買麥的種子，貸款的用途應是購買最良好的麻種或是小牛。這樣，貸款的力量可以與教育的力量並舉，幫助農業的進步。

文化生活 蘇維埃鄉村文化生活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讀書棚』和『驅盲所。』鄉村學校自然也在逐漸加多，然而因為學校的花費較大，所以速度比較還是慢的。學校的數量雖少，內容却完全是嶄新的，教授的課目都是關於農業的知識和農村的實際生活，講到城市生活，便引導學生到城市去實地觀察。牠們教學生成爲一個有覺悟的公民，這是前此所未曾有的。而且農村中的男女學生，若是顯出有某種可造就的才能，現在也有機會，從政府方面取得少量的津貼，從事深造了。

學校增加雖較慢，他種文化的事業却有很大的發展——這種活動的成績，與其說是靠的錢，毋寧說是靠的青年的『熱心。』在過去幾年中，成立了五千所市鎮圖

書館，供給三萬處讀書棚的借閱。驅官所遍鄉皆是，只要失學的成年人願意去就學，他是不愁沒有地方的。青年共產黨員非常熱心地爲不能識字的人高聲讀報。在夏季，婦女到田間工作去了的時候，數千『白日保嬰院』便擔負了照料嬰兒的責任，近代育兒和衛生的方法也都從此介紹到僻遠的鄉村中去了。非職業的戲劇的運動在農村中幾乎，狂風暴雨似地發展着，青年都被迷住了一樣活動着，直到後來，幾乎每一鄉村中都有一兩個非職業的戲劇團體。無線電事業也發展到了鄉村，窮鄉僻壤的農民也能聽到柏林和莫斯科的音樂演奏了。

今天在蘇俄真正值得注目的是城市工人與鄉村農民的 Smichka (聯合)運動。蘇聯以外的全世界，城市與農村都非常隔絕，若被野心的政黨利用，則工農常因而變成死仇。蘇維埃政府對於工農的聯合特別努力。每一工廠或一城市的工人團體必擇定某一鄉村或某一小市鎮作爲自己工作的對象，他們自己便以『長兄』(Sh-ef) 自居，對於鄉村的『小兄弟』都竭力盡指導幫助之責。工廠的工人常於星期日或休假日下鄉，爲農民恢復

被毀了的學校，籌備農民的演劇俱樂部，或是送雜誌書報給農民讀書棚。有時他們還組織一種『紅色農民日』的集會，在這集會中主要的程序是宣傳新式的耕作方法。

新聞紙終於達到農村中了。能夠按期遞到的還只是一部份的農村，因為距離過遠，運輸困難所致。列寧格勒附近某郵局曾特別對於農村報紙的遞送情形加以考察，結果看出有二十三個鄉村都能在出版的次日收到報紙——這已經算很迅速的了，

除了許多運動是從城市中傳來的以外，有許多運動是農民自發的。地方蘇維埃常時召集農民大會，討論改進農事的辦法。有一個可稱為模範區的縣份，曾有一千五百農民出席的大會，其中一半是婦女，會期延長到四天，而神情還是非常緊張。

這種種新文化的外表當然還是非常窮相難看。演劇俱樂部沒有佈景的材料；讀書棚的書籍都是紙面，且殘缺不全。各方面的發展也都不平均的；甲村蘇維埃的主席是一個能幹的青年，甲村的進步便大有可觀，而鄰

近乙村則因技術與物質的缺乏，仍舊是非常落後的。窮乏的北部進步極難。中部和南方便容易多了。一切農村的進步都要建立在經濟狀況的進步上面，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蘇維埃政府目前的努力是在於：正當地重分土地，經過信用協作社的借貸去購買機器和選擇種子，經過農業技師和農業展覽會等等去教育農民。

俄國的農民已經顯示出來：他的愚昧無知，決不是天生的缺憾而是累千百年壓迫的結果。今天俄國農民的物質生活，比英法德乃至美國農民的，都要壞得多，甚至有些地方比他自己在革命以前的生活都壞些——因為革命與內戰的破壞的結果。然而，他的前途的希望却比那一國家農民的都來得大，他已經是自己的主人了。

此页无页码

第十三章

農民之自白

革命結果之各地異緻——農民休養院之聚：「四角八方的罷
有了！」

租稅——免費的木料——教育狀況——農民與政府的關係
密切了——土地問題——互助會的情形——學校數量
之增加與內容之改進——白海帶的生活情形——韃靼
人的教育

革命與婦女生活——老農婦之「自由」觀

中部農民之土地問題談——老農的怨聲——青年的東顧——

—集合耕作之概況—革命前後之克里米少女之聲——離婚問題——對於孕婦待遇之今昔——婦女之『蘇維埃的法律』觀可喜的湯波甫；可愁的尼幾尼

宗教問題——青年不進教堂——多數人不理會牧師了

極北角的亞庫特卡人的生活——北極圈以外的唐姑希卡

人的生活

蘇聯版圖遼闊，各地氣候與土壤之性質已自不同，運輸又極不便，市場情況與文化程度相差極遠，因此，革命的結果，對於各地帶決不能是一致的。在南部所謂『黑土』地帶，地主推倒以後，農民的土地立刻加多了；在北部森林地帶，地瘠且少，農民的進益實在沒有什麼可觀的。在西伯利亞，土地超過了人口的需要，在白俄羅斯，便是革命後仍舊感到土地的缺乏。除了這種種不同的經濟背景而外，還有老年與青年間的鴻溝：老年農人老是要依照舊的風俗習慣和祖宗成法來處理農村的一切事務，青年人却極熱心於組織讀書棚，演劇俱樂部，展覽會，進行反對迷信宗教的工作。

我們要能遍歷各地，聽聽老少男女各色的農民發表他們對於新統治的意見，當是最可欣幸的事，然而這在事實上是難能的。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令我們能夠滿足這個願望，那便是美國司莊 (A.L.Strong) 君在里瓦吉亞農民休養院所記述的各地農民的談話。

里瓦吉亞的農民休養院是俄皇夏宮的舊址，在克里米南岸，背依高山，面臨碧海，佔地約一百英畝，房屋都是大理石建築的，圍繞在常綠的森林中，更襯以叢花茂草，真是令人疑惑是人們常說的仙境哩！

到這兒來的，東西南北中各部的農民都有，因為這兒的床位是按各地平均分配的，來往路費都由政府發給，所以這兒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然而，因為來這兒的目的是養病，不是討論政治經濟的大問題，各地來的人也並不是經過特別選擇的，因是我們在這兒特別能看出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要聽聽各地農民自己的意見，這兒是最有機會了。

在這休養院裏有俱樂部；有音樂會，電影，演講；有一個很完備的圖書館和讀書室。我(斯莊君自稱，以下

同)便常在這讀書室裏和許多農民談話，問他們革命以後的生活究竟比以前的有怎樣的的不同。這一問題常能引起極熱烈的辯論，人愈聚愈多，問題愈談愈廣。

我們現在要介紹一次極有精神的辯論。(爲便於記憶起見，我們將以甲乙等稱之)

甲是從西伯利亞來的農夫；乙是從卡站附近馬里次基縣（在俄羅斯的腹地，居民原係芬蘭種，革命後取得了自治權的）來的；丙是從遼遠的北部亞奇安吉耳來的；丁是從察里城附近的東南大平原上來的；戊和己是從白俄羅斯的明斯克縣來的，那兒已經和波蘭交界了。當我問完了他們各人的故鄉以後，他們都笑說：『四角八方的都有了！』我又提出我常問的問題——革命使他們的生活有些什麼變更？

第一個說話的是明斯克來的己，他在衆人中算最年輕了，不過二十歲：却是最有精神的。他說：『大大的不同。第一，租稅減低了。窮人簡直不納稅。可過一點的也按照他收入的多少繳納，可是就是這種人，比以前納的也少得多。』

丁起來辯正這句話：『在我們縣裏，富人比以前繳得多些。我附近有一家很富的，有十六頭牛，八匹馬，在春天還有三架鋼犁耕地。因為他僱了長工——爲了賺錢而僱的長工，所以他比以前繳的稅款多些。在我們的三百戶農家中，像這樣的只有四戶。』

『像這樣的勞力剝削者在我們村裏已經沒有了，』青年的己回答說。『倘使我們那兒有這樣的人，當然也要他們多納些稅，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那兒有些可過的農人也有幾匹馬；可是他們的兒子還是自己掌犁頭，只有在收穫的時候他們僱用工人。』

乙說：『我來告訴你們我那兒的情形。窮人可以免費取得木料。我自己便取到了六方木料，拿來造了一間住屋和一所屯屋。倘使要拿錢去買這樣的木料，至少要三十盧布啦。』

己大聲說：『在我們那兒，這樣的木料得六十盧布哩。』

『在我們那兒，同志，』丁微笑說，『會得三百盧布哩。我們簡直不用木料造房子哩。』

乙聽見了木料的昂貴，似乎很驚奇，他接着說，『吓，自從革命以後，我們有了用我們自己的語言的學校了。還不是處處都有；誰都不能很快地設立許多學校。可是，沒有學校的地方，Lik-Point（驅盲所）是有的；這在蘇維埃機關裏或在誰的住屋裏都很容易辦起來的。』

『在你們縣裏，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上學校或驅盲所的機會呢？』我問他。

『吓，很難說「都有機會」。當然，在冬天，小孩子沒有皮鞋和羊皮襖是不能到三四里以外的學校裏去的啦。可是青年人或成年男子有外套的，便是更遠一些也可以去的。……在往年冬天，不必說三四里，便是三四十里，成年男子，甚至女人也都得走哩。……現在，在我們縣裏的學校或 Lik-Point，只要有精力和外套的人，在冬天都一樣可以去的。』

丁說：『我們的互助委員會發了許多皮鞋給窮小孩們，讓他們好進學校去。』

『我們還沒有那樣好，』乙說。『大饑荒弄得我們太

苦了。可是過後政府也很幫助我們。我們下的種子，有一半都是政府給我們的。一九二三年大收穫以後，政府還是免了我們的稅，並且種子都不要我們還。……現在還有一件比較好的事情：政府離我們很近了。從前，我們要到市鎮上去總得跑三四十里，到州（County）裏去，要走兩百多里；真是太遠了，農民多有一生都不曾去過的：可是現在新劃成了「區」的地界，區政府離我們村裏只有三十多里，市鎮政府却就在我們村裏。』

戊又發言了：『我們那兒完全相反。區比以前的州還要大，並且區政府也在老遠的地方。可是我們的政府離着我們還是很近，因為我們現在辦理一切的事都在我們的「村蘇維埃」裏——領護照啦，領證書啦，解決糾紛啦，都在這兒。』

『你們都同意，現在的政府比較容易上門些，不再是「天高皇帝遠」了嗎？』我問。

『確實的，現在的政府比較容易上門些，這是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

乙又提起了土地問題：『在我們縣裏耕地很少，大

部份是森林。政府所有的土地都給了我們以後，我們每一人所得的還不夠一又半俄畝。因此，政府又把國家的森林地分給我們，現在我們正在開墾那些森林地哩。』

西伯利亞來的甲現在插進來說話了：『我們那兒土地老是太多了。可是在從前，窮人還是沒有土地的，因為要土地就得拿錢去買。現在土地是不要錢買了；我們把我們村裏的土地都拿來平均分配給所有的人，互助委員會便幫助那些沒有本錢的窮人。牠借種子給他們，幫他們打穀割草，取價極廉；幫助他們選種是完全免費的；並且供給他們的木料；若是家庭中有死亡，有時牠還幫錢給他們。』

我記起了美國的窮人不自振作的情景，便問道：『這種幫助真正能夠使得窮的農民振起家業來嗎？』……他們很驚異地看着我：『倘使一個人有了土地和馬又有種子，怎的會不能振起家業來呢？』

『可是，不是有許多人因為他們自己的愚拙和酗酒，弄得窮困不堪嗎？』

青年的戊代替大家來回答我：『自然有許多酗酒的

農民。可是，當互助委員會給錢他買馬的時候，你以為他們會不去留心那筆錢的用途嗎？浪費互助委員會的助款——這種事有時也偶然發生，但確是少之又少。倘使委員會把錢這樣大意地給浪費了，全村的人都會責備委員會——我們便會立刻改組牠。』

『在我們縣裏，』丁說，『全體農民現在都加入了互助會。每人有一俄畝地的就出五磅麥子。現在，便是窮人也可以讀書了，因為互助會為他們的小孩子買鉛筆和書籍啦。』

從問答當中，我知道互助會是志願的，可是免費的書籍和種子，不取利息的貸款，這些好處只有窮人才得着。我便動問，這樣是否會使得較富的農民有退出互助會的趨勢？因為他們拿出來的很多而收回去的却很少。大家聽見了都笑起來，丁回答我：『倘使他們願意，讓他們退出好了。誰能保證自己家裏沒有火災或死亡？一個人病了需用藥品的時候，倘使他是互助會的會員，他便可以免費取得。許多其他的東西，一般人都得出很高的價才能得到，互助會會員却完全可以免費取得的。互助

會還有磨坊，有農用器具，這是每一家都需用的——互助會的好處不僅在鉛筆和書籍的免費啦。』

問題轉到了教育上面。青年的戊說：『現在學校比以前多了，並且內容也好些。我們縣裏從前只有兩間四年修業的初級學校；現在這樣的學校有四間，還有一間七年修業的學校。初級學校中有一間是猶太人的，完全用的猶太語言教授。』

從明斯克來的己是一個老年農人，這時他才開口：『以前有的學校，現在還在那兒。並沒有新的。我們的學校四年以前燒掉了，我們幾次要求政府辦一間新的，可是老是沒有辦。』

這是我們的『順水』談話中第一次遇見的逆風。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起來擋住這陣風了——他是從卡站來的三個韃靼人之一，在那兒已經聽了好久了，我們稱他作庚。他反問：『政府對於你們的要求怎樣答復的呢？他們不給你們木料或教員嗎？』

『否，』老年己說，『他們給了我們木料，可是他們要我們自己去搬運。那離我們有三四十里路；我們怎樣辦

得到呢?』

青年庚說，對於學校的建設，政府免費供給木料，鐵釘，玻璃，和某數量的工錢，此外還供給教員的薪金；只要本地的農民用他們自己的馬匹去搬運一下，並幫作少許不熟練的建築工程。接着他便公開地斥責道：『在我們村裏的人不像你們的那樣懶惰，同志。我自己便是村蘇維埃的主席，所以我知道。我們爲了建築學校，特別在收穫以後劃定了一個星期的義務勞動。我們自己去砍伐木料，搬運回去並且削平鋸解牠。現在我們已經有一間很好的學校了。』

丁微笑着，似乎想替老人解圍的樣兒，他說：『咯，同志們，那村裏大概是很爲難。那兒是波蘭人侵入過的地方。你們有多少馬呢?』

己承認有一百戶人家，兩百匹馬。於是衆人都有點不滿，覺得這樣富足的一個村子，却連搬運木料建築學校的力量也沒有。那位老頭兒還抗爭說：『馬有一半是不中用的。』可是，即全只有一百匹馬也比別的村子富足得多了。有人在那兒低聲罵着：『懶東西!』庚又問：

你們納多少稅，同志？』

『十八盧布，』老人已說。

『僅僅十八盧布，政府却不僅要練紅軍爲你防禦波蘭人，不僅要修橋補路，付給教師薪金，並且還要爲你搬運木料。』個個人都笑起來了。西伯利亞的甲又加入了舌戰：

『我們村裏有一百六十戶。從前有一間學校在鎮上，離村有五里路遠，村裏沒有。後來我們把教堂沒收了，改辦了一間四班的學校。現在那班信教的人祇得到鎮上去作禮拜了。』

丁點頭微笑說：『現在作禱告漸漸難了，可是讀書却漸漸容易了。』

『可是他們不能在星期日把那學校來作教堂用嗎？』我問他們。大家都望着我，似乎不能了解的樣兒，甲高聲說：『怎樣作教堂用呢？他們把聖像都搬掉了！』

丁接着發了一大篇議論，都是關於學校的：『從前在我們縣裏有兩間三年修業的學校；現在我們有四間四年修業的了。女孩子也上學校去，和男孩們共學。從

前只兩個教員，現在有六個了。而最重要的是功課的不同。從前學的只是讀書，寫字和上帝的法律。現在他們學圖畫，泥木彫刻，剪彩紙，開小商店，佈置小花園。他們還到外邊旅行，採集花草植物。

『我有兩個女兒——去年夏季，一個女兒整整地都在那兒採集各種東西，葉，枝，草，花，拿來粘在紙上，還註明一些字在上面。另一個女兒什麼都沒有採集，因為她對於這毫無興趣。現在的學校的任務是，尋出每個小孩的特別興趣。聰明的可以到市鎮上去進專門學校，學習他們所特別愛好的學科。

『他們也學習政府的事。他們去參觀村蘇維埃和互助委員會。他們學習知道誰應受幫助，並且為什麼要幫助。他們到市鎮上去參觀工廠，電氣廠，電話局和電影等。在學校裏，學生自己選舉一個自治委員會，有主席一人，還有衛生委員會和學生法庭。倘使一個學生兩手不潔淨跑到學校裏去的時候，衛生委員會便在大會上指出來警戒他。從前孩子書念不熟的時候，教師老是鞭責他，或罰立在牆角裏，或是遣送回家去；現在却由

學生的自治委員會去開導他，告訴他不用功只是害了自己等話。掌面頰或扯耳朵，現在都是禁止的。』

北部的丙說話了，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黃髮男子，說話的時候略帶點驕矜之色。『我住的地方是列甯格勒到白海的水道上，我們那兒住的人確是很開通的。我們都很重視讀書。我們並不是落後的民族，我們的祖先確是大俄羅斯人。然而雖則如此，我的父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不能令我在市立學校七年級畢業以後再繼續住下去。我在村裏住了三年學校，市立的住了四年；我的父親真正犧牲了不少；我的家庭在冬天飯都不夠吃，爲的是使我能多有點錢住學校。後來我以第一名在學校裏畢業，我希望取得官費到聖彼得堡去繼續學業。

可是他們把官費給了牧師的兒子，他是第二名畢業的。那一天的事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他的父親有着一棟很好的屋子，還能爲他買很多的書。然而因爲他是牧師的兒子，所以他還是得到了政府的津貼。直到革命以後，我才得繼續求學；現在我已經在農業大學裏畢業，回鄉教授新的農業知識給我的鄉人了。』

他繼續告訴我們極北地帶住的落後的民族是怎樣生活的。他說，他們並不事耕作，只是靠着成千上萬的馴鹿爲生，吃她的肉，穿她的皮和毛，還要她供運輸。他們養得很肥壯，却是非常愚蠢。他們不懂衛生，那兒顆粒性的結膜炎非常之多，可是他們完全不知道怎樣防禦救治。可是革命以後，醫藥衛生的知識都輸送去了。有許多青年從那兒出來就學，再回去爲他們的家鄉服務的。

我問他：『似乎便是在革命以前，你們村裏便已經有了學校，並且一般都很重視讀書的；那末，小孩子當中有多少就學的呢？』

『男孩子當中有一半都是學了讀書寫字的，他們多半住一兩年學校，有的還能住三年。可是女孩是絕少去的。現在我們縣裏男孩全體都要進學校去；若是有不去的，他們的隣居便會非議他們的父母了。只有沒有冬衣穿，在最冷的時候可以不去。』

從卡站來的韃靼青年庚又說話了：『我們的文化中心是有名的卡站大學。可是在各村裏也有用韃靼語言

教授的學校。在大學裏還特別爲我們韃靼學生留了一定的名額，因爲我們比俄羅斯人落後得多，需要教育，設使我們和他們自由競爭，我們決難在大學中得到很多名額的。』

晚餐的鐘響了——管這老鐘的侍者告訴我：『從前我敲這鐘是通知俄皇尼可拉去作禱告，今天我敲牠却是叫農民們去吃茶。』讀書室的衆人都一哄散了。

第二天午飯後，我在走廊外遇見了一個完全兩樣的農人——這是一個老年的農婦，頭上蓋着一方白手巾，坐在舊御亭上，手裏織着什麼。她的生活完全集中在她的家事上面。我問她革命對於她村中的婦女有些什麼影響。她嘆了一口氣，答道：

『呵，那完全是一樣，我的親愛的，完全是一樣。婦女的主要的負擔是她的丈夫；家庭的生活老是照樣的黑暗且令人傷心。然而我以為還是好了一點。男人們有點害羞，不常打她們的妻子了。從前女人常有因爲被毆打不能起身的。現在男人們有點害羞，或者也是有點害怕。在我們隣村裏有一個女人和丈夫離婚了。可是在我

們村裏還沒有。

『我們村裏現在也有婦女講演會：我自己去聽過了一次。他們講一些奇怪的事情，對付丈夫的新方法。可是我們多數都害怕這些新方法。我們老是被壓迫的：我們不知道怎樣去使用自由。然而我究竟以為自由是一件好東西。青年人是不害怕的。我的兒子到列寧格勒去學獸醫去了。這也是很好的，從前不能有的事。那個農民弄得到錢送兒子到大學裏去讀書啦？可是現在政府送他去。大概青年人可以用這種自由得些好處吧。』

我問她能否讀書寫字。『只會一點兒，』她說。『我認識字母和幾個字，但是不能讀報紙。我的兒子在我身邊的時候，他還教我一些。在我年輕的日子，女孩們是不進學校的。現在我怎樣能有時間學讀書啦？我家裏有六個人，我又病了四年，沒有好過一刻兒。』

又一天，讀書室裏又聚集了一羣人。開始說話的是『黑土』帶的湯波甫地方來的一個農民，他滿頭黃髮，臉頰瘦削，可是非常精神，且有點粗暴的樣兒。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九二〇年農民暴動反對多數黨的糧食徵收

辦法，鬧得最兇的是湯波甫地方，而現在湯波甫來的人却完全是樂觀的，崇敬革命的。他說：『革命爲我們作的最大的事是剷除地主。在我們的地方，大地主着實不少。我們農民所有的土地簡直不夠生活。我自己只有半俄畝。因此我們祇得替地主去種田求活。現在我有六俄畝了。革命還令我們得到了不易得的好處：從前，我們是決不能到里瓦吉亞皇宮來的，想也不能想像的呀！』他說着一笑。

接着沙托拉夫地方來的一個農民談起土地的故事來了。『我們鄉村的土地是屬於斯脫利賓的。我們甚至每人一俄畝土地也沒有，只有十五沙仁（約八十方碼）的樣子。因此，老人耕田，兒子便到鎮上工廠裏去。我自己便在瓦耳斯克的水泥廠裏作工，冬季就回家去。現在我們每人有三又半俄畝土地，青年都不再出去了。』

尼幾尼縣來的農人接着說下去，他是一個面色灰敗的長臉孔，說話的時候帶幾分憂愁的樣兒。『我們那兒沒有地主；我們的土地非常貧瘠，以致沒有人願意要牠。我住的地方離鐵路有一百六十里路遠，那兒都是隔

田和森林。我們耕作一年，連自己吃都不夠。然而現在究竟好了一點。我們土地重行把分配過了，現在耕作比較容易一些。此外我們還開了一些森林作耕地，聽說政府還要給我們一些森林地哩。』

從白俄羅斯來的一個黃髮農人很不快意地說：『土地的問題現在比以前沒有一點好的。有些人有十俄畝，有些人只一俄畝，這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我們要求重分土地，已經三年了，他們幾次答應了，可是總不照辦。有許多因戰爭而殘廢的人；我自己便是一個。我是防禦波蘭人的一個志願兵。他們給我的撫恤只每月五盧布。五盧布值什麼呢？這是錢嗎？我祇有一俄畝半土地。我問你們，一個人有一妻一子，靠這點土地進項能夠過活嗎？至若地主的土地，他們把最好的都拿去作什麼集合耕作，我們農民什麼也沒有得到。』

湯波甫的那個農人聽見了這段怨聲，非常氣憤的樣兒，於是抗聲問道：『那麼在那集合耕作裏的是些什麼人呢？』

『那些沒有土地的』那白俄羅斯人回答說。

『呵，這樣——也是農民啦。……那麼爲什麼你不加入在他們一處呢？你的土地既然這樣少，他們一定不會拒絕你的咯。』

『爲什麼我要拋掉我的這塊土地去和他們冒險呢？』他不很高興地說。『他們老是互相爭鬧着。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弄得好？』……這時一羣人的鬧聲把他的不平之鳴蓋住了，他也利用這機會不再說下去，却轉口說到集合耕作的特權問題。別人也不大理會他了。接着一個青年農民跳起來說：

『我也是從白俄羅斯來的。那兒土地很少，這是的確的。我家裏有五口人吃飯，從前只有二又四分之一俄畝的土地。現在我有五俄畝了，這在我們縣裏還不算最多的。候我們村裏和隣村的地界劃定了以後，我還可以多得到一些。說到地主的土地——的確的，那比較中心的土地沒有給我們，但是政府的模範田莊對於我們全體都是很有益處的。』

『模範田莊的工作比農民自己的工作得好些嗎？』我問。……『那是毫無疑義的，』他回答說。

『你們的生活現在好些呢，還是從前好？』『自然現在好些，』他很堅決地這樣回答我。

『我自己是集合耕作裏面的一個，』一個很高的黃髮農人說着，我常是把他和湯波甫來的那個相混了。『我們一共有三十個男人，十個女人，八個小孩，耕了三百俄畝土地，就在克里米這兒。我們有一架 Tractor，還有幾架別的機器；這是政府掛賬賣給我們的，三年付款。我們住的是從前地主的一棟房子；我們的生活不算壞哩。我們有十頭牛，七匹耕馬，五匹小馬。』我想，四十個人有這些東西本不算多，可是在他看來似乎已經是很富足的樣兒。

『在戰爭以前，』他繼續說道，『我是一個沒有土地的僱工。我作一年工，除了吃飯之外只能賺到三十盧布。地主也給我一兩件外衣，可是襯衫和鞋子都得自己辦。因此，我常時沒有襯衫穿；三十盧布夠買什麼呢？說到吃飯，他們給的只是沒有肉的菜湯；肉是要買的。還有黑麵包，這是可以儘量吃的。……我們現在集合耕作的組織完全是一個國際的團體；我們裏面有波蘭人，烏

克蘭人，德國人，俄羅斯人，並且還有幾個美國人，然而我們住得却都非常相安。』

現在談到克里米的問題了，一個青年韃靼人起來說：『好久以前，所有克里米的土地是屬於韃靼的幾個大首領的；可是俄羅斯克服了克里米以後，俄羅斯的貴族便把那些土地都買去了。所以我們農民竟是手無寸土。在我住的那縣裏有一個大地主，他握有一萬八千俄畝土地。較富的農民都向他租地耕種。可是貧農是太渺小了，不值得這位大地主的麻煩，所以貧農多只能向富農轉租。收穫的三分之一是歸地主的；若是轉租來的，這中間人還得有許多回扣。自從革命以後，現在在我們村裏每人有六俄畝土地，並不納什麼租了。六俄畝本來是很多了，但因為土性乾燥，所以我們還需要更多點。』

後來有幾個婦人也圍攏來了，她們也是預備說話的樣兒。終於，一個神情頗堅決的婦人開口了，她不過二十來歲，很有精神地：『我是從明斯克政府，明斯克州，斯列潘斯基村蘇維埃來的。』

大家都笑起來了：『現在你有了她的完全的住址；

可以從美國寄信給她了。』什麼都不能折她的銳氣，她還是繼續說下去：『我要說的是，革命對於我們婦女給了大大的影響。我們現在常參加一些大會。我們有些在保嬰院作工。我們還在我們村裏組織了這樣的一個。自然還有一些愚蠢的人，可是自從男人知道我們有平等的權利以後，他們的行爲確是好多了。』聽衆都笑起來，歡迎這位會說話的女性。

『倘使一個男人虐待了他的妻子，在她一方面現在是很容易作到離婚的，』她很率直地說下去。『她可以到蘇維埃主席那兒去，告訴她這件事。主席便送一張通知書給她的丈夫：「倘使在某一天你不到我們這兒來聽審，你便須和你的妻子離婚。」就是他按時到那兒聽審，還是一樣，他總得離婚，只要她這樣要求着。』

那面色灰敗的尼幾尼人看着很驚異的樣兒，他說：『否，否，我們村裏沒有這樣的事。』可是隨着有一個回應的聲音：『自然你們也有的。大概你們那兒的婦女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只是，那兒不是蘇維埃主席管這件事，是 Zaks（人口統計局之簡稱）管的。』

明斯克的那個婦人很堅決地說：『我們那兒，主席和 Zaks 是一樣的。我們有許多實例，我不想說許多，有一個男人打了他的妻，她便跑到政府那兒去投訴，政府派人去察勘，並警告他，倘使他不改正這種行爲，他必然要強迫離婚的。後來他的行爲果然變好了些。』

湯波甫的那個農人也同意她的話，說：『從前男人打了妻子，妻子是無處訴苦的。』那婦人接着說：『倘使女人懷了身孕，她便被視爲「不適宜於勞動的，」那麼你的稅額就可以減少一些。』

接着那位尼幾尼的人又來吹逆風了；他說：『並不見得都是這樣。我的妻有一個嬰兒，我自己病了。我要求免稅，他們却要我弄一張醫生的證明書。』

『爲什麼不要呢？』衆人中有一個聲音這樣喊着。『可是藥房和醫生在一百多里以外，嬰兒也不是個個人都可以照看的。』

『都是一樣的，』湯波甫的農人解和似地說，『他們必須有證明書好貼上印花。』

明斯克的那個婦人像狹岸流水一般，她的話沒有

方法止住：『從前農人病倒了，不過像一只蒼蠅一樣，死去是無人管的；現在政府却把你們送到皇宮裏來。……舊式的家庭真是令人可怕。對於媳婦兒尤其是太難了：家庭常是不管她懷孕與否，老是要她操作，以致常有因這樣過勞而死的。現在，倘使男人逐出他的妻子，或是他的父母虐待她，使得她不能不逃出家庭，她仍舊可以取得她應有的那份土地的。蘇維埃的法律對於婦女，比她的丈夫還要仁慈寬厚得多。』

她已經說得很多，再繼續不下去了；湯波甫來的農民便接着頌揚革命的功績：『從前我們是決沒有看見過報紙的；現在各種的都有了，連婦女的都有。還有宣傳隊到鄉裏去講一些耕作的知識。我們村裏有一處讀書棚，鎮上還有一所圖書館。我們還有一所人民俱樂部，裏面有戲院，有演劇俱樂部。不久以前我們還裝了一架無線電話機，可以聽得見柏林的音樂。蘇維埃機關裏裝了一架電話機，我們有事和州裏商量的時候便不必親自跑路到州裏去了。』

『那些老人們，』他笑着說下去，『以為無線電話機

是鬼在那兒作怪。你們也應當聽見過他們的議論的。我們告訴他們那是莫斯科的人在那兒說話，他們却說，「否，那是有人躲在牆裏面在說話。」後來他們又說那是鬼在作怪。」

『你們，同志們，什麼事都辦得到，你們黑土帶的人，』尼幾尼的那人很羨慕似地說，『可是我們住在僻遠的黑暗森林裏的人什麼也沒有，學校還是舊的，讀書棚沒有看見過。藥房在一百六十里路以外的鐵路上；中間還隔着幾條河，橋都壞了。』

可是湯波甫的那個人還是興致不減：『從前便是在省城裏都是沒有藥房的，現在州裏都有了，省城裏還有獸醫哩！』

談話又轉到了宗教問題。大家都承認，青年人是不再到教堂裏去了，只有遇到了結婚或生兒子的場合，經老年人的堅持，他們才到教堂裏去跑跑。克里米來的韃靼人說，回教的清規，每一個好的回教徒每天必須作五次禱告的，可是青年的回教徒現在已經不再守這清規了。『可是在我們每一年的兩個大節日的時候，一半以

上的青年還是到教堂裏去，因為老年人的哀求甚至泣下所以不能不去敷衍一下。」

從斯莫倫司克來的一個農人說他那兒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們那兒的人，一半以上都不承認牧師了。當政府聲明，「我們不再用錢供給牧師了；讓那班信徒去合資供奉他吧，倘使他們願意的話，」——這時候，我們便都開始考慮，這筆錢是否值得施捨的？第一，你們家裏每個人必須給他三磅麵包；其次，遇了婚喪或施洗的事都得給一筆額外的謝金。並且給『酒錢』也是必要的一一你們不要笑，同志們，你們也都知道，倘使想和牧師要好，便得給他『酒錢』哩。一次喪事，牧師的酬金需兩盧布，助手的一盧布。所以現在我們許多人都這樣說：「他是已經冷了的，要牧師來作禱告，於他是毫無關係的。」因此，人死了，只須家族親朋聚會起來送去安葬，多不再用牧師了。倘使死的是青年共產黨員，他的同志們便為他舉行一種送葬的儀式。我們那兒只有三分之一較富足的人還承認牧師。」

在我右旁椅上坐着一個黃色皮膚，蛋形面龐的婦

人，看着有幾分像亞拉斯干的印第安人，我轉身去問她的歷史。她是亞庫特卡地方的人，那地方在西伯利亞極北角裏；從她住的地方到鐵路邊便有九千多里的路程——都是坐船或坐馬車的。她說，『唉，從我們村裏到第一條河邊便有一百六七十里。多得很，我沒有去計算牠。』

那個尼幾尼的人聽見了便吃驚似地說：『我以為離開鐵路一百六七十里地方便算黑暗的森林地帶了！這個女人竟沒有計算她的路程哩！』

亞庫特卡的婦人告訴我們她們的生活情形：在夏季的時候，十多家人家共聚在開墾了的一塊小地上種點穀麥，到了冬天便都回到森林中各自的草棚裏去——草棚都是四散着的。我很奇怪爲什麼她們不聚居在一處，她說因爲冬天不能遠去，而一二里方圓以內的草常只能供給一家之用，所以不能不分開住着。她說她的最近的鄰居便在三里多以外。我又略帶自信地說她們那兒當然很難有學校的。

可是她倒令我吃驚得很！『當然我們有學校的，』她

說。『在革命以前便有的。在我們北部住了許多政治犯，都是俄皇遣送去的。許多有名的人在那兒留住許多年。革命發生，他們便把智識份子都聚集攏來，組織了一些學校，用我們自己的語言教授。我們的學校有寢室，飯廳，浴室；一切生活必需的東西都完備得很。小學生從星期一到星期六都住在那兒。到一星期的末尾，孩子們的父母都從四五十里以外驅車來接他們回家，遇着了大風雪的時候便不回去。』

她還很自傲地告訴我們，她們的蘇維埃政府自從革命以來便不會受過摧殘。她們處在極北部，柯爾恰克領導的叛亂影響不到那兒，她們藉北部的電報不斷地和莫斯科通消息，她們的政府和學校都一直沒有停止工作。

另外一個女人說話了，我原先也以爲她是亞庫特卡人；可是她說她住得比亞庫特卡更遠的地方。大家都失笑了，蘇聯的版圖真是無窮的大哩！她從家鄉到鐵路邊，要爬山過河，乘船，騎馬，徒步，一共要經過四十二天的路程。

『我不是亞庫特卡人，』她說，『我是唐姑希卡人。我們住在北極圈以外的地方。亞庫特卡人還能靠種植牧畜爲生，我們只能靠漁獵生活。我們出產的毛，全世界都有銷行的。

『唉，從前是苦得很！我十歲大的時候便痛恨資本家。他們專於欺騙我們。我們也怕官；卽令是一個小官，在我們面前却也了不得地裝腔作勢。……亞庫特卡城的蘇維埃成立以後，他們派了一個代表到一千一百里以外的森林中去召集我們聚會，問我們需要怎樣的政府。我們說：「你們在亞庫特卡有怎樣的政府，我們便要那一樣的，只要牠不是欺騙我們的。」他說：「那麼，選出你們自己的代表到亞庫特卡去，並且告訴我們你們人民的需要，你們的代表就在我們政府裏辦事好了。」於是我們就在那個聚會裏選出了我們的代表。後來我自己也會作過一次代表哩。

『他們在亞庫特卡城裏有學校和讀書棚。我們的孩子在冬季都送到那兒去念書。我們的語言現在也印成書了，這是革命以前沒有的事。並且我們的毛價也高起

來了；我們還能買得茶，糖和其他的一些東西。從前他們老是欺騙我們的。」

『你怎樣知道他們現在不欺騙你們呢？』我問她。『你知道你們的毛在美國值什麼價錢嗎？』她毫不重視我的這些疑問。

『當然他們拿我們的毛去賺了很多的錢，』她說。『可是，他們爲我們辦學校和讀書棚是哪兒來的錢呢？而且，政府果真要欺騙我們，他們爲什麼又給我們辦學校，讀書棚且辦合作社呢？因爲我們能夠讀書識字以後便可以知道許多商情，我們會辦合作社，便可以把我們的毛自己來經營販賣了。這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因爲我們都是蘇維埃的公民啦！』

(完)

此
页
空
白

附 錄
大 事 記

年代	國 事 與 民 事
862	<u>諾曼人</u> 侵入 <u>俄羅斯</u> 。
1237	<u>韃靼人</u> 侵入 <u>俄羅斯</u> 。
1597	頒布『 <u>波里斯哥都魯夫</u> 』敕令。
1601	<u>俄羅斯</u> 大饑荒（到一六〇四年止）。
1602	<u>柯荷拿卜</u> 率饑民襲擊 <u>莫斯科</u> 。
1604	十月，僞王『 <u>德米特里</u> 』率戈薩瓦四萬進攻 <u>莫斯科</u> 。
1605	五月，『 <u>德米特里</u> 』入駐 <u>莫斯科</u> 稱王，上

1606		<p>諭：減輕『奴屬制度，』廢除處罰逃奴苛例。</p> <p>五月，『德米特里』爲貴族襲殺。</p> <p>八月，<u>波羅涅可夫</u>大暴動。</p>
1607	逃奴之五年追還期，	五月， <u>波羅涅可夫</u> 在
1608	明令延長爲十五年	<p><u>都拉</u>失敗，溺死。</p> <p>春，第二僞王『德米特里』率戈薩克及<u>波蘭</u>游民在<u>瓦爾合甫</u>地方擊敗政府軍。</p> <p>六月，第二僞王入駐<u>都深</u>。</p>
1610		第二僞王失敗，在 <u>卡路加</u> 被殺。
1613	諾曼魯夫朝第一王 <u>哈</u>	

密爾一世即位；土地稅改『畝徵』爲『戶徵』；特別稅間接稅加重。

1646 逃奴之追還期改爲無限期。

1648

莫斯科暴動，抗議苛稅。

梳爾費提柯次克，烏次格，魯弗戈諾特，卜斯戈甫各地均有暴動（至一六六七年爲止。）

1649 頒布『烏羅善尼』新法典。

1654 征伐波蘭（至一六五五年止。）

1658 宣佈逃奴爲刑事犯。

1661	宣佈容逃奴者受重 罰。	
1664	實行逃奴大檢舉。	
1665	<u>土波</u> 戰事。	
1667		<u>拉貞</u> 發難，冬，佔據 <u>雅河</u> 。
1669		<u>拉貞</u> 在 <u>裏海</u> 建立海軍，劫奪商船。
1670		七月， <u>拉貞</u> 率衆向 <u>瓦爾加河</u> 上游出動。
1671		夏， <u>拉貞</u> 在 <u>新比爾斯克</u> 戰敗，走還 <u>南俄</u> ，中途被擒。
		十一月， <u>拉貞</u> 全軍覆沒。
1675	法定農奴可以買賣贈與。	
1676		六月六日， <u>拉貞</u> 被殺

- | | | |
|------|---|--|
| 1678 | | 於 <u>莫斯科</u> 。
全人口一半以上都成了農奴。 |
| 1682 | 彼得大帝即位，(至一七二五年) 制定特別稅二十餘種；土地稅改以人口為單位，即『 <u>新人頭稅</u> 』；農奴與奴隸之區別完全泯滅。 | |
| 1707 | 彼得派 <u>多爾戈洛基</u> 赴 <u>頓河</u> 追擊逃奴，得三千人。 | <u>布拉文</u> 率眾暴動，襲殺 <u>多爾戈洛基</u> ，旋敗。 |
| 1708 | | <u>布拉文</u> 重整旗鼓，號召階級戰爭，佔據 <u>捷爾加斯克</u> 並劫掠多處。旋失敗自殺。
十一月，戈薩克二千 |

1725	<p><u>加特林一世</u>即位（至一七二七年），重征苛斂。</p>	<p>人逃向<u>克里米</u>，願充軍役。</p>
1741	<p><u>伊里查伯</u>即位（至一七六一年，）窮奢極欲，以一千萬盧布建冬宮。</p>	
1762	<p><u>加特林二世</u>即位（至一七九五年，）增加農奴八十萬。</p>	
1773		<p>秋，<u>布卡捷夫</u>率隊進攻<u>亞克要塞</u>，<u>戈薩克</u>，<u>逃奴</u>，<u>逃犯</u>，<u>弱小民族</u>均從之。 十一月，<u>布卡捷夫</u>佔有<u>歐俄東半部</u>。</p>

1774

三月，政府軍奪回阿倫堡。

暴動中心移向瓦爾加河流域，迤西向莫斯科

八月，瓦爾加河流域大饑荒，布卡捷夫失敗，走烏拉爾，中途被擒。

1775

一月，布卡捷夫被殺於莫斯科。

1796

保羅即位（至一八八〇年，）農奴增加六十萬。

1797

敕令：耶加特里羅斯拉夫，克里米，高加索等處均施行農奴制度。

1801	<p><u>亞力山大一世</u>即位 (至一八二五年)， 十二月頒令：自由 階級可購買土地。</p>	
1803	<p>三月，地主可出賣土 地與自由給農奴。</p>	
1805	<p><u>俄法</u>，<u>俄瑞</u>（<u>典</u>）戰 爭（至一八一二年 止）。</p>	
1815	<p><u>普奧俄</u>結成『神聖同 盟，』反抗革命。</p>	
1816	<p>頒布邊防軍區辦法， 強迫施行。</p>	『救世團』成立。
1817		<p>『救世團』改組為『福 利社。』 農民請願減輕軍役， 代表遭拘禁。</p>
1819	<p>指定解放農奴試辦委</p>	<p>九千農民反抗軍役，</p>

	員會。	被鎮壓失敗。
1820	<u>普奧俄</u> 訂立『不得容許有非法變革』在 <u>歐洲</u> 發生之協約。	
1821		『 <u>南社</u> 』成立。 『 <u>北社</u> 』成立。
1823		『 <u>斯拉夫人聯合會</u> 』成立。
1825	十二月十八， <u>亞力山大</u> 一世逝世。	十二月二十六日， <u>聖彼得堡</u> 『 <u>十二月黨</u> 』兵變。
1826	政府設改革問題研究委員會，設『 <u>皇室土地經理部</u> 』，直接管理皇室產業。	一月九日， <u>南俄</u> 『 <u>十二月黨</u> 』大暴動。『 <u>十二月黨</u> 』五領袖受死刑，一百六十餘人流放 <u>西伯利亞</u> 各地，兵士數千人放 <u>高加索</u> 。

1844		從一八三五年起，共有農人二百九十八，農婦一百一十八，因暗殺地主致遭流放。
1848	<p><u>法國大革命。</u> 三月二十七日，<u>尼可拉一世</u>宣言：『一切土地屬地主，毫無例外。』</p>	
1853	<p><u>克里米戰爭</u>（至一八五六年止）</p>	
1854		從一八三五年起，共有一百四十四名大地主被暗殺。
1855		從一八二五年起，共有五百五十六次農民暴動發生。

- | | | |
|------|---------------------------|------------------------------------|
| 1857 | 八月，設御前參議委員會，考慮農奴解放問題。 | |
| 1858 | 一月，改御前參議委員會為正式委員會，籌備解放事宜。 | |
| 1859 | 二月，設解放會起草委員會。 | |
| 1861 | 三月十七日，頒布農奴解放令。 | <u>聖彼得堡</u> 學生大騷動，學生開始『到民間去』運動。 |
| 1863 | 政府頒令保護地主，予地主以處罰僱工之特權。 | <u>波蘭</u> 暴動。 |
| 1866 | | <u>卡拉科卓夫</u> 刺殺 <u>亞力山大二世</u> ，未成。 |
| 1867 | 政府嚴厲取締學生運動。 | 學生繼續騷動。 |

1868

司莫倫斯克大饑荒。

187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譯成俄文。

1873

『到民間去』運動大發展。莎羅維夫 刺亞力山

大，未成。

1874

政府大搜捕，得一百九十三人。

各地小革命團體極其發展。

1875

七百七十名黨人被捕。

1876

秋，『土地與自由社』成立。十二月，『土地與自由社』在聖彼得堡卡站大教堂前召集一

1877

俄土戰爭（至一八七
八年止）

大示威運動，被捕
多人。

奇梅林地方農民大暴
動。

聖彼得堡某五十和平
團體的份子多人先
後被捕聽審。

『土地與自由社』在各
地均有發展。

1878

一月，一百九十三人
案在 聖彼得堡 聽
審。

一月，聖彼得堡衛戍
司令特望波甫將軍
遭暗殺。

八月，憲兵長官梅與
塞夫將軍被暗殺。

1879

『土地與自由社』分裂

1880		<p>成爲『黑分派』與『民意派。』</p> <p>二月，<u>哈爾都林圖</u>炸<u>亞力山大二世</u>，仍未成。</p>
1881	<p><u>亞力山大三世</u> 卽位 (至一八九四年)。</p>	<p>二月九日，<u>亞力山大二世</u>被暗殺。</p>
1882		<p><u>卡站</u>大學與<u>聖彼得堡</u>學生大騷動。</p>
1883	<p>政府設農民土地銀行。</p>	
1836	<p>政府頒令：地主可以隨意辭退僱工，僱工不能毀約求退。</p>	
1887		<p><u>莫斯科</u>，<u>阿節沙</u>，<u>哈戈夫</u>，<u>卡站</u>各地學生騷動。</p>
1889		<p>社會民主工黨成立。</p>

1891		南俄及 <u>瓦爾加</u> 河流域 大饑荒，(至一八九 三年止。)
1894	<u>尼可拉二世</u> 即位 (至 一九一七年)。	從一八八三以來，研 究 <u>馬克思</u> 學說的團 體紛紛成立。
1895		社會革命黨成立。
1896		<u>聖彼得堡</u> 大學學生年 會遭禁止； <u>莫斯科</u> 學生示威抗議，四 百人被捕。
1899		<u>聖彼得堡</u> 學生示威， 被 <u>戈薩克</u> 騎兵驅 散； <u>莫斯科</u> 一萬三 千學生示威。
1900		<u>吉也夫</u> 一千學生罷 課，五百名被捕， <u>莫</u> <u>斯科</u> ， <u>哈戈夫</u> ， <u>聖彼</u>

		<p><u>得堡</u>均有學生騷動。</p> <p>反動的教育總長<u>波戈列波夫</u>被暗殺。</p>
1901		
1902	<p>政府頒令：田莊僱工，星期日及休假日均須照常工作。</p>	
1903	<p>三月，廢除『米爾』負責繳納全部租稅的制度。</p> <p>八月，廢止對農民所施的肉刑。</p>	<p>社會民主工黨分裂成多數黨與少數黨。</p>
1904	<p>二月，<u>日俄</u>戰爭開始。</p>	<p>七月，反動的內務總長<u>卜雷弗</u>遭暗殺。</p> <p>十月，自由派聯合社會革命黨作立憲運動。</p> <p>十一月，『地方議會』</p>

1905

一月一日，旅順口被
日本攻陷。

四月三十日，政府下
令：允許學校中宗
教改爲隨意科。

五月，海軍大覆沒。

六月，給予猶太人少
許自由；致慮農民
救濟問題。

八月，日俄停戰。

十月三十日，政府宣
言接受『地方議會』
代表聯席會的請
願；但同時開始實
施恐怖政策。

代表聯席會開幕。

十二月，自由職業者
紛紛集會。

一月十八——二十二
日，聖彼得堡卜其

洛夫工廠大罷工，
並波及各廠。

一月二十二日市民大
請願，冬宮前大流
血。

二月，各地大罷工大
暴動紛起。

二月十七日，皇叔塞
爾吉司在克里姆宮
被刺。

十三條重要鐵路全部
停工。

四月，『公團聯合會』

十一月八日，政府頒布限制出版自由令。

成立。

夏，農民暴動蔓延達六十二縣。

十月十七日，聖彼得堡總罷工。

十月二十日，莫斯科總罷工，同日，鐵路工會代表全體被捕；各鐵路宣佈總罷工。

十月二十七日，『蘇維埃』出現。

十月，立憲民主黨成立。

十一月一日，總罷工停止。

十一月五日，華沙大示威，公開要求自

治，並準備召集一千二百教區的農民代表大會，均被鎮壓失敗。

十一月八日，克隆司達兵變，被壓迫失敗。

十一月十四日，蘇維埃宣佈二次總罷工，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繼續至十九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農民聯合會委員會全體被捕。

十一月，西伯利亞駐軍及西瓦司多波耳海軍均兵變。

十一月，農民暴動波

及了歐俄一百六十縣。

十二月五日，蘇維埃主席赫陸司他列夫被捕。

十二月十四日，郵電雜役罷工。

十二月十六日，蘇維埃一百九十人被捕。

十二月二十日，宣布第三次總罷工，未實現。

十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黨人襲擊政府，小勝旋敗；南俄沙拉托夫，洛司托夫，魯瓦洛西克，埃

克特林堡，莎奇，蘇虎木各地均有暴動。

十二月，立陶宛人與愛斯多尼亞人反抗德國地主，被鎮壓失敗。

1906 十一月，頒布『家庭建設條例』。

1914 七月，歐洲大戰開始，俄國立時加入。

1917 三月十二日，革命爆發，俄皇統治推翻，第一次，臨時政府成立（立憲民主黨的內閣）。

七月二十一日，第二次臨時政府成立

(社會民主黨的內
閣)。

- 十一月七日，多數黨執政。
- 十一月八日，發佈『土地佈告』及『和平宣言』。
- 十一月十八日，發佈『告農民書』。
- 1918 一月二十七日，頒佈『新土地法』。
- 夏，在鄉村組織貧農委員會，實行『軍事共產制』。
- 十二月，解散貧農委員會。
- 1919 二月十七日，頒佈『社會主義的』農業土地基本法令。
- 1920 大饑荒。
- 白黨肅清。
- 1921 三月，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
- 1923 四月，劃一租稅為單一的農業稅。
- 1924 『剪刀問題』發生，立時解決。
- 1925 『春，減去農民擔負的租稅總額三分之一；相當容許農民租地並僱工。

蘇俄的婦女

澤息卡斯密司著 孫亮譯

◀ 定價一元三角 ▶

譯者在序言裏有這樣的幾句話：『我們中國現在常聽見「婦女平等」的呼聲，但是他們有無具體的辦法，有無具體的工作大綱？我們知道蘇俄在革命後，在各方面的制度都改革了，他們尤其注重婦女問題，……又說：我們現在對於這一方的工作，不是很好參考參考人家的過程嗎？……』

婦女問題是社會組織的重要原素，婦女問題一天不解決，整個的社會一天得不到穩定時期，我們中國的婦女運動，已有了相當的歷史，但所得到的成績，除了口頭上的幾句毫無實效的口號外，而一般自命為思想新的婦女，只在服裝和交際上求解放，拿着“婦女解放”做招牌而行其種種奇形怪狀無所不有的事實；這就是所謂解放走上了歧途。孫君的這部譯品，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人人應當注意的事。

●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 ●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新經濟學問答

Bogdonov 著 陶伯譯

◀ 定價一元 ▶

這本書是將一般地經濟學詳細分析和說明的基礎書籍。讀完了這本書我們對於經濟學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全書共分二編：第一編是說明經濟學之一般的概念；對於經濟學的定義和分類加以詳切的說明和解說，是完全在原理上作探討的工作。第二編是經濟的發展；自從原始共產社會經過交換經濟，發展到商業資本主義，再進而為工業資本主義，一直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將經濟的發展，用歷史的眼光和科學的分析加以說明，絕非和一般通俗的經濟學可以比擬的。本書完全用問答的體裁，說理尤為詳明。凡初習經濟學者，這本書可以作為基本書籍去讀，凡對於經濟學已經研究有素者，也是必要的參考書。

◀ 一九二九年七月出版 ▶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跋

寫完這本書，是兩年以前的事；因為一個爲大衆所共知的理由，一直挨延到今天，才得勉強和讀者相見。在普通的人，尤其在混戰連年循環不已的中國，兩年亦不過是一瞬間而已。可是在正在生長中的新俄羅斯，尤其在『動盪中的新俄農村』，兩年的時期却真有可觀的變遷哩！例如在農業的生產量，農業品的貿易，農村的電汽化，農村的社會主義化（集體耕作之發展，）特別是在農村的社會生活方面，今天比兩年前都有極長足的進展！

不幸，在編輯室和排字房延挨了兩年，却竟不能等候幾天，書局裏告訴我，版都已鑄好付印了。想加進一點新的材料，終於不可能。只好在此向讀者道歉，且候有再版或旁的機會，再爲讀者報告新的事象吧。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偉森再識於海上

俄國農民與革命

定價大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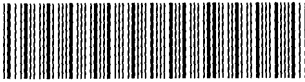
函購加郵費八分半

版權
所有

編者	李偉森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
印數	1———1500冊

02574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488B

